

名家名译 随身典藏



Autopista Sur

南方高速公路

〔阿根廷〕 胡利奥·科塔萨尔 / 著
林之木 等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南方高速公路 Autopista Sur

☞ 胡利奥·科塔萨尔 (1914—1984) 是拉美“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在世界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南方高速公路》描述了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大塞车的情景，相邻车上的人们交换着有关塞车原因的流言。语言的流水淹没了意义，流动的惯性成为这里叙事的惟一激情。

本书中另一篇小说《秘密武器》中的作品则主要描写了一个被理性蹂躏的世界。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与幻想色彩使科塔萨尔保留了南美作家自我审视的批评角度和论述风格。

责任编辑 / 贾宇琰
特约编辑 / 韩 芸
版式设计 / 尹 珺

封面设计·田晗工作室 (010) 87712237

ISBN 7-80109-694-0



9 787801 096944 >

本册定价
15.00
元

ISBN 7-80109-694-0/1·71 全套定价:150.00元(全十册)

名家名译 随身典藏



Autopista Sur

南方高速公路

〔阿根廷〕 胡利奥·科塔萨尔 / 著
林之木 等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新华书店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高速公路/(阿根廷)科塔萨尔著;林之本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

(名家名译)

ISBN 7-80109-694-0

I. 南…

II. ①科…②林…

III. 长篇小说--阿根廷--现代

IV. 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0745 号

南方高速公路

(本册定价 15.00 元)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泽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64

字 数: 101 千字

印 张: 4.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0 元(全十册)

数字资源
PDG

序 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异军突起，一代优秀作家脱颖而出，他们一个个才华横溢，思想活跃。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大胆变革，刻意求新，创造出了一大批构思新颖奇特、情节扑朔迷离、技巧精湛娴熟的好作品，终于把拉丁美洲文学推上了当代文学的高峰，产生了令人炫目的“文学爆炸”。而这本短篇小说集的作者胡利奥·科塔萨尔则被公认为这一“文学爆炸”的先驱之一，并被同时代的著名作家们亲切地尊称为“老师”，由此可见其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

胡利奥·科塔萨尔 1914 年 8 月 26 日生于布塞鲁尔一个阿根廷外交官家庭。1919 年随家迁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父亲离家出走，一去不返。破碎的家庭在科塔萨尔的幼小心灵上

投下了一层阴影,幸而母亲精通法语且喜好文学,科塔萨尔在她的熏陶下,自幼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7岁便开始阅读法语和西班牙语书籍,以此排遣孤独和烦恼。

1932年,科塔萨尔中学毕业,在工作中仍刻苦自学。1934年,他考取阿科斯塔师范学院文学系,在路易斯·博尔赫斯指导下专修欧美文学。一年后因经济拮据而辍学,去一乡村中学教书。在此期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开始业余创作。1938年,受聘于门多萨省库约大学,讲授法国文学,至1943年因政局动荡而失业,随之也失去安稳的生活环境,因而饱尝了担惊受怕、颠沛流离之苦。1946年,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阿根廷书籍委员会任职。1951年前往巴黎进修文学,并从此侨居巴黎,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员的同时,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暮年病魔缠身,晚景凄凉。1984年2月12日,他在巴黎逝世。

科塔萨尔早年致力于诗歌创作,他以胡利奥·德尼斯为笔名发表的诗集《仪表》(1938),

因受唯美主义影响,文字优美,韵律讲究,但内容空泛,未引起重视。这也许是他后来放弃诗歌创作的原因之一。1949年发表的诗剧《国王们》产生了强烈反响,剧作取材于希腊神话中希腊英雄忒修斯怒斩人身牛首怪物弥诺陶洛斯的故事,但他反其意而用之,将食人生番弥诺陶洛斯写成出类拔萃的诗人,英雄忒修斯则成为传统势力的卫道士,以此抨击传统观念,宣传革新思想。此剧奠定了他后来创作思想的基本倾向。1951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角斗士》,获得巨大成功,如书名所示,书中故事大多讲述人与恶势力的搏斗,作品笼罩着一种荒诞恐怖的气氛,反映了阿根廷人民在独裁统治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惧心理。如其中《被侵占的住宅》,描写姐弟俩在居所里深夜听到野猫的惨叫,随即厨房里有声音,继而卧室中有响动,唬得他们东躲西藏,最后终于逃出家门。在《公共汽车》中,一位女护士乘车访友,因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携带一束鲜花而被乘客乃至售票员和司机所逼视,经历了从惊异到愤怒再到恐



惧的情感变化,小说把一个女青年惶恐不安的胆怯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此时他获得了法国政府一笔奖学金,去了巴黎。

在法国侨居的 30 余年中,他共创作了 80 多篇短篇小说,分别结集为《游戏的结局》(1956)、《秘密武器》(1959)、《一切火都是火》(1966)及《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1981)等主要短篇小说集出版。《游戏的结局》中的大多数作品仍以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背景,着力描写阿根廷的荒诞现实和白色恐怖下中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在写作手法上则有更大的突破,即通过特殊的艺术手法,把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如《美西螈》中的主人公从玻璃瓶里的蝶螈身上看到了他的自我的投影,在这里,无论人物是蝶螈,还是人物变成蝶螈,抑或人物把蝶螈误认为自己的映像,人物的变形终究是一种象征,它或说明主人公如同动物一般遭受非人待遇,或说明主人公希望自己像蝶螈一般安全地呆在玻璃瓶里。这种真真假假、

似是而非的描写，正是现实与幻想的巧妙结合。

《秘密武器》中的作品则主要描写了一个被理性蹂躏的世界，其中的人物大多是作者批判的对象。如《好差事》中的弗朗西尼太太，她是一个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女佣人形象，她的“好差事”只不过是替人看管哈巴狗、充当哭丧妇而已，但她却心满意足，自得其乐，以至于因为一位先生递给她一杯酒而受宠若惊。

《一切火都是火》和《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两部集子是作者的中后期创作，它们通过对更广阔、更普遍的现实的描写，发掘现代人的痛苦心理，从中折射时代和社会的本质特征。其中《猛蜘蛛的故事》和《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两篇，可视为作者对自己人生和创作的反思和总结，前者表现主人公寻找寂寞却又不甘寂寞的矛盾心理，后者描写影星格伦达的一些崇拜者为了保持格伦达在他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而篡改她主演的影片，结果越改越糟糕的故事。对影星崇拜者的描写，也正是作者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一种检讨，标志着他创作方法的重大转变。可

惜这一转变刚刚开始便因他的去世而告终。

科塔萨尔创作的长篇小说有《跳房子》、《中奖彩票》、《用于武装的 62 型》和《曼努埃尔记》等，数量虽不多，但影响深远，尤其前两部作品在拉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早已被译成中文出版。

秘鲁—西班牙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明确宣称：“拉丁美洲的作家必须首先是政治家、鼓动家、改革家、社会评论家和伦理学家，然后才是作家和艺术家。”可以说，科塔萨尔既是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又是个超群出众的作家。科塔萨尔出生在欧洲，后来又长期客居欧洲，但他一直关注着拉丁美洲各国的前途和命运，始终与他的祖国保持着联系。20 世纪 50 年代他声援古巴革命，其后，他长期同卡斯特罗保持友好关系。自 70 年代起，他多次返回阿根廷，参加反独裁、反暴力的斗争；他在许多外国报刊杂志上撰文抨击阿根廷军政府以及外国干涉中美洲的粗暴行径，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和正义事业奔走呼号。他的作品也大都以拉丁美



洲，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现实生活为题材，有着浓郁的本土色彩。其中，令人难以卒读的《跳房子》是他一生追求的结晶，也是拉丁美洲文化中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中奖彩票》则因其幽默讽刺的笔调和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生活入木三分的刻画而至今为他的同胞所喜爱。我们编选的这本小说集，同样多角度地显示了科塔萨尔的人格本质。

胡真才

目 录



序 言	胡真才	1
南方高速公路	林之木译	1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胡真才译	47
中午的海岛	尹承东译	63
一朵黄花	朱景冬译	81
被侵占的住宅	炜 华译	97
粗线画	张 琼译	109
公共汽车	胡真才译	119
妈妈的信	朱景冬译	141
秘密武器	朱景冬译	177
满意的服务	朱景冬译	227

南方高速公路

南方高速公路





司机心里急得火烧火燎……实际上，汽车的拥塞看起来可怕，但却没什么了不起的。

阿里戈·贝内德蒂

《快报》

罗马 1964,6,21^①

起初王妃牌汽车里的姑娘还一个劲儿地计算着时间，尽管驾驶珀泽奥 404 的工程师却已经觉得无所谓了。任何人随时都可以看一眼自己的手表，然而，对这些人来说，戴在手腕上的那个机械装置和收音机里传来的“哔哔”声全都具有了另外的含义，只代表着那些没有愚蠢地选择星期天下午从南方高速公路回巴黎的人所需要的时间，因为他们刚刚出了枫丹白露，就不得不加入车流，在两条车道上各排起六条长龙（大家知道，星期日高速公路只供返回首都的车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辆行驶)。

工程师启动马达,开了3米,再一次停下来,同右边双马力里的两个尼姑和左边王妃里的姑娘扯几句闲话;通过后视镜看了看背后驾着卡拉维尔的那位面无血色的司机;不无讽刺意味地妒忌起珀泽奥203(紧跟在那位姑娘的王妃之后)里的那对像小鸟一样无忧无虑的夫妇(他们正在逗弄着一个小女孩,说说笑笑,吃着奶酪);不时地还得忍受着自己的珀泽奥404前面那辆西姆卡里的两个小青年的粗言恶语;甚至于利用停顿的机会下车走一走,不过不能走得太远(因为没法知道前面的车子会在什么时候重新启动,于是就得赶紧跑回去,否则要激起一阵喇叭声,同时引来一通臭骂),只是去到那位不停看表的姑娘的王妃前面的一辆托努斯跟前,同车上的两个男人发上几句牢骚、说上几句气话(车上的一个满头金发的男孩,此时此刻正沉湎于让自己的玩具汽车在托努斯的车座和后缘上尽情地奔驰);看到前面的汽车没有重新启动的迹象,于是就放胆子再朝前走上一点儿,



带着几分怜悯的心情望着宛如在 ID-西特隆那个紫色大澡盆里漂浮着的一对老夫妇：老头儿疲惫不堪地把胳膊搭在方向盘上，老太婆正在认真然而却没有多大兴致地啃着一个苹果。

上述情景反复了四次之后，工程师决定不再下车，平心静气地等着警察想办法解决问题。呆在汽车里面，8月的燥热使人更加难以忍受，因而也就越来越懒得动弹。到处都是汽油味儿。西姆卡里的小伙子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太阳照在汽车玻璃和镀铬边角上，发出耀眼的反光。尤其让人受不了的是那种困身车海的烦躁情绪。工程师的 404 在右车道左手第二排里，也就是说，他的右边还有四排、左边还有七排，但是，实际上他只能看清自己周围的八辆汽车，并对上面的乘客了如指掌。除了西姆卡上那两个让人讨厌的小伙子之外，他跟所有的人都交谈过。在走走停停的过程中，人们就形势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普遍的印象是：在到达科贝尔和埃松之前，他们只能这么一步一步地爬行或者更慢，但是，如果直升飞机和摩托警察能



够把拥塞的关键问题解决了，在科贝尔和儒雅西之间速度可能加快。谁都不怀疑在附近地区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否则，这种慢得出奇的速度就没法解释。在此之前，只能克制着自己，忍受着炎热，等待着罚款，眼望着公路，故意想出各种话题，朝前开 3 公尺，停下来，再开 5 公尺，发一句感慨或者默默地骂一声娘。

双马力里的两位尼姑必须在 8 点钟之前赶到米利拉福雷，因为她们为厨房拉着一筐蔬菜。珀泽奥 203 上的夫妇非常关心不要错过 9 点半钟的电视游戏节目。王妃的女司机对工程师说过，她对早一点儿还是晚一点儿到巴黎倒是不怎么在乎，只是对这种情况不满，强迫成千上万的人像骆驼队一样前进实在太不像话。根据工程师的估算，在刚刚过去的几个钟点里面（当时大概快到 5 点钟了，但炎热却把人们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他们可能前进了 50 公尺。然而，牵着手拿玩具汽车的孩子，过来闲聊的那拉托努斯上的乘客，却不无嘲讽意味地指了指一棵独立路旁的法国梧桐，王妃上的姑娘记得，在那么



长的时间里(究竟多长已经不值得看表去进行毫无意义的计算了),那棵梧桐(如果不是栗子树的话)一直跟自己的汽车保持在一条线上。

天老也黑不下来,阳光照在路面和车篷上,晃得人们眼花缭乱直恶心。墨镜,洒上花露水的头巾,以及为了免受耀眼的反光和汽车每次起动所排出的废气之害而临时想出来的防护措施,纷纷启用,不断完善,成了人们谈话和议论的题目。工程师再一次下来活动一下腿脚,跟尼姑的双马力前面那辆阿里阿内车里的农民模样的夫妇随便闲扯了几句。双马力后面是一辆大众,车里坐着一个军人和一位姑娘,看样子,他们刚刚结婚。工程师对外侧第三排已经不感兴趣,因为要到那儿去,必须冒险远离自己的404。他的眼前呈现出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汽车:奔驰、ID、4R、兰西亚、司科达、莫里斯-米诺尔,应有尽有。左侧对面的车道上有雷诺特、安格利亚、珀泽奥、波斯切、博尔沃,斑驳杂乱,一眼望不到边。真是无聊极了。跟托努斯上的两个男人闲谈了一会儿,本打算再同驾驶卡拉维



尔的那位孤僻的人交换一下感想,可是那人却完全不理,工程师于是觉得最好还是回到自己的车上,去找王妃上的姑娘重新提起关于时间、距离和电影等老话题。

不知是从对面的车道上还是从右外侧的车堆里冒出来的一个外国人,有时也会凑到这边来,而且带来在焦灼不安的车队里辗转传播但并不可信的某种说法。看到人们赶紧乒乒乓乓地打开车门对此大加议论的时候,外国佬对自己带来的消息所产生的效果非常得意,然而,没过多久,一听见有人按喇叭或者有发动机起动的声音,他就不得不匆匆绕过车辆朝自己的车子跑去,否则就理所当然地要激起公愤。就这样,整个下午先后听到了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在科贝尔附近,一辆弗洛里德撞了一辆双马力,造成三人死亡和一个小孩受伤;又说是发生了连撞事故,先是一辆雷诺特运货车撞了一辆装满英国游客的奥斯丁,然后,一辆菲亚特1500又撞了那辆运货车;还有一种说法是,一辆满载乘飞机从哥本哈根来的游客的大轿车翻



了。工程师满有把握地相信这一切全都是或者近乎于全都是胡说八道,尽管他知道,既然交通阻塞到了那种地步,可以肯定在科贝尔附近,也可能是在巴黎近郊,出现了严重的事态。阿里阿内车上的农民在蒙特罗那边有一个庄园,对当地非常熟悉。有一个星期天,他们曾经遇到过交通被阻塞了5个小时的事情,但是,相比之下,那简直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一次,偏向公路左侧的太阳正把最后的金色光芒喷吐到每一辆汽车上,烤得金属烫人,照得人睁不开眼睛,背后的树影一直没能退出视野,前方远处隐约可见的景物始终不肯移近,人们无法真正感觉到车队在行进,尽管是极其缓慢,尽管是停停走走、突然刹闸,尽管是永远只能挂头挡、只能十分恼火地脚闸、手闸并用地再从头挡退回到制动状态并最后熄火,如此反复,一而再,再而三。

有那么一次,工程师闲得发慌,于是决定利用一个停车时间特别长的机会到左侧的车队里去走走。他越过王妃,遇上了一辆 DKW,另外一辆双马力,一辆菲亚特 600,最后在一辆德索



托旁边停下来,跟那位从华盛顿来的心焦火燎的游客交流了感想。那个美国人必须在8点钟赶到歌剧院。他几乎不懂法语,You understand,my wife will awfully anxious,damn it^①,他们还议论了一些别的事情,这时候从DKW里下来了一个推销员模样的人。这人告诉他们,刚刚有人带来消息说,一架流浪幼狐刚好跌到了高速公路上,死了好几个人。流浪幼狐事件无意中给那位美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听到了一阵喇叭声而急忙赶回自己的404的工程师对此也很重视。他在返回的途中顺便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托努斯上的那两个人和203上的那对夫妇。在车队又缓缓向前挪动了几公尺的过程中,工程师又把这个消息详详细细地对王妃上的姑娘讲了一遍(此刻,王妃落到404后边一点儿,再过一会儿,404可能会落到王妃的后面去,但是,事实上,这12排汽车是一起行

① 英语,意为“你明白,我妻子一定非常着急,真见鬼。”



动的，仿佛公路尽头有一名看不见的警察在指挥着这些汽车齐头并进，不许任何人抢先占便宜)。流浪幼狐，小姐，是一架微型游览飞机。啊，它真想得出来，偏偏要找星期天下午摔到公路上。这种事情。至少在那些该死的汽车里面不是那么热也好哇，公路右侧的树木无论如何也该向后移移位置啊，计程器的末尾数字怎么就不钻进那个小黑窟窿里面去而要无休止地悬在半中间呢。

突然(此刻天色已经开始黑了下来，远处的车顶呈现为淡紫色)，一只白色的大蝴蝶落到了王妃的挡风玻璃上。在它停息的那个短暂而优雅的瞬间，姑娘和工程师对它的翅膀赞叹不已。他们无限惋惜地眼看着它飞走，越过托努斯和两位老夫妇的紫色 ID，朝着从 404 的位置已经看不清楚的菲亚特 600 飞去，过了一会儿又回到西姆卡跟前。有人伸手去捉但却没有捉住，于是便跑到那两位好像正在吃着什么东西的农民的阿里阿内顶上悠闲地扇动着翅膀，最后在公路后侧消失不见了。傍晚的时候，车队破天



荒第一次前进了较长的一段距离，差不多足有40公尺。工程师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计程器，半个6字已经不见了，7字从上面吊下来，露出了个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开着收音机，西姆卡里的两个小伙子不仅开到了最大音量，而且还随着扭摆舞曲的节奏，一边大声地哼着，一边摇晃着身体，使整个汽车都跟着不停地抖动。两位尼姑数着念珠；托努斯里的孩子脸贴在玻璃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辆玩具汽车。有一阵子（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好几个外国人各自带来了一些同先前那些已经被人忘掉了的一样自相矛盾的消息。在公路上爆炸的不是一架流浪幼狐，而是由一位将军的女儿驾驶的滑翔机。确实是一辆雷诺特撞了一辆奥斯丁，不过不是在儒雅西，而是在巴黎的城边。有一个外国人对203的那对夫妇说，高速公路的碎石路面在伊格尼附近出现塌方，五辆汽车由于前轮驶进裂缝而翻掉了。这种天灾的说法也传到了工程师的耳朵里，不过他耸了耸肩膀，未加任何评论。后来，在回忆天黑以后人们已经能够较为



自由地呼吸时的情景时，他记得自己曾经从窗口伸出手臂敲过王妃的车厢，叫醒了由于不再关心什么时候能够再朝前移动一点儿而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的姑娘。大概是在半夜的时候，一位尼姑猜想他可能饿了，怯生生地递给了他一块火腿夹心面包。工程师只是出于礼貌才接了过来（其实他觉得有点儿恶心），并请求允许他同王妃上的姑娘一起分享。姑娘不仅接过面包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而且把她的左邻 DKW 里的推销员递给她的巧克力也吃掉了。很多人钻出了热乎乎的汽车，因为又有好几个小时没有挪窝了。人们开始觉得口渴，车上带的汽水、可口可乐、甚至连酒都已经全部喝光。最先受不了的是 203 里的小姑娘，于是那位军人和工程师走出自己的汽车，同小姑娘的父亲一起去找水。在西姆卡（在这里仿佛收音机足以代替饮食）前面，工程师遇到了一辆博琉，里面坐着位眼神焦躁不安的中年妇人。没有，她没有水，但是可以给孩子几块糖。ID 里的老夫妇先商量了一下，然后老太太把手伸进包里掏出来了一



听果汁罐头。工程师表示了谢意,问他们是否饿了,是否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老先生摇了摇头,但他的妻子却似乎默默地点了点头。后来,王妃上的姑娘同工程师一起到左面的车队里去征集了一番,但没敢走得太远。他们弄到了一些饼干,给 ID 里的老妇人送了去。恰在这时,急风暴雨似的响起了喇叭声,他们赶紧跑回到各自的车上。

除了前面讲到的很少几次活动之外,可做的事情实在不多,因为时间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成不变而失去了意义。有一阵子,工程师想到应该从自己的日程表中把那一天勾掉不算,并且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但是,后来看到那两位尼姑、托努斯上的两个男人和王妃上的姑娘在钟点问题上产生了歧异,他又觉得应该计算得更准确一点儿。地方电台的节目已经全部播完,只有 DKW 上的推销员的短波收音机还在一个劲儿地播送着股票交易所的新闻。凌晨 3 点钟左右,人们仿佛默默地达成协议决定休息,直到天亮,车队都没再动过。西姆卡里的小伙



子搬出气垫床，放到了汽车旁边；工程师放倒了404的前座靠背，并且提出要把车子让给那两位尼姑，但被拒绝了。工程师在躺下睡一会儿之前，想到了王妃里的姑娘（此刻正安安静静地趴在方向盘上），因为自己觉得无所谓，就建议天亮之前同她换换汽车。姑娘没有接受，声称她怎么都能睡得很香。托努斯里的孩子哭了好一会儿，他躺在后座上，一定很热。当尼姑们还在祷告的时候，工程师在车里躺了下来，并且很快就睡着了，不过，他睡得很不踏实，最后满头大汗一惊而醒，一下子竟没有弄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他舒展了一下身子，蒙眬中发现外面有动静，不少人影在汽车中间穿来穿去，并看见一个人朝公路边走去。工程师猜到了原因，后来自己也下了车，悄悄地到路边上去放松了一下。那儿既没有密集的灌木丛，也没有挺拔的大树，只有一片黑茫茫的原野，不见一点儿星光，仿佛齐着形如一条白色带子的碎石路面的边缘耸立着一堵无形的大墙，阻截着那凝滞不动的汽车的长河。他差一点儿同阿里阿内上的



农民撞了个满怀，那人嘟嘟囔囔不知说了一句话。在散发着热气的高速公路上一直弥漫着浓重的汽油味儿，此刻还要加上人们那已经变得极坏了的情绪。工程师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汽车旁边。王妃上的姑娘靠在方向盘上睡着了，一缕头发散落在眼睛的前面。在钻进自己的404之前，工程师满有兴致地探察了姑娘那隐没在黑暗之中的侧影，并想像着她那轻轻吐着气息的嘴唇。DKW上的那个人默默地吸着烟，也正在从对面的车道上欣赏着姑娘的睡容。

整个上午，向前移动的距离极其有限，但却足以使人产生当天下午可以打开通向巴黎的道路的希望。9点钟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塌陷的路段已经填平，交通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西姆卡上的那两个小伙子重又打开了收音机，其中的一个还爬到车顶上又叫又唱。工程师却觉得这个消息像前一天晚上的各种传闻一样令人难以置信。那个外国人只是乘人们高兴之机，从阿里阿内上的那对夫妇手中要走了一个橘子。后来又有一个外国佬企



图故伎重演,但是任何人都没给他一点儿东西。天气越来越热,人们宁愿躲在汽车里等待喜讯能够得到证实。中午的时候,203 里的小姑娘又哭了起来,王妃上的姑娘跑过去哄她玩,并且同那对夫妇交了朋友。203 上的那一家人运气不好:他们右边卡拉维尔里的男人闷声不响,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而左边弗洛里德的司机一个劲儿地骂骂咧咧,好像交通阻塞完全是冲着一个人去的。小姑娘又嚷起渴来,工程师灵机一动,想去找阿里阿内上的两个农民谈一谈,他确信那辆车上备有大量的食品。他完全没有料到,两位农民倒很热心。他们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人们要互相帮助,而且还提出,如果有人能把那一片(女的举起手来划了一个圆圈,把周围十来辆车全都包括了进去)组织一下,大家不受任何烦难就可以抵达巴黎。工程师不愿意抛头露面自任指挥,于是就把托努斯上的两个人叫来同阿里阿内里的那对夫妇一起商量。不大的功夫,他们逐个地征求了每一个人的意见。大众上的青年军人当即表示赞同,



203 上的那对夫妇如数献出了自己不多的储备(王妃上的姑娘为小女孩找来了一杯石榴水,此刻那孩子还玩得十分高兴)。托努斯的主人还去找了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并得到了他们的认可,虽然多少带有几分嘲讽的意思。卡拉维尔的那位面无血色的主人耸了耸肩膀,声称怎么都行,他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认为最为合适的方式行事。ID 上的老夫妇和博琉上的太太明显地露出了高兴的神情,仿佛他们觉得更加有了依靠。弗洛里德和 DKW 的主人未置可否;德索托上的美国人圆瞪着眼睛望着他们,说了句关于上帝的旨意的话。工程师对托努斯的两位乘客有一种出自本能的信任,很容易就提出由他们当中出一个人负责指挥一切行动。眼下任何人都不缺吃的东西,但需要搞点儿水来,于是,头头(这是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对托努斯的主人的戏称)就指派工程师、军人和两名小伙子中的一个到公路附近的地区去了解一下,看能不能拿食物换点儿饮料。显然,具有指挥才能的托努斯的主人不是十分乐观,按他的估计,最



多需要筹措一天半的需用。尼姑们的双马力和两位农民的阿里阿内上备有足够维持到那个时候的食品,如果派出去的人能找回水来,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然而,只有那位军人带回一军用水壶水来,而且人家还以供应两个人的食物为交换条件。工程师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提供饮水的人,但是也没有白跑,带回来了他们四周都在组织为解决同类问题的机构的消息,因为当他找到一辆阿尔法-罗米欧的主人之后,那人拒绝同他谈论类似的事情,并让他去找在同一排向后数第六辆车上的那一片的代表。后来,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回来了,但也没有找到水。托努斯的主人估计,他们现有的饮水足够保证两个孩子、ID上的老妇人和其他女客的需用。工程师正在对王妃上的姑娘讲述自己的那次周游(当时是下午1点,炎热的太阳把人们全都困在自己的汽车里),但是姑娘却做个手势打断了他,并且对他指了指西姆卡。工程师两步就窜到了那辆汽车跟前,一把拽住那个正举着水壶懒洋洋地坐在座位上大口喝水的小伙子的胳膊



肘。那壶水是他偷藏在衣服里面弄回来的。小伙子面露怒容，工程师毫不示弱，把他的胳膊攥得更紧。那个小伙子的同伴下了车，朝工程师扑了过去。工程师后退了两步，几乎是带着惋惜的神情等着他再一次冲过来。那个军人已经赶了过去，尼姑们的喊叫声惊动了托努斯的主人和他的同伴。托努斯的主人问清了情况，走到手拿水壶的小伙子跟前，狠狠扇了他两个耳光。小伙子带着哭腔叫嚷着不服气，而他的同伴却只是嘟嘟囔囔，但没敢介入。工程师夺过水壶递给了托努斯的主人。这时候响起了喇叭声，每个人都朝自己的汽车跑去，然而，仍是一场空欢喜，车队前进了还不到5公尺。

中午时分，太阳比前一天还要厉害，两个尼姑中的一个摘下了头巾，她的同伴在她的太阳穴上抹上了花露水。女人们一时间想出了许多具有慈善性质的活动。她们逐一拜访了每一辆汽车，帮忙照看起孩子来，以便让那些男人们能够更加自由一些。没人发半句牢骚，但人们的笑脸却是硬装出来的。他们老是重复着同样的



言词,并用轻言细语来掩饰内心的怀疑情绪。对工程师和王妃上的姑娘来说,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莫过于浑身臭汗、脏得不行。他们对那对从乡下来的夫妇能够毫不理会自己腋下的狐臭味深为佩服,而且那两个人常来找他们聊天或者转述某一条刚刚听来的新闻。傍晚的时候,工程师突然朝后视镜里瞄了一眼,像每次一样,他又看见了卡拉维尔里那位男人紧绷着的苍白面孔。那人和费洛里德的胖司机一样,对周围的任何活动都不闻不问。工程师觉得那人的脸更瘦了,所以就怀疑他是否生了病。可是后来,工程师去找那位军人及其妻子闲扯的时候,有机会就近看了看那家伙,并且确信他没有生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如果一定要想找个说法的话,不妨称之为“孤僻”。又过了一阵,大众上的军人告诉工程师说,他妻子对那个闷声不响、一刻不离方向盘、仿佛睁着眼睛睡觉的人有点儿害怕。于是出现各种各样的臆测,因为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来应付这种无所事事的局面。托努斯和 203 上的两个孩子已经成了朋



友，一会儿吵翻，一会儿又和好；他们的父母也不时地互相拜访拜访。王妃上的姑娘隔一段时间就去询问一次 ID 上的老妇人和博琉上的那位太太的身体情况。傍晚时分，突然刮起了一阵带雨意的大风，太阳也被西方天空的乌云所遮蔽。人们露出了快意，总算可以凉爽一点儿了。开始落了几个雨点，刚巧车队也奇迹一般地差不多一下子推进了将近 100 公尺。一道闪电划破了远方的天空，空气变得更加热了。大气层的电荷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托努斯的主人出于本能（工程师对此暗暗佩服不已），直到天黑都没有惊动大家，就好像担心人们会过分劳累或者中暑似的。8 点钟的时候，女人们出来分配了食物。在此之前，大家已把阿里阿内变成了总仓库，让两位尼姑的双马力作为后备储藏室。托努斯的主人亲自去找附近四五片的头头们谈了谈，然后，在那位军人和 203 的主人的帮助下，给那几片送去了一大堆食物，弄回来了更多的水和一点儿酒。大家决定让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把橡皮床让给 ID 上的老妇人和博琉



上的太太；王妃上的姑娘给她们送去了两条苏格兰毛毯；工程师戏称自己的汽车是“卧铺车厢”，并且表示愿意把它让给任何需要的人。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王妃上的姑娘居然没有客气，当夜就跟两位尼姑中的一个分享了404的平展坐席；另外一位尼姑去到203上，跟那个小女孩及其母亲同睡，而车子的主人只好裹上一条毯子躺到路上去过夜了。工程师没有困意，于是就和托努斯的主人及其同伴一起掷色子打发时光，阿里阿内上的那个农民也凑过去玩了一阵。他们还一边喝着那位农民早晨交到托努斯的主人手里的烧酒，一边谈论起了政治。夜色不错，凉爽宜人，从云缝中还露出了几颗星星。

天快亮时，他们也都困了。虽然东方已经泛白，他们还是想到车里面去睡一会儿。托努斯的主人和男孩一起躺到了后座上，他的朋友和工程师在前座上休息了一会儿。工程师正睡得迷迷瞪瞪，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了人们喊叫的声音。另一片的头头过来告诉他们说，30多辆汽车往前的地方，因为有人想偷偷地煮点儿青



菜,结果却把一辆埃斯塔菲特给点着了。托努斯的主人一边打趣着刚刚发生的那件事情,一边走到每辆车子跟前打听一下人们夜里过得怎么样,其实大家全都明白他是什么意思。那天上午,车队早早就开始动了起来,人们纷纷跑回自己的汽车,忙着收拾垫子和毛毯,但是,由于各处全都一样,所以谁都不着急,也没人按喇叭。到中午,车队总共又朝前挪了 50 多公尺,公路的右侧远远地出现了一片树林。大家开始羡慕起那些此刻可以走进树林享受一下荫凉的人们来。那里说不定还会有一条小河,或者能找到一个自来水龙头。王妃上的姑娘闭起了眼睛,想像着清水从莲蓬头里喷出来,顺着自己的脖子、脊背和大腿流下的快意;正在斜着眼睛望着她的工程师,看见她的脸上挂着两滴泪珠。

刚刚走到 ID 跟前去的托努斯的主人又掉转头来,叫那些较为年轻的妇女赶快去照顾一下觉得不适的老妇人。后面第三片的头头辖下有一位医生,那位军人立刻跑去叫医生来。工程师一直就在冷眼看着西姆卡上那两个努力求



得人们谅解自己的恶劣行为的小伙子，此刻觉得给他们一个机会的时候到了。两个小伙子用帐篷布把 404 的窗户挡了起来，于是这个卧铺车厢就变成了一个急救站，使老妇人可以在一个相比之下较为幽暗的地方休息休息。老妇人的丈夫在她的身边躺了下来，一直攥着她的手，人们让医生留下来陪着他们。后来，老妇人自己觉得好了一些，两位尼姑自愿照顾她。整个下午，工程师没着没落，在这辆车跟前呆一会儿，再到那辆车旁边转一转，太阳实在热得不行的时候，就钻进托努斯里面躲一躲。只有三次他不得不跑回自己的车里（两位老人仿佛睡着了），以便使它能够和整个车队一起朝前移动一小段距离。直到天黑他们也没能到达树林的跟前。

凌晨 2 点左右气温陡然下降，那些有毯子的人庆幸自己可以用毯子裹住身体。由于天亮以前车队不会再动（这是从夜幕下一动不动的车海的气氛中感觉出来的），工程师和托努斯的主人一起坐了下来，一边吸着烟，一边同阿里阿



内上的农民及那位军人聊起天来。托努斯的主人的估计已经与实际不符，工程师坦率地指出了这一点。天亮以后，必须想办法再弄到一些食物和饮水。那位军人去找来了附近几片的头头们（他们同样没有睡觉），大家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尽量压低声音，以免吵醒已经入睡了的女人们。这些头头们又找了更远一点儿的各片的代表，范围扩大到了 80 至 100 辆汽车。大家的结论是各处的情况都大同小异。那位农民很熟悉当地的情况，于是建议天亮以后每片派两三个人到附近的农庄里去买点儿粮食，与此同时，由托努斯的主人负责指派适当的人来照料那些出征的人们的汽车。主意不错，在与会者中间筹集资金也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当场决定派那位农民、年轻军人和托努斯的主人的朋友一起前往，让他们带上所有能够收集到的口袋、网兜和水壶。其他各片的头头们分别回去组织类似的征购队。天亮以后，向女人们讲清了形势，并为保证车队能够照常前进作了必要的安排。王妃上的姑娘告诉工程师，老



妇人的病已经好了，而且执意要回到自己的 ID 上去。8 点钟时，医生又来看过，认为那对老夫妇完全可以回自己的车子。尽管如此，托努斯的主人还是决定 404 永远作为急救车使用。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别出心裁地做了一面红十字旗插到了天线杆上。已经有好一会儿了，人们宁愿尽可能少地走出自己的汽车。气温在继续下降，中午竟下起了瓢泼大雨，一道道闪电照亮着远处的天空。那位农民的妻子赶紧用漏斗往一个塑料罐里接雨水，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觉得这种做法倒是很有意思。工程师趴在方向盘上，旁边放着一本打开了的书，但是却没有心思去读。他望着眼前的情景，心里却在琢磨着出去采购的人怎么耽搁了这么久还不回来。过了一阵，托努斯的主人悄悄把他叫到了自己的车上，告诉他说：计划已经破产。托努斯的主人的朋友提供了细节：那些农庄有的荒废了，没有荒废的却援引私买法，拒绝向他们出售任何东西，因为怀疑他们是税务检查员，借机试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弄到了少量的水和一点儿



食物。这些东西很可能是那个军人偷来的，因为他笑呵呵的，不愿意细说。显然，如果不解决阻塞的问题，他们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另外，他们现有的食物对两个孩子和那位老妇人又是很不合适的。4点半钟的时候，过来看望病人的医生流露出不耐烦和已经疲倦了的神情，并且告诉托努斯的主人说，在他所在的那片和附近所有各片情况全都一样。电台报道过已经采取了疏通高速公路的紧急措施，但是除了傍黑时见到过一架直升飞机一掠而过之外，根本看不出别的任何迹象。与此同时，气温越来越低，人们仿佛在期待着夜幕尽快降临，以使用毯子裹住身体，在睡眠中再打发掉几个钟点。工程师坐在自己的汽车上听着王妃上的姑娘同 DKW 上的推销员之间的谈话，那人正在给姑娘讲故事，引逗她强作笑脸。工程师突然看见了博琉上那位几乎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汽车的太太，于是立即走过去，问她是否有什么事情，但是，她只是想打听一下有没有进一步的新闻，并且跟两位尼姑聊了起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一种无名的烦



恼压在人们的心头,他们只希望能够赶快睡上一觉,而对那些自相矛盾或者毫无根据的消息完全失去了兴趣。托努斯的主人的朋友悄悄来找工程师、年轻的军人和 203 的主人。托努斯的主人告诉他们说,弗洛里德上那家伙已经溜掉了。先是西姆卡上的一个小伙子发现那辆车空了,过了一会儿之后,由于没事可干,就开始到处找了起来。没人对弗洛里德的胖主人有多少了解,那家伙尽管头一天比任何人吵闹得都厉害,但后来却像卡拉维尔的驾驶员一样闷声不响。到了清晨 5 点钟的时候,已经完全可以断定弗洛里德(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开玩笑地这样称呼那个胖子)丢下了装着衬衫和内衣的箱子,只拎着一个手提包逃走了。于是,托努斯的主人就指派西姆卡上的一个小伙子负责不让那辆无主汽车妨碍整个车队的行动。那个趁着黑夜逃跑的事件对所有的人都多少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影响,人们都在问,四周都是荒野,弗洛里德究竟能够逃到什么地方去呢?仿佛那天夜里注定要发生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工程师



躺在 404 平展的座席上，蒙眬中听到了一声呻吟。他猜想一定是年轻的军人和他的老婆在干着什么事情，不过，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又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面，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他又仔细想了想，并且揭开了遮住后窗玻璃的帆布。借着稀疏的星光，他看到了一米半之外的卡拉维尔的挡风玻璃和一张几乎贴在玻璃上的、微微向旁边歪着的、正在抽搐的人脸。工程师赶紧找来了托努斯的主人，年轻军人立刻跑去叫医生。那人服毒自杀了，他用铅笔在记事本上写下的字句足以证明，另外还找到了一封写给一位名字叫做什么伊维蒂、在维埃宗离弃了他的女人的信。幸亏人们已经习惯于躲在汽车里睡觉（夜里很冷，没人愿意留在外面），而且很少有谁会去注意那些穿过车队悄悄溜到路边去解手的人。托努斯的主人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医生同意了他的建议。如果把尸体遗弃到公路边上，至少也要使后面过来的人看到了伤心；把它扔到田野里面去，又会激起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早在前一天夜里就对另



一片的一个出去寻找食物的小伙子进行过恐吓和攻击。阿里阿内上的农民和 DKW 上的推销员带有足以把卡拉维尔的行李箱密封起来的器具。他们开始动手之后，王妃上的姑娘凑了过去，她紧紧地抓着工程师的胳膊直打哆嗦。工程师对她悄悄地讲了事情的经过，使她安静下来之后，把她送回到自己的车里。托努斯的主人带着大家把尸体塞进了行李箱，年轻的军人用手电筒照着亮，推销员用胶带和胶水把行李箱密封了起来。鉴于 203 的女人会开车，托努斯的主人就决定让她的丈夫来管卡拉维尔，因为这辆车刚好在 203 的右侧。这样一来，天亮之后，203 上的小女孩发现爸爸又有了一辆汽车，于是就一连几个钟点在两辆车上跑上跑下，还把一部分玩具搬进了卡拉维尔。

大白天人们也开始感觉到有点儿冷了，已经没人再肯把外衣脱下来。王妃上的姑娘和两个尼姑清点了可用来防寒的衣物的数目。人们偶然在汽车里或者衣箱里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件毛线衫，另外再加上毯子、一件风雨衣和一件



薄大衣。拟定了一个需要优先照顾的人的名单,把这些防寒衣物进行了分配。缺水的问题又一次提了出来,托努斯的主人指派工程师等三个人去找当地人联系。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当地的排外情绪竟是那么严重。只要有人从公路上跨下一步,立刻就会遭到从四面八方投来的石块的袭击。半夜三更的时候,居然有人将一把大钐镰扔到了 DKW 的车顶上,最后落到了王妃的旁边。推销员吓得面无血色,躲在车里,一动也没敢动。但是,德索托上的那个美国人(他不属于这一片,但人们都非常喜欢他那无忧无虑的性格和爽朗的笑声)立即跑了过来,挥起镰刀,用尽全身的力气,使劲儿朝田野里扔去,同时还破口大骂。然而,托努斯的主人却认为此刻不该再加剧敌对情绪,说不定还有可能再派人出去找一趟水。

已经没人再去计算那一天或者那些天一共前进了多长的距离。王妃上的姑娘估计是 80 公尺到 200 公尺;工程师没有那么乐观,但却喜欢跟自己的女邻居无休止地讨论这个问题,并



且有意要把她搅糊涂，目的是把她从 DKW 的推销员身边吸引过来，因为那人正利用自己的职业手段百般地讨好她。那天下午，负责照管弗洛里德的小伙子跑去告诉托努斯的主人说，有一辆福特-墨丘利高价卖水。托努斯的主人拒绝了，但是天傍黑的时候，一位尼姑跑去找工程师讨一口水，说是 ID 上那位由两个尼姑和王妃上的姑娘轮流照顾着、一刻也不放开丈夫的手的老妇人难受得直哼哼。还剩有半升水，几个女人把它全都给了那个老妇人和博琉上的太太。当天夜里，托努斯的主人自己掏腰包买了两升水。福特-墨丘利答应第二天再多弄一些来，不过价钱要加倍。

很难把人召集起来进行讨论，因为天气是那么冷，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离开汽车。电瓶里的电量已经不多，不可能老把暖气开着。托努斯的主人决定，两辆设备最好的车，在必要的情况下，要留给病人使用。人们用毯子紧紧裹住身体（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把自己汽车里的壁毡撕下来做成背心和帽子，别人已经开



始学起他们的样子来),尽量少开车门,以便保持里面的温度。在一个非常严寒的夜里,工程师听到了王妃上的姑娘的哽咽的哭声。他不声不响地一点儿一点儿打开车门,伸出手去,在黑暗中摸到了姑娘那满是泪水的脸蛋儿。姑娘没作任何推托,跟着工程师到了404上。工程师帮她在坐席上躺好,并把惟一的一条毯子盖到了她的身上,然后又把风雨衣加了上去。这辆救护车里面更是漆黑一片,因为窗户全都用帆布遮了起来。有时候,工程师还要把那两块遮阳板放下来,再把衬衣和毛线衫挂上去,使汽车同外面完全隔绝。快天亮的时候,姑娘悄悄告诉工程师,自己在开始哭以前,仿佛觉得看见右前方有城市的灯火。

也许那果真是座城市,不过晨雾弥漫,能见度不超过20公尺。有趣的是,那一天车队确实推进了不少,可能有二三百米。这同电台刚刚讲的情况是一致的(除了托努斯的主人必须随时了解情况外,几乎已经没人再听收音机了),广播员着重报告了为疏通高速公路而采取的非



常措施,同时还提到了交通队和警察们的紧张工作。突然,两位尼姑中间的一个发起谰语来。她的同伴完全被吓傻了,两眼呆呆地望着她。王妃上的姑娘赶紧把香水瓶里的一点底子倒出来涂到她的太阳穴上。尼姑提到了阿尔马热东、祭九、冥罚。医生过了好久才来,因为从中午就开始下雪,他不得不扒开汽车两边的积雪,蹚出一条路。他为找不到镇定的针剂而深深抱憾,只好建议把病人挪到采暖设备稍好一点儿的车里去。托努斯的主人把尼姑请进了自己的汽车,他的儿子钻进了卡拉维尔,刚好 203 的小女孩也在那儿。他们玩着汽车,高兴异常,因为他们是惟一没有挨饿的两个人。那一整天和随后的几天里,大雪几乎就没有停过。车队每次前进,都不得不临时想办法清除掉每辆汽车之间的厚厚积雪。

任何人都不会对通过什么办法弄到食物和饮水感到大惊小怪。托努斯的主人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筹集资金并且想方设法在交易中捞到更大的便宜。福特-墨丘利和一辆波斯切每天



夜里都来兜售。托努斯的主人和工程师负责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进行分配。ID 上的老妇人在几个女人的精心照料下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尽管是处在昏睡的状态。博琉上的那位太太几天前一直觉得恶心,并且经常昏厥,由于天气变凉,现在已经好了,不仅如此,还在照顾那位体弱多病、性情又有点孤僻的尼姑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年轻军人的妻子和 203 上的女人负责照料两个孩子;DKW 上的推销员,可能是为了消解由于王妃上的姑娘爱上了工程师而产生的烦恼吧,没完没了地给孩子们讲着故事。到了夜里,所有的人都沉入另外一种隐秘的生活里。汽车门有时会悄悄打开,放进或者放出一个瑟缩着的人影。谁都不会去看上别人一眼,人们全都变成了瞎子。裹在污秽的毯子下面,通过指甲长时间未经修剪过的双手,在禁闭似的环境里和脏衣服的气味中,也还有人能够找到片刻的幸福。王妃上的姑娘没有看错:远处确实出现了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车队正一点儿一点儿地朝那儿移近。西姆卡上的一个小



伙子每天下午都要爬到自己的车篷上面去，身上裹着汽车壁毡和绿色粗麻布的碎片，充当着严守岗位的瞭望哨。每当他对长时间地搜索着地平线而又一无所获感到厌倦了的时候，就把目光转到自己周围那些不知看过多少遍了的汽车。他常常会不无醋意地发现王妃上的姑娘呆在 404 里面：不是一个人正在抚摩另一个人的脖子，就是刚刚接过吻后分开。这个小伙子和工程师已经成了朋友，于是，只是为了开开玩笑，他就大声告诉他们要往前开车了。只见姑娘不得不匆匆离开 404 钻进自己的车里去，但是过不了多久，她就又回到 404 里面去寻找温暖。西姆卡上的那个小伙子满心希望能把另一片的某个姑娘勾引到自己的车里来，然而，在那种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这是连想都不要想的事情，更何况前面那一片和以托努斯的主人为首的这一片曾经为了一听炼乳而闹翻了，相互之间视为仇敌。除了跟福特-墨丘利及波斯切保持着正式的贸易关系外，他们同任何一片的人们都没有任何交往。所以，西姆卡上的小伙子



只好自叹命运不济，在飞雪和寒风逼使他哆哆嗦嗦地钻进自己的汽车之前，只好忠于瞭望哨的职责。

刮风下雨的季节到了，人们的情绪愈加低落，物质供应也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天气不再那么冷了。接着，白天就已经温暖和煦、阳光明媚，人们又可以走下汽车，互相攀谈，并且和附近各片重修旧好。各片的头头们一起分析了形势，最后也同前面那片取得了谅解。福特-墨丘利突然失踪，人们对此议论了很久，但是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波斯切照旧前来，并控制了黑市。饮水和罐头从来没有完全断绝过，不过资金越来越少，托努斯的主人和工程师正在为真的到了没钱给波斯切的那一天可怎么办发愁。曾经议论过搞一次突然袭击，把那家伙抓起来，逼着他供出那些东西的来源，但是，那几天刚巧车队前进的速度较快，各位头头宁愿等等再说，以免由于错误的决定而冒险把事情彻底弄糟。工程师几乎已经心甘情愿地对一切全都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了，但是，王妃上的姑娘



的羞怯告白却使他一时间手足无措。然而，他很快就清醒了，知道那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再说，让她给自己生个儿子，简直就跟每天夜里分配食物和悄悄地到公路边上去走一趟一样，顺理成章，天经地义。ID 上的老妇人的去世也没有使任何人感到震惊。只是又得趁着夜里忙活一阵，并且还要陪伴和安慰那位不肯承认现实的丈夫。前面的两片打起架来，托努斯的主人不得不出面仲裁，勉强解决了纠纷。随时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没有办法预先作出安排。最重要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人们最想不到的时刻；最微不足道的人竟会最先看到了光明。站在西姆卡的顶上，性情活泼的瞭望哨仿佛觉得远处地平线发生了变化（当时正值黄昏，阳光平射过来，暗淡而微弱），500 公尺、300 公尺、250 公尺开外，正在出现不可思议的情况。小伙子冲着 404 喊了起来，工程师对王妃上的姑娘嘀咕了点什么，姑娘立即回到了自己的车上。这时候托努斯的主人、年轻军人和那位农民也都跑了过来，小伙子站在车顶，用手指着前方，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话,就像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果真是事实一般。公路上开始骚动起来,那是一种仿佛刚刚从永难终结的昏睡中醒来开始试验自己的力量、虽然沉重但却不可遏止的迁徙运动。托努斯的主人大声吩咐人们立即回到自己的车上去。博琉、ID、菲亚特 600 和德索托同时起动了。现在双马力、托努斯、西姆卡和阿里阿内也开始活动起来。西姆卡上的小伙子犹如自己取得了什么非凡的成就一般,得意扬扬地转身望了 404 一眼,并且对也已开始缓缓行进的 404、王妃、两位尼姑的双马力和 DKW 挥了挥手臂。然而,问题在于需要知道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在 404 和王妃还保持并行状态的时候,工程师几乎像履行例行公事一样向姑娘讲出了自己的疑问,并且对她微微一笑,让她不要泄气。紧跟着,大众、卡拉维尔、203 和弗洛里德也缓缓起动了。车子先以头挡的速度开了一段距离,随后挂上了二挡,虽然不像以往那样必须刹车,但似乎也不可能再快了。人们把脚牢牢地蹬在加速踏板上,期望着



能够进入三挡。工程师伸出左臂想要抓住王妃上的姑娘的手,结果却只是碰到了她的指尖。工程师看到姑娘的脸上露出了怀着某种希望的微笑,于是心中想道:他们就要到巴黎了,他们将洗个澡,一起找个地方,到他家或者她家去洗澡、吃饭,没完没了地洗、吃饱喝足,然后是家具,一个布置有家具的卧室,一个卫生间,还有可以好好刮刮脸用的皂膏,外加厕所,吃饭、上厕所、睡大觉,巴黎意味着一个厕所、两条床单和顺着胸脯和大腿流下来的热水,也不能没有指甲剪、白葡萄酒,接吻之前先要喝点白葡萄酒,光天化日之下钻进干净的被窝相互之间真正了解一下之前先要让自己的身上带有薰衣草香精和花露水的气味,然后再去洗澡,不过这次只是为了好玩,相爱、洗澡、喝水、理发,上厕所,抚摩被单,躲在被单下面互相抚摩,浸在肥皂泡沫和洗澡水里相爱,还得刷牙,然后再去考虑有什么事情要干,再去考虑儿子和其他各种问题,再去考虑未来,这一切都将变为现实,只要别停下来,只要车队继续行进,哪怕还挂不上三挡,

哪怕是还得这样以二挡的速度行进,但是要行进。404 的前保险杠撞了西姆卡的车身,工程师坐在座位上向后仰了仰身子,但是,突然发觉车队的速度加快了,自己也可以加快速度而不必担心撞着西姆卡,西姆卡已经开始加速,但是并没有撞着博琉的危险,背后的卡拉维尔跟了上来,所有的车子都是越开越快,完全可以挂上第三挡而不使发动机受到损害,拉杆令人难以置信地挂到了三挡,车子在平稳地前进,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工程师感动而迷惑地望了望左侧,想要找到王妃上的姑娘的眼睛。由于车速不断加快,各排车子理所当然不可能齐头并进,王妃已经领先 1 公尺,工程师只能看到姑娘的后脑勺和侧影。当姑娘转身来看工程师的时候,惊奇地发现 404 已经落后得更多了。工程师微微一笑,意思是让姑娘放心,与此同时猛地加快了车速,但是他不得不又立刻刹住,因为差一点儿就撞到了西姆卡。工程师使劲儿地按了按喇叭,西姆卡上的小伙子通过后视镜看了他一眼,做出了无可奈何的样子,并用左手指了指和自己



的车子紧紧贴在一起的博琉。王妃已经领先 3 公尺,和西姆卡并行,从后面赶上来的 203 上的小女孩冲着工程师挥动着手臂,并把自己的布娃娃举给他看。右边出现的红车使工程师一愣,尼姑的双马力和年轻军人的大众全都不见了踪影,代之而来的是一辆从未见过的雪弗莱,几乎是紧接着,雪弗莱就又赶到前面去了,随后是一辆兰西亚和一辆雷诺特 8。左边跟 404 齐头并进的是一辆正在一点儿一点儿超过它的 ID,但是在正式被一辆 403 取代之前,404 还能够看见在前面遮住了王妃的 203。原来同在一片的车子已经四散,不再构成为一个集体。托努斯可能在前面 20 公尺的地方,它的后面紧跟着王妃。与此同时,左面的第三排已经落后,因为工程师没有看到推销员的 DKW,映入他的眼帘的却是一辆西特隆或珀泽奥牌的黑色运货车。所有的汽车全都挂着三挡,赶前或者落后完全取决于每辆车所在的那一排的速度。公路两旁的树木和偶尔出现在夜雾包围之中的房屋迅速地向后移动着。很快每辆车都学着前一辆



的样子亮起了尾部的红灯，夜幕骤然降临了。不时，可以听到喇叭声，计速器的指针越升越高，有的排以 75 公里的速度在前进，也有的是 65 或者 60。工程师本来还希望借助于各排行车速度的变换最后赶上王妃，但是他终于逐渐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原来在一起的那些车子已经不可挽回地四散，陌路之人的朝夕共处、司空见惯了的琐碎事务、在托努斯上面召开的紧急会议、幽静的黎明时分的王妃上的姑娘的爱抚、对玩具汽车着了迷的孩子们的笑声、尼姑捋着念珠的神态都已成为过去。当西姆卡亮起刹车灯的时候，工程师满怀着荒唐的希望之情减了车速，刚刚拉了闸，他就跳下车朝前面跑去。除了西姆卡和博琉之外（后面是卡拉维尔，不过与他无关），他连一辆认识的汽车也没有找到，一些从未见过的面孔以惊奇或者漠然的神情从各式各样的窗口里面望着他。又响起了喇叭声，工程师不得不赶回自己的汽车。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对他作了一个友好的表示，仿佛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并且指了指巴黎的方



向,示意他不要泄气。车队重又启动了,在开始的几分钟里行进得很慢,然后整个高速公路就彻底地畅通无阻了。404 的左手边出现了一辆托努斯,刹那间,工程师觉得人们重又聚到一起,秩序井然,可以齐头并进。

林之木译

我们如此热爱 格伦达





最初那会儿很难看出实情。我走进影院或剧场,整个夜晚自得其乐,不去留意旁人,尽管此前大家都履行了同样的仪式:选择地点和场次,梳妆打扮和打电话,对号就座,继之而来的是黑暗和音乐。在那种地方人们彼此视若无睹,旁若无人,男人或女人端坐在自己的扶手座位上,偶尔有人说出一句为自己迟到致歉的话,一句低声的评论,于是也许一两个人会搭腔,也许谁都不予理会。然后几乎总是沉寂。一道道目光离开邻座,离开观众席,全部投向舞台或银幕。的确,那时很难透过公开的宣传,从绵延无尽的购票长龙、从海报和评论等等表面现象看出热爱格伦达的人如此之多。

过了三四年,由伊拉苏斯塔或迪亚娜·里维罗发起,形成了一个核心,其实这样说也不无唐突,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结成这种联盟的,一切都是在某个时候,在看完电影与朋友的对饮中,在交谈或沉默中突然发生的。后来,我们大家叫它核心,而那些更年轻的人则称之为俱乐部。其实这跟俱乐部毫不相干,我



们只不过是热爱格伦达·加尔松，而这一点就足以把我们同那些仅仅仰慕格伦达的人区分开来。我们同他们一样，也仰慕格伦达，仰慕阿诺克、马里利娜、安尼那、西尔瓦娜，当然还有马塞略、伊维斯、维托里奥和迪尔克，然而，惟有我们才发自内心地热爱格伦达，而我们这个核心之所以称其为核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点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我们将那些言谈中流露出同样热爱格伦达的人视为知己。

以迪亚娜或伊拉苏斯塔为发起人，这个核心逐渐壮大。上映《雪之火》的那一年，我们大约只有六七个人，当《风度翩翩》首映时，核心迅速扩大了，势头之猛令我们几乎难以承受，我们感到，那些三分钟热度的赶时髦的效仿者是一种威胁。于是我们几个发起人，即伊拉苏斯塔和迪亚娜以及另外两三个，决定整顿队伍，凡吸收新人均须经过考验，在饮威士忌和夸夸其谈的闲聊中暗中试探（这种夤夜考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伦敦和墨西哥城司空见惯）。在《回头是岸》首映时，我们不得不以胜利者的、又不



乏忧郁的心情接受一个事实：对格伦达一往情深者大有人在。影院里熟悉的面孔，散场时相遇的目光，女人们怅然若失的神情和男人们悲苦的沉默，对我们来说比一枚徽章、一道口令或一个手势更说明问题。我们神使鬼差似的聚到了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那些原本孤零零的餐桌渐渐越挪越近，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要同一种鸡尾酒，然后抛开转弯抹角的废话，相视无言，一双双眸子中闪动着刚刚看完的那部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中格伦达的形象。

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总共有多少人，或许有 20 个，或许 30 个，因为，有时候一连几个月在一个影院，或者同时在三四个影院上映格伦达的影片，此外还有那种特殊的时候，即格伦达客串戏剧，登台饰演《狂人》中的年轻女杀手，她的成功冲破堤坝，造成我们永远难以接受的轰动一时的格伦达热。那时我们彼此都已相识，许多人互相走访，为的是在一起谈论格伦达。从一开始，伊拉苏斯塔便似乎行使着大家默认的领导权，尽管他从未要求过这种权力，而迪亚



娜·里维罗则慢条斯理地关注着她的那份事情：批准或拒绝吸收新人，以确保我们的队伍百分之百的可靠，避免投机钻营分子和白痴混入的风险。我们最初的那种自由结合，现在已升级为一种团体的组织结构；当初入伙时那种浅尝辄止的问答，也已被切切实实的盘问所替代，内容涉及《风度翩翩》中一组失误的镜头，《雪之火》结尾时的申辩词，《回头是岸》中描写性爱的第二个场面。我们衷心热爱格伦达，不能容忍那些暴发户，那些招惹是非的女同性恋者，那些学究式的美学家加入我们的行列。只要市中心上演格伦达的电影，我们就会每星期五到那个咖啡馆聚会，而当市郊的电影院重映她的影片时，我们的聚会便暂停一周，以便给大家留出必要的时间，这些不知怎么的，甚至成了定规；如同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每条义务都毫不含糊，不履行这些义务便会引来伊拉苏斯塔轻蔑的微笑或者迪亚娜·里维罗亲切而威严的目光，迪亚娜总是以这种目光谴责背叛行为，宣告惩罚。



那时，格伦达是聚会的惟一话题，她那无处不在的光芒照耀着我们每个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嫌隙和分歧。只是逐渐地，有几个人（起初怀着一种负罪感）壮起胆子轻描淡写地就事论事，表示了一些不满，他们对个别不够圆满的结局，对或堕入俗套或毫无新意的艺术处理感到茫然和沮丧。影片《鞭子》中美不胜收的玻璃店，或《莫名其妙》的结尾，断断续续被一些灰心丧气的情绪杀了风景，当然我们清楚格伦达对此并不负有责任。我们看过她的导演们的其他作品，了解故事情节和电影脚本的由来，对于它们，我们决不宽容，因为我们开始感觉到我们对格伦达的爱远远超出了纯艺术的领域，无论别人做得如何不尽人意，她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总能保持完好无损。迪亚娜第一个谈起我们的使命，不过她的表达方式是点到为止，并不说破真实的心思。当我们坦率地承认仅仅上影院、进咖啡馆的确不能满足我们对格伦达的热爱时，我们看到她像喝过两杯威士忌那样快乐，脸上绽开心满意足的微笑。



当然,那时我们每个人也同样未把话说白,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装的只有格伦达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只能来自尽善尽美。影片中的那些失误和败笔一下子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我们不能满意《莫名其妙》那样的收场,不能接受《雪之火》中那组有损声誉的赌牌镜头(尽管那局牌戏格伦达并未出场,然而南希·菲利普斯的那种表情和毫不可信的浪子回头的情节,像呕出的秽物玷污了格伦达的形象)。像几乎每次那样,是伊拉苏斯塔明白无误地阐明了等待着我们的使命。这天晚上,我们回到各自的家中,似乎被一种刚刚认识和肩负起的责任压得透不过气,与此同时,我们也隐约看到格伦达未来的完满的幸福,她将白璧无瑕,未受半点损害。

核心本能地停止了发展成员,因为一支大杂烩的队伍不能适应我们所面临的任務。伊拉苏斯塔在雷西费·德·洛博斯的一处别墅安顿停当之后,便谈论起制片实验室的问题。我们给负责搜集影片《回头是岸》全部拷贝的人一一



分派了任务，之所以选中这部影片，是因为相比之下它的问题较少。谁也没有想过提出经费的问题。伊拉苏斯塔曾是霍华德·休斯的合伙人，一同经营过皮钦查锡矿，因此我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必要的执照、喷气式飞机和盟友及赌场抽头。我们甚至没有设立办公处，哈加·洛斯的计算机根据任务和步骤编排了程序。迪亚娜·里维罗发话后的两个月，制片实验室便已装备齐全，能够用另一组镜头替换《回头是岸》中那组描写飞鸟的蹩脚镜头，使格伦达的表演恢复完美的节奏，恰到好处。这部影片是几年前的老片，把它重新推上国际影坛没有引起任何质疑。记忆总是同保存记忆的人开玩笑，使他们自己去更新和修正记忆。也许连格伦达本人也不曾觉察出一丝变化，但是，人们肯定发现了（因为我们人人有目共睹）一种奇迹，即影片同淡化了一切糟粕的美好记忆完全吻合，与理想毫厘不爽。

预定的使命不间断地逐一付诸实现。制片实验室的效用得到确认时，我们完成了《雪之



火》和《三棱镜》的修改工作；其余的影片也按哈加·洛斯手下一班人和制片实验室全体工作人员所精确预计的节奏，按部就班地投入制作。轮到《风度翩翩》时，我们遇到了麻烦，因为石油酋长国的某些人保存着一些拷贝供他们个人消遣，必须采用特殊计谋和手段将拷贝骗到手（我们无须使用其他字眼儿），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包。制片实验室运转极佳，想当初我们还认为它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只不过那时当着伊拉苏斯塔的面我们未敢将此种想法说出口。尤其令人惊奇的是曾经最持怀疑态度的人竟是迪亚娜，但是，当伊拉苏斯塔给我们看新的《莫名其妙》时，我们看到了恰如其分的结尾，看到格伦达没有回到罗马诺的家，而是掉转车头顺着岸边礁石开去，无可避免地辉煌壮烈地坠入激流，令我们心碎肠断。此时我们才知道，人世间可以有尽善尽美，现在，格伦达的完美将是永恒的，在我们心目中永远不朽。

当然，最困难的是决定如何改动、剪辑，如何更换蒙太奇和节奏。由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



去体会格伦达的表演,导致了我们之间的尖锐对立,往往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分析,有时甚至要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强制手段才得以平息。虽然争论中的失败者参与制作那种与其梦想不尽一致的新版本时心情是苦涩的,但是,我认为,已经开展的工作没有令我们任何人失望。毕竟我们都热爱格伦达,无论达成什么样的结果总是有其道理的,许多时候还远远超出预期的效果。有一度还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风波。《时代》周刊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对《雪之火》中三组镜头的先后顺序与他自信无误的旧时记忆不相符表示惊讶。《舆论报》评论员也写了一篇文章抗议对《三棱镜》的删节,并为此摆出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便迅速采取措施,避免可能产生的后遗症。这并不费多大力气,因为人们大都是浅薄之辈,他们健忘,接受或者追求时髦。影坛荣辱如同历史现状一样转瞬即逝,只有在我们这些真心热爱格伦达的人心目中才例外。

实质上,最危险的是核心中的内部纷争,它



将导致核心分裂或瓦解。虽然我们觉得为了共同的使命,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团结,但是某天夜晚,政治哲学搅进了对影片的分析,大家都扯开嗓门吼起来。当时大伙儿干得正起劲儿,忽然有人提出了一些道德问题,责问我们是否正沉湎于一条自淫的镜子走廊,是否正丧失理智地在象牙或米粒上雕刻一件巴罗克式的狂想作品。很难对他们不加理睬,因为这个核心要完成自己的事业,惟有像心脏或飞机那样靠自身的完美协调和有节奏运转。有的批评听起来相当逆耳,譬如指责我们为遁世主义,怀疑我们在做无用之功,偏离了自己时代更紧迫、更需要参与的现实。然而,没有必要断然压制这种刚刚萌芽的异己势力,何况它的代表人物也仅限于要求作些局部修改。他们和我们同样深深地热爱格伦达,这种使我们永远团结一致的感情,以及坚信使格伦达尽善尽美不仅能完善我们自身而且能完善世界的信念,高于和超越了我们之间有关伦理和历史的分歧。不仅如此,我们的苦心终于得到极好的回报,那些“政治哲



学家”中的一位克服了无端猜疑恢复了心理平静之后，亲口对我们说，其实任何有偏颇的事业也都是历史，像印刷术的发明这样功德无量的业绩，也是起因于纯粹个人的、狭隘的愿望，为的是重复一个女人的名字，使之不朽。

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有十足把握地说，现在放映的影片中格伦达的形象已没有一丝瑕疵；世界的银幕奉献给观众的格伦达，正是她本人所希望的——我们可以肯定——样子，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我们从报纸上获悉她声明将退出电影和戏剧界时没有过分吃惊。格伦达无意识地为我们的事业作了神奇的贡献。这并非巧合亦非奇迹，是她心有灵犀，不自觉地顺应了我们这些无名者的一片深情，发自内心，给了我们她所能给予的响应，这一作为最后奉献的爱的举动，泽及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在那些凡夫俗子眼中才被仅仅看做是销声匿迹。我们犹如进入了创世的第七日，沉浸在创造之后得以休息的快乐之中。现在，我们面前不再有潜在的威胁，可以放心大胆地欣赏格伦达的每一部作品，而



不必担心有朝一日失误和败笔重新泛滥银幕；如今，我们怀着一种天使或飞鸟般的轻松感相聚在也许近乎永恒的绝对现实之中。

然而，一位接近格伦达的诗人曾说，永恒的爱是应时之作。一年之后又是迪亚娜得知了坏消息，并告诉了我们。这种事其实司空见惯，也合乎人之常情：格伦达宣布重返银幕，理由很简单，即专业人忍受不了无所事事的失落感，凑巧又有个适合她扮演的角色，一部亟待开拍的电影。谁也忘不了看过市中心的影院重映的《风度翩翩》之后在咖啡馆度过的那个夜晚。伊拉苏斯塔说出了（其实这几乎是多余的）我们所有人心里的滋味，那是感觉不公和反叛的苦水。然而我们是如此热爱格伦达，以致尽管我们万分沮丧，却并不迁怒于她。她当演员，有自己的个性，这有什么过错。可怕的是那台破机器，是名利和奥斯卡影片蜂拥进入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争得的小天地这一现实。当迪亚娜无须同我们商量将手搭在伊拉苏斯塔的胳膊上，对他说“是的，只剩下这惟一的一条路”时，她说出了我



们大家的心声。这个核心从来没有过如此巨大的力量,从不曾像现在这样只一句话便行动起来了。我们郁郁不乐地分手了,心中已为必定会发生的事伤心了,事情将何时发生,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预知。我们确信不会再在咖啡馆里重逢,确信从现在起,每个人都将把我们创造的王国完美珍藏起来。我们知道伊拉苏斯塔将会采取必要的行动,这对他来说轻而易举。我们甚至没有像往常那样告别。往日,在某个夜晚看完《回头是岸》或者《鞭子》之后,我们总是怀着一线重逢的希望。这次确切地说,我们是扭头离去的,借口是时间已晚不得不分手;我们分散着走出来,每个人都希望抹去记忆直至一切成为过去,当然我们心中明白这是做不到的,某天早上,我们还会忍不住翻开报纸看新闻,读那些职业老手们写的赚人眼泪的蠢话。我们决不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在影院和大街相遇时,我们会不失礼地设法避开。这将是这个核心保持其信念的惟一方式,即对已完成的事业保持沉默。我们深深热爱格伦达,要赋予她最终的



不可毀損的完美。我們已經把她抬到了不可觸及的高度，就要避免讓她倒下，使她的忠實追隨者們能繼續百分之百地熱愛她。只要上了十字架就不能活着下來。

胡真才譯

南方高速公路

中午的海岛





马里尼第一次透过舷窗看到海岛时，他正在彬彬有礼地俯身在左排座位上方，把座椅上的折叠塑料小桌放好，准备为乘客送午餐。此前，当他手里拿着杂志或端着威士忌酒杯在通道上走来走去的时候，那位女乘客已经看过他好几次。马里尼不慌不忙地整理着塑料餐桌，心中颇感厌烦地琢磨着是否值得回答女乘客那死死盯着他的目光。那是一个美国女人，许多美国女人中的一个。这时，岛岸通过蓝色的椭圆形舷窗投入了他的眼帘，同时投入他眼帘的还有一道金黄色的沙滩，以及一直伸延到荒凉的高原的一座座小山。马里尼一边将啤酒杯放好，一边冲女乘客微微一笑：

“希腊海岛，”他说。

“噢，对，希腊海岛，”美国女人回答，假装出颇感兴趣的样子。

铃丁零响了一下，马里尼那双薄嘴唇上带着那永不消失的职业微笑直起身来。他开始为一对要西红柿汁的叙利亚夫妇服务，但在机尾部还是停了几秒钟又往下看了一次。那海岛不



大,而且荒无人烟。湛蓝的爱琴海环绕着它,为它镶上了一道洁白得耀眼的、如同石化了的饰边,那是在礁石上和小海湾中激起的白色浪花。马里尼看到荒寂的海滩向北方和西北方伸延,其余都是陡峭的伸进大海的山峦。那是一座多岩石的岛,一座无人居住的岛,尽管北方海滩附近那片铅灰色的斑块可能是一座房子,或者是一片原始的房子。乘务员将罐装西红柿汁打开递给乘客,待他直起身来的时候,海岛已从机窗中消失了。他从那儿看到的只是一片蓝色的海,一道绿色的没有尽头的地平线。他无目的地看了一下手表,那时恰恰是中午。

马里尼本喜欢派他飞罗马——德黑兰航线,因为那条航线上的风景不似北方航线上那么忧郁凄凉,姑娘们似乎总是喜欢飞东方航线或了解意大利。四天之后,当马里尼帮助一个丢掉了小勺、伤心地向他举着手中的点心盘的孩子时,他又发现了海岛。这次看到岛岸的时间跟上一次差八分钟,但是当他在机尾探身透过舷窗朝下望时,他半点疑问都没有了。那海



岛的形状清清楚楚，活像一只乌龟，只是没有把爪子从水中露出来。他一直凝望着那座海岛，直至有人叫他。这一次他可以肯定了：那片铅灰色的斑块是一片房舍。而且他还看清了岛上有少量的耕地，它们一直延展到海滩。在贝鲁特作中途停留的时候，他看了看乘务员地图，暗自猜度那海岛是不是霍罗斯岛。无线电报务员是一个冷漠的法国人，他对马里尼对海岛如此感兴趣表示惊讶。“所有这些海岛都差不多，两年前我就开始在这条航线上工作，很少注意它。好吧，下次再看到时告诉我。”那不是霍罗斯岛，而是西罗斯岛，是旅游景点上的许多岛屿之一。“这种岛过不了五年就会沉进大海中，”他们在罗马喝酒时，航空小姐对他说。“如果你想就去快点，野蛮人随时都可能到那儿去，目前岛上的人在日夜警戒。”但是，每当回想起来，或者走到一个舷窗附近的时候，马里尼仍旧想着海岛，看着海岛，而几乎每次看完之后，最终总是耸耸肩膀。这件事真没意思，每周都在中午时间从西罗斯岛上空飞三次，这简直不像是真的，就跟是



中午飞在西罗斯岛上空每周做三次梦一般。那一切都仿佛是伪造的，是一种无意义的幻觉。如果说还有真实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他想再次看到海岛的欲望，中午前看手表的动作，以及那蓝得几乎发黑的海岸边的洁白耀眼（可说刺眼）的白色浪花带同他的视觉的刹那间接触。当然，还有那些铅灰色的房子，在那儿，渔夫们几乎难得抬起头来注视那个非现实的世界的变幻。

八九个星期之后，当有人提议让他飞占有各种好处和方便的纽约航线时，马里尼心中暗想：这下机会来了，可以与那种天真而讨厌的怪癖告别了。他口袋里装着一本书，那是一位有着地中海东部地区名字的流浪地理学家的著作，这本书对西罗斯岛的介绍比一般的旅游指南详细得多。但是，最后马里尼像听耳旁风那样拒绝了飞纽约航线。他躲开一位上司和两位女秘书大为吃惊的面孔，到航空公司的酒馆里去吃饭了。卡尔拉在那儿等着他。这姑娘对他作出的决定表示失望和不安，但马里尼却处之



泰然。西罗斯岛的南岸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但是岛的西北岸却有吕底亚^①移民的足迹,抑或是古希腊史前克雷塔岛和米塞纳斯城移民的足迹。哥尔德罗教授在那儿曾发现两块刻着象形文字的石头,那是渔民们在小码头上作桩子用的。卡尔拉感到头痛,几乎马上就离开了酒馆。章鱼是岛上寥寥无几的居民的主要资源,每五天来一条船装鱼产品,同时卸下一些粮食和布匹。旅行社的人告诉马里尼,要去岛上,他必须从雷诺斯租一条专船,或者也许他可以乘一条收章鱼的小艇去那儿。但是,能不能乘小艇,马里尼只有到雷诺斯才能知道,因为旅行社在那儿没有联系人。不管怎么说,去岛上过几天的想法只不过是6月度假时的一个计划。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顶班飞突尼斯航线,后来就罢工了,卡尔拉又回到帕莱莫她姊妹家中。马里尼到皮阿萨·纳沃纳附近的一家饭店里下榻,那儿有一些旧书店,他可以在百无聊赖中找

① 小亚西亚古国。



些有关希腊的书作为消遣,有时也翻翻会话教科书。他很喜欢 Kalimera^① 这个词,在酒吧间跟一个红头发的姑娘作练习,并且跟她上了床。他了解到姑娘的爷爷在奥多斯,害嗓子痛病却说不出原因。罗马开始下雨了,在贝鲁特达尼亚总是在等着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都和亲戚和病痛有关。一天,他又一次飞德黑兰航线,又在中午看到了海岛。马里尼久久地站在机窗旁目不转睛,以致新来的空姐称他为坏同伴,并且把他送餐的数目记了下来。这天晚上马里尼在菲鲁斯请那位女乘务员吃饭,他早上工作时的心不在焉很快便得到了原谅。卢西娅劝他把头发理成美国式的,他跟卢西娅谈了一会儿西罗斯岛的情况;但是后来他知道,她喜欢希尔顿的英国伏特加。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饭菜不停地一托盘一托盘端上来,送菜的服务员脸上总是面带微笑,而乘客则在这种微笑中得到享受。在返程中,飞机飞过西罗斯岛

① 希腊问候语,意为“您好”。



的时间是早上8点钟。此时阳光射在飞机左边的舷窗上，乘客几乎看不清那个龟形的金黄色的海岛。马里尼宁可等到返程时中午欣赏那个海岛，他知道，在那个时间他可以在舷窗旁多呆上一会儿，让卢西娅（然后是费利萨）去傻乎乎地为乘客服务。有一次，他照了一张西罗斯的照片，但是洗出来却很模糊。岛上的事情他已经了解了一些，他强调指出，这个海岛已经在两本书中提到过。费利萨告诉他，飞行员都称他为海岛狂人，但他听了却没有表示不悦。卡尔拉刚刚给他写过信，告诉她她决定不要孩子。马里尼把两个月的工资寄给了她，他想余下的钱已经不够度假用了。卡尔拉接受了他寄去的钱，并且通过一个女友告诉他，她可能跟特雷维索的一个牙科医生结婚。在中午时刻，一切对他都是无足轻重的，不管是在礼拜一，礼拜四还是在礼拜六（每个月他都要在飞行中过两个这样的日子，还有一个礼拜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地发现，费利萨是惟一对他有所理解的人。他们有一种默契，每



到中午，他一坐到机尾的舷窗旁边，就由费利萨为乘客服务。海岛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分钟能看得见，但是此时空气是如此的清新明净，大海把它剪裁得如此妥帖和细腻，以致岛上每一个最小的细节都与他往日飞行中的记忆丝毫不差地相吻合：北方高地上绿色的斑块；铅灰色的房舍以及晾在沙滩上的渔网。当没有渔网晾在沙滩上的时候，马里尼就不免感到遗憾，仿佛那地方成了贫瘠之地，几乎是对那儿的一种侮辱。他本想在飞机飞过时拍摄海岛的外貌，以便在饭店里重温岛上的风光，但是，他还是把摄影的钱节省下来了，因为差不多再有一个月假期就到了。他对天数的计算不是太清楚，因为今天跟达尼娅在贝鲁特，明天跟费利萨在德黑兰，而他的弟弟则几乎总在罗马，一切都有点模糊，一切又都是那样的轻巧和亲切，而且，不管是在飞行之前还是在飞行之后，他的日程都是排得满满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在飞行之中，一切也都是模糊的，轻巧而亲切的，但同时也是愚蠢的，直至他在机尾的舷窗旁弯下身去。那时他感到



了冰冷的玻璃，仿佛那是水族馆的边界，在那儿可以看到金色的乌龟在深蓝色的大海里缓慢地移动着。

这一天，晾在沙滩上的渔网清晰可见，如果有人打赌，马里尼敢于保证左方海边上那个黑点儿是个渔夫，他大概正站在那儿望着飞机。“Kalimera，”他荒唐地在心中这样想。再等已没有什么意思了，马里奥·麦罗里斯将借给他他旅行所缺的那部分钱，那样，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他就可以踏上西罗斯岛了。他的双唇贴在窗玻璃上，想到他将攀登上那片绿色的斑块，在北方小海湾里赤着身子，跟男人们一起钓章鱼，用手势和笑容同他们交流思想，他脸上不禁泛起了笑意。一旦下定决心，便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先乘了夜班火车，又乘了早班船，然后换乘了一条又破又脏的船，在里诺斯稍事休息，跟港口上小艇艇长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乘小艇在甲板上过夜，欣赏着满天的星斗，吃着羊肉喝着茴芹酒，天亮时在岛中穿行，太阳一出便登上了海岛。艇长把他介绍给了一个老头儿，那大



概是岛上的族长了。克拉伊奥斯拉着他的左手望着他的眼睛同他不慌不忙地谈了话。这时来了两个小伙子，马里尼知道那是克拉伊奥斯的儿子。艇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他蹩脚的英语一个词一个词地蹦出来：“25个居民、章鱼、5幢房子、捕鱼、意大利来访者付克拉伊奥斯住宿费。”当克拉伊奥斯对马里尼付德拉克马^①提出异议时，小伙子们笑了起来。马里尼也笑了起来。他已经和小伙子们交上了朋友。他看着太阳从大海上升起来，海水已不似在空中看时那么蓝了。老头儿的房间很寒酸，但却干干净净；那儿有一罐水，散发着鼠尾草和熟皮的味。

老头和两个儿子去往小艇上装货，将马里尼一个人留在那儿。后者脱掉了旅行服换上了泳裤和拖鞋，在岛上走了起来。岛上还看不到什么人，太阳慢慢地热起来，草木丛中散发出一种越来越浓的微妙的气味，有点酸，但酸中搀杂着海风吹来的碘的气味。当他走到北边的高

① 古希腊、罗马银币名，现代希腊货币单位。



地，看到了最大的一个海湾时，那大概是早上 10 点钟。尽管他非常喜欢在沙滩那边游泳，但此时他还是愿意一个人呆在高地上。海岛完全把他迷住了，他感到是如此的高兴和亲切，以致他的大脑停止了思维和对事物的选择能力。太阳灼烤着他的皮肤，海风吹击着他的皮肤，他脱光衣服，从一块岩石上跳进大海。海水是凉的，但他感到很舒服。他让汹涌的水流拖着他走，直到一个岩洞前。他把上身露出水面，仰浮在水上任其漂流，一时间他接受了岛上的一切，他想到了未来。他知道毫无疑问他不再离开海岛了，他将寻个办法永远留在那儿。此时他想到了他的弟弟，想到了费利萨，想像着当他们知道了他留在了一块人迹罕至的巨石上靠捕鱼为生的时候，他们脸上会是怎样的表情呀！但是，当他转过身来朝岸边游去的时候，就已经把他们忘在脑后了。

太阳立刻将他身上的水晒干了。他朝房舍走去，那儿的女人们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接着便跑进家中将门关上。他毫无目标地打了个招



呼,然后向海滩上的渔网边走去。克拉伊奥斯的一个儿子在那儿等他,马里尼对他指了指大海,约他一块下去游泳。小伙子给他指了指身上的布裤和红衬衫表示犹豫,但接着便向一幢房子跑去。回来时,他几乎全裸着身子。他们一起跳进了大海,海水已变得温暖,在上午 11 点钟的阳光下,闪烁着炫目的光芒。

两个人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约纳斯开始说出一样样东西的名字。“Kalimera,”马里尼说,小伙子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几乎把肚子笑破。然后,马里尼重复着约纳斯说的话,接着又教他意大利语。几乎是在地平线上,小艇渐去渐远,越变越小,最后消失了。马里尼感到现在真的是只有他和克拉伊奥斯以及他的儿子们呆在海岛上了。他先在那儿住几天,付给克拉伊奥斯房租,学会捕鱼。等到某一天下午,他跟他们熟悉了之后,他就告诉他们他要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劳作。他站起身来,跟约纳斯握了握手,然后缓步朝小山走去。山坡很陡,他一边攀登,一边陶醉地品尝着爬高的滋味,并且不停地回



过头来去看晾在沙滩上的渔网，看女人们的情影，她们正在跟约纳斯和克拉伊奥斯眉飞色舞地交谈着，还不时地一边笑，一边侧目看他。当他到达那片绿色斑块的时候，他眼前展示的是一个奇特的世界，在那儿，百里香和鼠尾草的香味在烈日的灼烤下和海风的吹拂中浑然一体，成了浓浓的同一种气味。马里尼看了看手表，然后颇不耐烦地将它从手腕上摘下来，塞进游泳裤的口袋里。那时，他想到要杀死那个族长老头儿并非易事，但是，在那座小山的高处，在强烈的阳光下，在那个空间里，真的要干他认为也并非不可能。他是在西罗斯岛上，他真的到了那儿，可他在过去曾多少次怀疑过他能否有朝一日到那儿呀。他仰面躺在滚烫的石头上，忍受着石头棱角的刺痛和火一般的烤烧，垂直地望了望天空。突然，远处传来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他闭上了眼睛，心想“我不去看飞机，不让飞机又一次飞越海岛上空时产生的那种歹心邪念污染自己”。但是，在眼皮遮盖的阴影中，他



想像着此刻费利萨正在推着托盘一个位子一个位子地给乘客们送餐，替他顶班的大概是希奥西奥，也或许是从另一条航线上调来的新乘务员，反正此人同样是一边给乘客递着葡萄酒或咖啡一边微笑着。回忆起那许多往事他再也受不了，于是睁开眼睛站起身来。就在这同一时刻，他看到了飞机的右翼，几乎就在他的头上方。飞机不可解释地倾斜着，涡轮机的声音变了调儿，近乎是垂直地坠入了大海。马里尼飞速地从山上跑下来，在岩石间磕磕绊绊，碰碰撞撞，一只胳膊划出许多伤痕。海岛遮住了飞机坠落的地方，但是，他在到达海滩之前拐了个弯儿，顺着一条想到的捷径穿过了第一个山嘴，到了一片最小的海滩上。飞机的尾巴就撅在大约100米开外的地方，一动不动，静悄悄的，没有了一点声响。马里尼跑了几步，跃身跳入水中，他期望着飞机还能浮出来漂在水面上。然而，在飞机坠落处的附近，除了看到一道白色的浪花，一个荒唐地摇荡着的纸箱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了。但是，几乎到了最后他已经无意再继续游



下去的时候，他发现有一只手伸出了水外。那只是瞬间的事情，但他却足以使马里尼改变了游泳方向，潜入水中，抓住了那个人的头发。那个人也挣扎着要抓住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马里尼让他喘气，却不允许他太贴近自己。他扯着头发，慢慢地将他拖到岸边。他抱起那个穿着白色衣服的躯体，将他平放到沙滩上，他看到他脸上挂满白沫，嗓子里有一道巨大的伤痕流血不止，显然他是死定了。人工呼吸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每按一下，那道伤痕似乎就裂得更大些，仿佛一张令人恶心的嘴在呼唤着马里尼，把他在岛上短短几个小时所感到的幸福和快乐一扫而光了。在鲜血“噗噗”地从嗓子中涌出来的同时，那个人仿佛在向马里尼喊着点什么，但是他已经听不清楚了。克拉伊奥斯的两个儿子飞快地跑来了，后边还跟着一群妇女。当克拉伊奥斯赶到的时候，小伙子们围着那具躺在沙滩上的尸体，还弄不明白他怎么能游到岸上来，并且流着血爬到了那儿。

“给他合上眼睛。”有一个女人一边抹着眼



泪一边这样说。

克拉伊奥斯望了望大海，他想看看还有没有幸存者。但是，如同往常一样，岛上还是只有他们那些人，睁着眼睛的尸体是他们和大海之间惟一的新加入者。

尹承东译

南方高速公路

一朵黄花





这好像是在开玩笑，可是我们是不会死的。这一点，我是从反面知道的，是从认识一个惟一死去的人那里知道的。在坎布龙街的一家酒吧间里，他对我讲述了他的历史。他虽然喝得醉醺醺的，可依然毫不费力地倾吐着他的肺腑之言，老板和老主顾们笑得不行，连酒都从他们的眼里流出来了。而他，准是看到了我脸上流露出来的某种兴趣，于是使劲地跟我拉近乎，后来我跟他终于在一个可以安安静静地喝酒和交谈的角落里尽兴地吃喝了一顿。他告诉我说，他已经从市政府退休，妻子回娘家去了，要在那儿住一个时期，她要尽了种种手法丢下他走了。他一点儿也不显得衰老，也并非无知之辈。只是面孔消瘦，眼睛像患了结核病似的。其实呢，他喝酒只是为了忘记过去的一切，当第五杯酒下肚后他就宣布了这一点。我感觉不到他那作为巴黎人特征的气味。而这种气味，好像只有我们外国人才能闻得出来。他的指甲修理得很仔细，里面一点污垢也没有。

他说他在一辆 95 路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



13 岁的男孩。他对着那孩子瞅了一阵后，发现男孩很像他，起码像他记忆里保存的他自己 13 岁时的模样。渐渐地，他觉得那男孩处处都像他了：面庞、双手、垂在额前的发绺、两只隔得很远的眼睛、胆怯的性格、埋头翻阅连环画报的方式、把头发向后捋去的动作，以及一些难以改变的笨拙举动。他觉得他跟那个男孩像极了，这几乎使他要笑起来。当男孩在雷内斯街下车时，他也跟着下去了，把他那位在蒙特巴尔纳塞街等候他的朋友撂在了那里。他找了个借口跟男孩搭上了话，向他打听一条街在哪里。他听到的是他童年时代的嗓音，可他已毫不惊讶。男孩向那条街走去，两人怯生生地一起走了好几百米。这时，他忽然想把一件什么事情告诉他。不是什么需要解释清楚的事情，而是一件他试图——像现在这样——解释而其实可以不作解释的事情，一件看来不易说清或愚蠢的事情。

总而言之，他要想办法认识男孩的家。他以当年担任童子军教员的资历赋予他的威望开



始向那座要塞中的要塞——一个法国人的住宅走去。他看到的是一派破败的景象，一位衰老的女人，一位退休的大叔和两只猫。事后，他没有费什么劲就让他自己的一位兄弟把一个 14 岁的儿子交给他照管，又经过他的介绍两个男孩便成了朋友。他开始每星期到卢克家里去；那男孩的母亲用重新加热的咖啡招待他，彼此谈论起战事、工作，还有卢克。他们谈的事情像披露机密一般编织得很精确，采用的是那种人们喜欢称之为必然性的明确概念，甚至能够用每天都要讲的话来证明：那卢克还是卢克，人是不会死的，我们也都不会死的。

“我们都不会死的，老兄，你瞧，以前还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点。可是我在 95 路公共汽车上证明了它。那是由于机械方面出了点小毛病，行车的时间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同时发生而不是先后发生的事情。卢克本应在我死后出生，但是相反……不用讲，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他纯属奇迹般的偶然性。我相信我已经对你讲过，那也是一种无需赘言的完全的必然性。如



此而已。但是后来,问题产生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会假装白痴或服镇静药。连同问题一起,他把不会弄错、没有理由加以怀疑的证明也一个个地给扼杀了。我要对你讲的这类事情,我有时想讲给那些白痴听,他们一定会越发感到好笑了。卢克不但曾经是另一个我,而且将来也会跟我一样,跟我这个跟你说话的不幸的可怜虫一样。只要看到他玩耍,看到他总是跌得那么惨:不是扭伤一只脚,便是跌坏一根锁骨,看到他的面皮那么薄:一问他什么事情,便羞得满脸通红,就都清楚了。可他母亲却与之相反,她是那么喜欢交谈,那么善于向别人讲述什么事情,讲述最不能令人相信的心事,最新奇的轶事,八年前的绘画,种种的病症,等等……哪怕卢克在旁边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而那些个善良的妇人当然什么也不会怀疑。在大叔跟我下象棋时,我就好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我甚至预付给了他们直到月底的生活费。我轻而易举地了解了卢克的过去,这只消在老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大叔的风湿病、女门房干的坏

事和政治——中间插问一些问题就办到了。我就这样知道了卢克是在‘将军’和对肉价的焦虑之中度过了童年；也正是因为如此，问题得到了确实可靠的解决。但是当我们要另一杯酒时，请明白我的话：我觉得卢克是我，是孩子时代的我，不过不要把他设想成我的复制品，而应该想像为一种相像的形象，就是说，我们7岁的时候，我的一只手腕脱了臼，卢克的一根锁骨也跌坏了。9岁的时候，我们俩都患过麻疹和猩红热。此外，老兄，据历史记载，我的麻疹持续了15天；由于药物的进步，卢克的麻疹4天就痊愈了。一切都十分相像。所以，还可再举一些例子说明，比如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可能发生的：街角上的面包师与拿破仑长得很相像，而他自己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秩序没有发生动乱，仅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是永远也不可能碰到相像的人的；但是如果他以某种方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就会明白他过去相像，现在仍然同拿破仑相像。他是从一个洗碗碟的人变成蒙特帕尔纳塞街上一家面包房的老板的，他跟那个从科西嘉一跃

而登上法国王位的人是同属一个形象的。如果他回头在自己一生的历史上慢慢地寻找,他就会找到相当于埃及战役、领事职位和奥斯特利茨^①的时刻。他甚至会意识到,几年后他的面包房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将死在一个名叫圣赫勒拿的海岛上^②,但这也许就是在一幢六层楼的某个房间里。不过,他也是一个败将,也是被一片凄凉的水包围着,并且也会为他那像鹰翼似的面包房感到骄傲,你明白吗?”

我明白。不过,我还是想指出,在童年时代,我们也都患过一个时期的典型的病症,而且在踢足球时几乎都打碎过东西。

“我知道。我只对你讲了看得见的相像处。比如说,卢克像我,这并不重要,但是对于在公

① 奥斯特利茨: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1805年拿破仑在此打败奥地利和俄国军队,由于法、奥、俄三国帝王参加了此战,史称“三帝王之战”。

② 圣赫勒拿:非洲西大西洋中的一个岛,1821年拿破仑死于此。



共汽车上的这种发现本身却是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连续性。这一点是不容易被人所理解的，因为它涉及难以磨灭的印象、不准确的记忆和童年时代的故事。我想说明的是，在那时，在我处于卢克那样的年纪时，我已经度过了一个以长期患病开始的痛苦时期，后来痊愈后，我去找朋友们玩耍，结果跌坏了一条胳膊。胳膊刚复原，我就爱上了一位同学的妹妹，像人们不能盯着看一个喜欢捉弄人的姑娘的眼睛那样，我饱尝了痛苦。卢克后来也得了病，也是刚刚痊愈就被邀去看杂技表演，在下台阶时滑了一跤，结果一只脚踝脱臼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吃惊地看到，母亲在窗前哭了起来，手里攥着一方蓝色的手帕，那手帕不是自己家的。”

正如有人必须充当这种生活的反对者那样，我说，童年时代的爱情也是对跌伤和胸膜炎的不可缺少的补充。但是我认为，那架小飞机是另一回事。那是为庆祝他的生日而送给他的——一架螺旋桨飞机玩具。

“当我送给他飞机时，我又想起了我 14 岁



时母亲送给我的装配玩具和我的遭遇。那一次是在花园里，尽管碰到一场大暴雨，天上雷电交加，但是我仍然在街门附近空地的桌子上装配起一台小起重机。有人在房里喊我，我只好进去一会儿。等我回来时，装配玩具的盒子却不见了，门也敞开了。我拚命地叫喊着跑到街上去，但是街上已杳无人迹。就在此刻，对面的酒店里透出来一道光线。这一切，好像是同时发生的。我一面把飞机送给卢克（他像我欣赏我的装配玩具一样快活地望着它），我一面回想着那一幕幕往事。他母亲给我送来一杯咖啡，我们还像往常那样交谈着，忽然听到一阵喊声。卢克向窗口跑去，仿佛要从那里跳下去。他面色煞白，眼里噙着泪水，费力地结巴着说：飞机改变了方向，正巧从半开半掩的窗口飞了出去。‘飞机看不见了，再也看不见了！’他一边哭一边叫着。我们听见楼下有人呼喊，大叔跑上来说，对面的房子着火了。现在你对这一切都明白了吧？对，最好我们再喝一杯。”

后来，他发现我沉默不语，便说：那时他已



经开始考虑卢克，开始考虑卢克的命运了。他母亲把他送进一所艺术与职业学校，以便像她说的使他的生活道路得以顺遂地开始。于是，生活道路已经铺开了。然而只有他——只要不被当作疯子，永远不离开卢克，他是不会开口的——能够对他母亲和大叔说，一切都无济于事，任何事情；丢丑的行为，可悲的陈规，单调的岁月，折磨着皮肉和心灵的创伤，向可恨的孤独和市区一家酒吧间的逃遁，等等，凡是会带来某种影响的行动其结果也都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最不幸的还是卢克的命运，卢克会死去，另一个人重复他的形象，这另一个人也会死去，第三个人会再重复他的形象，就这样循环反复。而对他来说，此时卢克已经不重要了；夜间，他的失眠影响到另一个卢克，影响到名叫罗伯特、克劳德或米切尔的另一些人。这是无数可怜虫的一种属性：他们在不知不觉地重复着别人的形象，却相信自己是有自由和意志的人。虽然他有自己的苦酒喝，但没有什么人能把他怎么样。

“现在，当我对他们说几个月后卢克会死



时，他们都讥笑我。他们太无知了，一点儿也不明白……是的，你也不要那样着眼睛望着我。几个月后，他真的死了，最初得的是支气管炎。我也是在这样的年纪染上了肝炎，被送进医院的。但是卢克的母亲坚持要在家里照料他。我几乎每天都去看他，有时带着我的侄子去跟他玩。他家里一片凄凉，我的来访成了他们真正的安慰：我为卢克做伴，为他带去一包大西洋鲱鱼或夹杏馅饼。人们都习惯叫我去为他们买药，因为我对他们谈起过一家药店，我去买药时总是少收药钱。他们终于答应让我担任卢克的护理员了。可以想像，在这样一个连大夫都不大乐意进出的家里，谁也不会留心最后的病状跟最初的诊断是否完全一致……你干吗这样看我？我说错了什么吗？”

不，他没有说错什么，尽管饮酒已饮到这种程度。恰恰相反，只要不认为可怜的卢克之死是件可怕的事情，那就可以断言，随便一个习惯于想像的人都可能在 95 路公共汽车上产生一种幻想，并使它发展下去，最后在一个正默然死



去的孩子的床边结束。为了让他保持平静，我这样对他说。他双眼望着空中，凝视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口了。

“好吧，随你的便。其实在卢克入土后那几个星期里，我才头一次体验到那种可能跟幸福十分相像的感觉。每个星期我照样到卢克母亲家去，给她带去一包饼干。但是她和她的家对我却不那么重要了，我好像被一种奇异的想法困扰着：我成了第一个会死的人，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在一天接一天、一杯酒接一杯酒地继续消耗着，而最后必将在某个时刻死在某个地方，与某个随便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刻的陌生人的命运一模一样。但是我也许真的会死去，却不会有一个卢克来愚蠢地重蹈一个愚蠢的生命的覆辙。老兄，你要理解那是一种堪称完美的事情，羡慕我有这么一种福气吧，但愿这样的事能继续下去。”

然而现在看来，事情并没有能得以继续。酒吧间和廉价酒证明了这一点，还有那双发散着并非来自身体上的热量的眼睛。不过在他此



后度过的几个月里，他每时每刻都在品味着日复一日的贫寒生活、夫妻关系的破裂和他 50 岁的身体的病痛，他相信自己已必死无疑了。一天下午，他穿过卢森堡街时看见了一朵花。

“在一方花坛的边上，有一朵普通的黄花。我停下来点起一支烟，漫不经心地望着它。那朵花好像也在望着我。那种对望，有时……你知道，任何人都会感觉到那种对望，你该懂得人们所说的那种美，花儿是美丽的，那是一朵极为美丽的花。而我已经被判定：有朝一日我将永远死去。花是美丽的。绝不会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能使我相信那是一个安宁、痛苦的尽头。我将会死去，卢克已经死去，再也不会有一朵花留给跟我们一样的某个人，什么也不会有，绝不会有什么东西，再也不会有一朵花了。燃烧的火柴烧疼了我的手指。我走到广场上，跳上一辆驶向某个地方的公共汽车，开始胡乱地观望着，观望街上的一切和汽车上的一切。汽车到达终点后，我下了车，又跳上开往郊区的另一辆汽车。整个下午，直到入夜，上



车下车我都在想着那朵花和卢克，在行人中间寻找着某个像卢克的人，某个像我的人，某个可能成为我的人，某个知道自己是我而上车的人。最后我终于什么也没对他说就让他走了。我几乎是在保护着他，让他沿着他那可怜的愚蠢的生活之路、那无知的不幸的生活之路走向另一种无知的不幸的生活，走向另一种无知的不幸的生活，走向另一种……”

我付了酒钱。

朱景冬译

南方高速公路

被侵占的住宅





我们喜欢这所住宅，因为它除了宽敞和古老（今天，古老的房屋拆下的材料，是能够卖大钱的）而外，还保留着关于我们的先祖、祖父、父母和我的整个童年时代的往事。

只有我和伊雷内两个人长久地住在这所住宅里，住得已经很习惯。这所住宅满可以互不干扰地住下八个人，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住，确实有点荒唐。我们7点钟起床，早晨打扫房间；11点左右，我把其余的房间留给伊雷内整理，自己去厨房做饭。中午我们吃饭总是准时的；除了几只脏盘子要刷洗外，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我们一面吃午饭一面想着这所深宅大院，觉得住得挺快活。为了使房间保持清洁，打扫卫生我们两个也绰绰有余了。我和伊雷内谁也没有结婚。她没有重要理由就拒绝了两个求婚者。至于我，在与玛丽亚·维斯特尔订婚之前，她就死了。我们带着难以理解的想法进入了40岁：我们的这种简单的、悄悄的兄妹间的“同居”，是我们家由先祖奠定的家谱的不可避免的结尾。我们终归有一天将死在这里，游手



好闲的粗暴的表兄弟们将占据这所住宅，并将把它拆毁，好把地皮和砖块卖掉发财。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我们自己就堂堂正正把它推倒，免得时间过迟。

伊雷内是个生来不肯打扰别人的姑娘。除了早晨做的事情外，每天其余的时间她总是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织毛活。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织这么多。我总以为，妇人们这样织东西，无非是想从中寻到不做别的事的有力借口。伊雷内却不是这样。她织的东西总是有用的：冬天的套衫，我的袜子，她的披肩和背心。有时她织好一件背心，由于觉得有点不称心马上又把它拆掉；看着针线筐里的线团连续 8 个小时在不停地滚动，很有意思。每逢礼拜六我就到市上去买毛线。伊雷内信得过我的审美能力，对我买的毛线的颜色总感到满意，我从来也不用去退换。我常利用这种外出的机会，到书店里去一趟，不抱希望地询问一下有关法国文学的新消息。自 1939 年以来，阿根廷进不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然而，这住宅，这住宅和伊雷内是我所喜欢谈论的，至于我，则是无足轻重的。我自问，倘使伊雷内不织毛衣，她能做什么呢？一本书，你可以一读再读；可是一件背心织成后，如果总是再从头织起，就会引起他人非议。有一天，我发现在樟木衣柜下面一个抽屉里装满白色、绿色和淡紫色围巾的盒子。那些围巾带着樟脑味，像绒线杂品店里那样叠放着；我没有勇气问伊雷内，她打算怎样处理它们，我们不需要挣钱糊口，每月乡下都有钱来，钱是不断增加的。可是，伊雷内只喜欢织东西，她的手艺娴熟非凡，我常常一连几个钟头望着她那白白的手、穿来穿去的织针和地上的一、两个线筐。线团在线筐里不停地跳动，很是好看。

在这里，我不能不介绍一下住宅的分布情况：厨房、挂着葛布兰式壁毯的客厅、书房和三间宽大的卧室，都位于面对罗德里格斯·佩尼亚街的最僻静的部分。只有一道装着硬橡木门的走廊把那部分同前一部分隔开，前头有浴室、厨房、我们的卧室和卧室与走廊之间的客厅。

这样，一个人走进门廊，推开玻璃门，就进了起居室；两旁是我们的卧室的门，对面通向最幽静的那一段走廊；沿走廊向前，打开橡木门，门那边就是住宅的另一部分了。或者在走到橡木门之前，向左拐，再顺着一道窄些的廊道往前走就可以走到厨房和浴室。门开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宅子很大。我和伊雷内一直住在这一边，几乎从没有到橡木门那边去过，除非是为了清扫。因为实在难以置信，过不几天家具上就会积存那么多灰尘。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许是一座清洁的城市，但是这应该归功于它的居民，而不是别的原因。空中满是飞尘，一阵风吹来，台架上的大理石面上以及马克拉梅^①菱形台布中间就会落满灰尘，想用鸡毛掸子掸干净是困难的。灰尘飞起来，飘在空中，过一会儿就又落在家具和钢琴上了。

这件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因为事情很简单，没有多余的细节。那是在晚上8点钟，伊雷

① 马克拉梅(Macrame)：一种高级线名。



内正在房内织衣服，我忽然想起要把马黛茶壶坐到火上。我沿着走廊来到半开半掩的橡木门
前，刚绕过通向厨房的拐角，就听见餐室或书房
里有什么声响。那声音模糊而低沉，好像椅子
倒在地毯上的声音或像嗓音嘶哑的低语声。就
在这时，或者过了一会儿之后，我还听见在连接
那些房间和门口的走廊深处有同样的声音。我
赶紧跑到门前，一下子把门关上，同时用身体抵
着门：幸亏钥匙在我们这边。为了更加安全，我
还把长长的门闩插上了。

我到了厨房，烧热了水壶。当我端着马黛
茶回来的时候，对伊雷内说：

“我不能不把走廊的门关上。那面的房子
被人占了。”

她放下手里的活儿，用疲倦的眼睛严肃地
望了望我。

“你敢肯定吗？”

我点了点头。

“这样说，”她拿起毛衣针，“我们得住在这
边了。”



我很小心地吮着马黛茶，但是，她过了一会儿才重新开始做她的活儿。我记得她在织一件灰坎肩，我喜欢那件坎肩。

最初几天，我们感到很伤心，因为我们俩把许多心爱的东西留在被占据的那一边了。例如我的法国文学书籍，就在书房里。伊雷内想起了几块台布和一双冬天穿着很暖和的拖鞋。我心疼我那只柏木烟斗。我相信，伊雷内一定想起了她那瓶陈年柑果酒。我们常常（不过这只是头几天的事）合上衣柜的某个抽屉，不无痛苦地对视着。

“没在这儿。”

又是一件我们丢在住宅那边的东西。

不过，这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清扫工作变得简单多了，即使我们起得很迟，比如 9 点半起床，不到 11 点我们就扫完没事了。伊雷内经常跟我一块到厨房去帮助我做午饭。我们考虑好了，决定这么办：我做午饭的时候，她做晚上吃的冷餐。这么着，我们很高兴，因为傍晚离开



卧室去做晚饭总是很讨厌的。现在，我们只要在伊雷内的卧室里摆好桌子，吃那一盘盘的冷餐就行了。

伊雷内很高兴，因为她有更多的时间织衣服了。为了那些书，我感到有点懊丧。但为了不让妹妹难过，我便开始翻看父亲的集邮簿，来消磨时光。我们过得很快活，各人做各人的事，几乎总是一块呆在比较舒适的伊雷内的房内。有时伊雷内说：

“你瞧我想出来的这个花样。不像苜蓿图案吗？”

过了一会儿，我把一张方纸片放到她面前，让她看欧本和马尔梅迪^①的邮票。我们过得很好。我们慢慢就什么也不想了，过惯了毫不费心的生活。

（当伊雷内大声说梦话的时候，我总是马上就醒。我一向不习惯这种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嗓音或鹦鹉般的学舌。这种声音发自梦境，

① 比利时列日省的两个地区。



不是发自喉咙。伊雷内说,我做梦时是浑身剧烈摇动,有时被子都被扯掉了。我们的卧室,中间隔着客厅。但是晚上,房子里的任何声音都听得见。我们彼此听得见呼吸声,咳嗽声,觉察得到对方拧开床头灯的动作和彼此常有的失眠。

除此而外,宅子内的一切就寂静无声了。白天,金属毛衣针的摩擦声和翻阅集邮簿的纸页的咯咯声则是习以为常的响声。橡木门,我想我已经说过了,它是坚固的。我们一到紧靠被占去的那部分住宅的厨房和浴室里就大声说起话来;要不然,伊雷内就唱摇篮曲。厨房里瓷器和玻璃器皿的声音很大,甚至将其他一切声音都盖没了。在那时,我们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但是我们一旦回到卧室和起居室,家里就安静了。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为了不互相干扰,我们走路甚至都慢慢地迈步。我觉得,这就是夜晚伊雷内开始说梦话时我马上就醒的原因)。

除了结果不同外,事情几乎同上次一模一样。晚上,我感到口渴,在睡下之前我对伊雷内



说我要到厨房去喝一杯水。走出卧室的门（她在织衣服），我就听见厨房里有声音；或许在厨房里或许在浴室里，因为走廊的拐角把声音隔断了。我突然收住脚步，引起了伊雷内的注意。她走到我身边来，一句话没说。我们谛听着那些嘈杂声，清楚地觉察到那声音是在橡木门的这边，在厨房和浴室里，或者就几乎在我们身旁走廊的拐弯处。

我们甚至都没有彼此看一眼，我抓着伊雷内的手臂，拖着她跟我一起，头也不回地跑到玻璃门边。我们背后的嘈杂声变得愈来愈大，不过总是很低沉。我一下关上了玻璃门，我们就呆在门廊里了。现在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

“这边也给占了。”伊雷内说。织物从她手里垂下来，细线一直拖到玻璃门，消失在门底下。当她看到线团落在了另一边，就把织着的衣服扔掉了，看也没有看一眼。

“你没来得及带什么东西吗？”我徒劳地问她说。

“不，什么也没来得及带。”



我们只有身上穿的。我想起我房内柜里那15000个比索。现在已经迟了。

我的手表总算留了下来，我看了一下，已是夜里11点。我用手臂围着伊雷内的腰部（我相信她在哭），就这样走到了街上。在离去之前，我感到恋恋不舍。我把大门关好，把钥匙丢在阴沟里，免得在这个时候，有某个可怜虫企图乘着住宅被占之机，起意行窃而溜进宅里去。

炜华译

南方高速公路

粗 线 画





开始想得太好，说不定以玩笑告终。我想，你高兴地与家人一起看到了这幅画，你把这说成是偶然的，或者说这是某人的奇想，直到第二次才明白，这是故意做的，于是你悄悄仔细地观赏它，甚至过了一会儿你又回来再看一次那幅画，那时你采取了通常谨慎的办法：在大街上最空荡的时刻，近处的角落里没有警察汽车时，你以一种完全漠不关心的样子走近来，但却根本看不到那粗线画的正面，最好从对面的人行道，从能注意到为了装饰门面的玻璃橱窗旁斜穿过去。

你自己想出来这么一种无聊的把戏，这不是对城里存在的社会现象的真正反抗，也不是对宵禁和严格禁止在墙上张贴或乱写号召书的真正反抗。你用彩色粉笔作画只不过是消遣（你厌恶“粗线画”这个术语，因为它太学术气），有时你来看看这些画，你简直感到开心，甚至使你稍微感到有点快慰的是，因为市政局的汽车才开过来，服务人员一边冲洗那些画，一边骂骂咧咧的。对他们来说这画不是政治性



的——禁令对每个人都有效，如果一个小孩胆敢画上个房子或者一条狗，他们总要咒骂着去擦掉它。城里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已不知从哪儿会发生危险；也许正因此，你喜欢深信不疑地作画，每次都能找到一个适当作画的地方和时机。

你从来没让人碰上过，因为你会选择时机：还在清扫大街的汽车出现之前，就为你展现一块给你希望的干干净净的空间。在你从远处望着自己的画时，你看见行人怎样匆忙地朝它看一眼，当然，没人停留，但是谁也没有不看它一眼就走开——这可能是用两种颜色匆忙画出来的抽象构图，或是鸟的轮廓，或是两个相连的形体。只有一次，你用黑粉笔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也痛苦”。没过两小时，这次警察不得不亲自把它擦掉。这件事之后，你便继续只顾作画。

当在你的画旁出现别人的画时，你几乎感到害怕起来，危险感加剧了——又有一个和你一样的人喜欢铤而走险，或者比这更可怕的是，这是个女人，这是另一回事，比起你来，她更大



胆：线条，暖色的色调，天空。既然你至今一个人行动，这对你似乎是一种奖赏；你钦佩她，你为她担心，害怕，你差点露了马脚，当她在你的另一幅画旁再次画上自己的画时，你想站在她的画前笑起来，仿佛警察都是瞎子或者是白痴。

另一种神秘而美好的，同时充满危险的生活开始了。你时常放弃自己的工作跑来，期望能出其不意地遇上她。你选择了能通过一条捷径步入作画的那些街道，你常常在黎明鱼肚白时，清晨3点回家。当你发现她的新画和你的并列在一起出现时，街上空荡荡的，而且你谁也没碰到，由此这街道更加显得空旷。这是你心里感到痛苦与绝望的时刻。一天晚上，她画完第一幅画，你看见了它：用红色和天蓝色粉笔把画画在汽车房的门上，采用了甲虫蛀坏了的树木和钉子帽的结构形式，画面上表现出了她自己的风格，色调清晰，但除此而外，这是请求，或者是提出的问题，是和你说话的方式。你又在巡逻人员寥寥无几——对一切都置若罔闻，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例行公事时，在黎明时你



又来了——在门上余下来的地方匆匆忙忙画了一幅有帆和堤的风景画；如果不细看，那可能就会把这个当作偶然的线条游戏，但是她却能看出它来。当晚你好容易摆脱了警察巡逻队，你在你自己的房间里喝杜松子酒，自言自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一切都像是一幅有声有色的图画，还有一个带船帆的港口，你想像她黝黑，沉默不语，你想像出她的嘴，她的胸脯，你不十分喜欢她。

你突然想起，她要来看看你的答复，她要回到自己画的那儿去，就像你看自己的画那样，尽管在城里市场上行刺事件发生后变得更加危险了，你依然决定接近汽车房，你沿着邻近的街道走过去，并且在角落的一个小饭馆里没完没了地喝啤酒。次日黎明时分，你在灰墙的废墟上画了一个白三角，在三角形周围点了许多点，形似柞树叶子；从咖啡馆的窗子依稀可见那些废墟（汽车房的门已经擦得干干净净，被激怒的巡逻队一次又一次地返回来），在鱼肚白时你走开了，为的是从不同角度看一看这幅画，你从一个



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在店铺里买些各种各样的东西，为了不引起多余的注意。当你听到汽车笛声和看见直对着你的前灯的光时，已经深夜。在废墟那儿是隐约可以辨认出来的人群，你不顾一切地往那儿跑去，偶然的机会挽救了你——一辆汽车从角落里开过来，急忙在一位女警察面前刹住了车，女警察上前拦住了你，于是你看到了一场格斗，一双带手套的手抓着一个黑头发朝前走，用脚击她，发出绝望的喊叫，闪现出一条蓝裤子，随后把她拖进汽车里，开走了。

后来（想到这一切都是由于你在倒塌的灰墙上画了画的缘故，感到那么战栗、可怕），你混入了人群里，并且你看清楚了浅蓝色调的草图——橙子树的图形，这图好似她的名字或者她的嘴。这幅画在警察把她带走之前涂掉了；但没完全涂掉，留下来的足以让你明白，她回答了你的三角形，这是圆圈，可能是个螺旋线，一个完美无缺的形式，它好像标志着“对”，或者“现在”，或者“永远”。



你懂得——你有足够的时间把在中央监狱里发生的事说得详详细细。城里稍微听到点传闻，人们听到了被捕人的命运；如果说人们再次碰到他们当中哪一个人，那他们宁愿不再去注意他，因此他们好像共同地在缄默中消失了，谁都不想打破这一缄默。你十分了解这一点。那天晚上，无论是杜松子酒，还是别的什么都没帮助你——你咬自己的手，用脚踩碎彩色粉笔，直至你沉入醉人的眼泪之中。

是的，时光流逝，而你已经不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你又开始放弃工作，在街上游荡，偷偷观看你和她作过画的那些墙和门。那上面全冲刷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哪怕把一个无辜的女学生用从班上偷来的粉笔忍不住画的那朵花留下来也好。你并没忍耐住，一个月之后，你又在黎明时起来，来到汽车房的那条街。那里没有巡逻队。墙上干净极了；你拿来粉笔，并且在她画了画的那个地方，用绿色的呼声、感激和爱的红色激情填满了门板，你画了一个椭圆形——这是你的嘴和她的嘴，这表示希望，正在



这时，一只公猫从大门口那边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你。角落里传来的脚步声促使你轻轻地跑开了，你躲藏在一堆空箱子的后面：有一个醉汉摇晃着身子，用鼻子哼着小曲走过来，他想猛踢公猫一脚，但却脸朝下正摔倒在那幅画的下面，你这时才放了心，不慌不忙地走了，你披着初升的日光入睡了，你已经很久没这样酣睡过。

在同一天早晨，你在远处好奇地望着：还什么都没擦掉。你中午来了：不可思议的是，一切都原封未动。城外的骚动（你听到了实况广播）使巡逻队丢开了他们通常的本职工作。傍晚，你又回来看看在白天到底有多少人看了这幅画。你等到半夜3点钟又来了，街上空荡荡的，漆黑一片。还在远处你就看见了另一幅画，惟有你才能分辨出它来，那画是那样的小，画得那么高，在你画的左面，你走近一些，体验到了渴望而又充满恐惧的滋味，看见一个橙黄色椭圆形和紫罗兰色的斑点，可以猜得出来，这是某人的一张肿了起来的脸，一只浮肿的眼睛和一张被拳头击破了的嘴。当然，显而易见，还能再画



什么呢?! 现在会给你带来什么消息? 就这样和你告别了, 并且请求你继续作画。在你回到自己那个连一面镜子都没有的避难所以前, 应该给你留下点什么, 这个避难所只有一个最后可以躲藏的壁龛, 在这昏暗的避身处你回想起种种往事, 而有时你想你自己的生活, 想像着你如何再重新作画, 怎样在夜间出去作画。

张琼译

南方高速公路

公共汽车





“要是您方便，请回来时给我带一份《家庭》杂志。”罗维塔太太说道，随即斜靠在扶手椅上睡午觉了。克拉拉一面整理着四轮小桌上的药物，一面用敏锐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房间。什么也不缺，马蒂尔德姑娘会留在家里照料罗维塔太太，女佣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事情。现在可以出门了，星期六的整个下午全由她个人支配，她的女友安娜正等她去闲谈，下午 5 点半钟一道喝甜茶，听收音机，吃巧克力。

下午 2 点钟，当职员们如潮水一般涌出各个办公处门槛之后，帕尔克市政厅一时显得空旷而明亮。克拉拉咯噔咯噔步履清脆地沿蒂诺加斯塔和萨穆迪奥大街下行，享受着 11 月的阳光，阿格罗诺米亚大道两旁的树影把阳光弄得细碎斑驳。她在圣马丁与诺戈亚两条大街拐角处等候 168 路公共汽车时，听到头顶上空一群麻雀在喧闹，她觉得佛罗伦萨风格的圣胡安·玛丽亚·比亚内伊塔在晴朗的天空映衬下似乎显得更红了，塔体高得令她头晕目眩。钟表匠堂路易斯从她身边走过，殷勤地同她打了个招



呼，好像在称赞她那刻意修饰的容貌，那双使她更加亭亭玉立的鞋子和奶油色衬衫上露出的白皙可爱的脖子。168路汽车从空落落的大街上懒洋洋地开过来，车门发出一声生硬的闷响，极不情愿地为克拉拉打开了，她是下午这宁静的街角上惟一的乘客。

她在鼓鼓囊囊的衣兜里寻找硬币，迟迟掏不出钱来买票。满脸表情不大友好的售票员等待着，这位老兄又矮又胖，一副寻衅找碴的架势，两腿微屈站立，车子行进或刹车时都应付自如。克拉拉两次对他说：“买一角五分钱的票。”但这个家伙却始终没有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似乎对什么事情感到新奇。后来，他撕给她一张粉红色车票，克拉拉想起了一首儿歌，大意是：“撕票吧，撕票吧，售票员，撕一张蓝色或粉红色的票；唱歌吧，唱歌吧，请你一面点钱一面唱。”她会心地微笑着，走向车后部找座位。紧挨着安全门的座位正巧空着，她怀着一丝惬意落了座。凭窗而坐总能给人这样的快意。此时，她发现售票员仍在盯着她。汽车行至圣马



丁大街立交桥的拐角处转弯前，司机也回过头来看她，由于距离远，看得很吃力，但他还是发现了缩在座位里的克拉拉。司机是个金黄头发的男子，瘦骨嶙峋，一脸饥色。他跟售票员交谈了几句，两人便一同把目光转向克拉拉，然后，两人又相互交换了眼色，公共汽车颠簸了一下，全速驶入乔罗阿林大街。

“一对蠢货，”克拉拉得意而又不安地想。她一面把车票塞入钱包，一面瞟了一眼捧着一大把麝香石竹花坐在她面前的太太。这时，太太也正扭过头来，从花束上面看着她，目光温柔，如同母牛望着栅栏一般。克拉拉掏出小镜子，立刻聚精会神地察看自己的嘴唇和眉毛。她的后颈有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她怀疑有人在背后不老实，便猛然转过身来，这一次她真的动气了。一个穿硬领衬衫的老头儿两眼距她的脸仅两厘米远，手中的一束雏菊花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坐在汽车尾部那一长排绿色座位上的乘客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望着克拉拉，似乎在批评她的某种行为，克拉拉鼓足勇气承



受他们的目光,但感到愈来愈难堪。倒不是由于投向她的一道道目光和乘客们手中的一束束鲜花使她受窘,而是她原期望这一切能和和气气地收场,能发现诸如鼻子上有一块污斑(可惜没有)之类的笑料。然而那些目光死死缠住她不放,那一束束鲜花似乎也在望着她,使她的笑容刚一绽露便凝滞了。

突然间,她感到心神不定,于是把身子稍稍向下滑动,眼睛盯着前面座位那破旧的靠背,琢磨起安全门的活动杆和下面那行字:欲开此门,请将手柄往里拉并向上提。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玩味着,并没能把它们联成词句。这样,她赢得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和一个用于思考的喘息时间。乘客们打量新上车的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去恰卡里塔墓地的人携带鲜花,也是很正常的。至于说车上的乘客人人都带鲜花,那也差不多可以说是正常的。汽车经过阿尔韦亚尔医院门前时,靠克拉拉座位的一侧,呈现一片空旷贫瘠的荒原,荒原尽头是埃斯特雷利亚高地,那里布满臭水坑,一匹匹黄色的马脖子上吊着



缰绳。阳光刺目，田野的景致了无情趣，然而克拉拉却不得不呆呆地望着，偶尔壮起胆子向车内瞥上一眼。近处的红玫瑰和马蹄莲，更远处极难看的黄菖蒲似乎被揉皱弄脏了，陈旧的粉红色中掺着青紫色的斑点。坐在第三个窗口下的那位先生（他正看着她，现在不看了，这会又在看），带着近乎黑色的麝香石竹花，花朵挤作一团，如同一块皱皱巴巴的皮革。两个高鼻梁的小姑娘坐在前排一侧的座位上，两人合捧一束菊花和变异大丽花，这类花通常只有贫民才买，然而，她俩却并不贫穷，身穿做工考究的上衣、宽褶裙和长筒白袜，高傲地望着克拉拉。她想逼使这两个狂妄无知的少女垂下目光，然而那是四只紧盯不舍的眸子，况且，还有售票员，带麝香石竹花的先生，坐在她身后使她后颈发热的那些人：离她非常近的穿硬领衬衫的老头儿，以及坐在后排座位上的那些青年人。帕特纳尔车站：买去昆卡票的乘客已经到站。

没有一个人下车，只有一个男子敏捷地跳上车来，迎面碰上等候在汽车中段正注视着他



双手的售票员。这个男子右手攥着两角钱，左手捋了捋上衣，对审视的目光全无觉察。“一角五分的票。”克拉拉听他说。同她一样：一角五分。但是，售票员并没有撕票，而是继续注视着他，男乘客终于觉察了，向他做了个亲热又不耐烦的表情，说：“我说过了一角五分的票。”他接过票，等着他找钱。钱还没有拿到手，他已经顺势在那位拿麝香石竹花的先生身旁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售票员找给他五分钱，又俯看了他几眼，似乎在考察他的脑袋，而他正专心致志地观看那黑色麝香石竹花，毫无察觉。那位先生也在观察他，有一两次是迅速扫视他一眼，他也抬眼看；两人几乎同时摇了摇头，然而并无挑衅之意，只是对视而已。克拉拉仍在为前排那两个小女孩恼火，她们久久注视了她一阵，接着又把目光转向那位刚上车的乘客。当168路车开始挨近恰卡里塔墓地围墙行驶时，有一阵儿所有的乘客都看着那位男子，当然也没放过克拉拉。大家之所以没有直接盯着她看，是因为刚上车的男子引起了他们更大的兴趣，然而，她似



乎也被收进乘客们的同一视野中，两人被放在一起观察。真是一群蠢货，就连那两个狂妄的少女年纪也不小了，可是大家每人捧着一束花，放在胸前，举止这般粗俗。克拉拉本想提醒那位乘客，因为不知何故一种模模糊糊的友情在她心中油然而生。她想告诉他，“您和我都买的是一角五分钱的票”，好像这会使得他们两人得以亲近似的；或者碰一碰他的胳膊，劝他一句：“您别在意，那是几个傲慢无礼的家伙，躲在花束后面，像群傻瓜。”她原希望他过来坐在自己的身边，然而那年轻人——他的确年轻，虽然脸上留下了艰辛的印记——却在他身边第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用一种半开玩笑、半惶惑的神情固执地回敬着售票员、两位少女和一位手捧黄菖蒲花的太太的目光。现在，手持红色麝香石竹花的先生将头转向后面看克拉拉，双眸像泡沫石般浑浊无光、漂移不定，漠然地望着她。克拉拉固执地回视他，心中却感到一阵空虚；她真想下车（然而在这条街上，行至这样的路段，完全无缘无故，只因没带一束鲜花）；她发现那小伙子



似乎心神不宁，他左边看看，右边瞧瞧，接着又向后面张望，看到后排座位上的四个乘客和那个手捧雏菊花身穿硬领衬衫的老头儿的神情时，他未免吃惊。他的目光扫过克拉拉的脸，在她的嘴巴和下颌停留片刻。他的前面，售票员、两位少女及那位拿黄菖蒲花的太太向他投来一道道目光，迫使这位青年转过身来，像泄了气似的望着他们。克拉拉想起几分钟前自己受目光追逼的窘况，现在这位新上车的乘客也在为此手足无措。“这位可怜的人也是两手空空。”她没头没脑地这样想。她发现他有点无力自卫，孤军奋战地用目光迎击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冷眼。

168 路车穿过两条弯道径直向墓地柱廊对面的空场开去。两个小姑娘沿过道走来，在车的后门口停住；她们的身后，雏菊花、黄菖蒲花和马蹄莲花排成一行。再后面是模模糊糊的一群人，鲜花的气味笼罩着克拉拉，她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口旁，不过，看到那么多人下车，想到下一段旅途情况会好些，她感到一阵轻松。黑色



麝香石竹花立了起来，那位年轻乘客忙起身给黑色麝香石竹花让道，上半身歪斜着探到克拉拉前面的空位上。这是一个漂亮小伙子，天真潇洒，大概是个药店售货员，要么是会计或者建筑工人。公共汽车缓缓停住，车门开启时发出一声闷响。小伙子等候着别人下车，以便挑选一个称心如意的座位，克拉拉也同他一样耐着性子等，心里却一个劲儿地催着那些黄菖蒲花和玫瑰花赶快下车。车门已大开，大家排成一行，看看克拉拉又看看那位年轻乘客，谁也不下车，他们隔着似乎被风吹动的一束束鲜花窥探他们，这是一股来自地底下的阴风，它吹动花的根部，摇曳整个花束。终于马蹄莲下去了，红色麝香石竹花下去了，坐在后排的男人们捧着花束下去了，两个小女孩下去了，拿雏菊花的老头儿也下去了。车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此时，168路车突然间显得更小，颜色更灰，更加漂亮了。克拉拉感到虽然全车的座位都空着可供那位乘客选择，但只有坐到她身旁才最合宜，甚至可以说非如此不可。他果然坐了下来，两人低



头看手。手就在这里，空空的。

“恰卡里塔！”售票员喊了一声。

可是不管售票员怎样以目光催逼，克拉拉和那位乘客的回答就是一条：“我们买了一角五分钱的票。”此话并未说出口，但是意思够清楚了。

车门仍旧敞着。售票员朝他们走过来。

“恰卡里塔。”他几乎是在向他们作解释。

青年乘客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克拉拉则对他产生了怜悯。

“我去雷蒂罗。”她说着向他出示了车票。售票员，撕票吧，撕票吧，撕一张蓝色或粉红色的票。司机几乎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望着他们，售票员犹豫不定地转身打了个手势。汽车后门扑哧一声关上了（前门没有一个上车的），168路车加大油门，如脱缰的野马轻快地飞奔起来，克拉拉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此时，售票员倚在司机身旁的镀铬铁杆上意味深长地望着他俩。他们则以眼还眼，双方一直对视到多雷戈拱门。随后，克拉拉感觉到那小伙子利用前面看不见的便利条件，把一只手慢慢放在她的手



上。这是一只柔软的手，非常温润。她没有抽回自己的手，而是轻轻地移动它，将它移至大腿前端，几乎放到膝盖上。一阵疾风裹挟着全速行驶中的汽车。

“那么多人，”他几乎无声地说，“突然间，全都下车了。”

“他们去恰卡里塔献花，”克拉拉说，“星期六总是有很多人到墓地去。”

“是的，不过……”

“有点稀罕，是的。你注意到？……”

“是的，”他几乎是截断她的话说。“您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这我看出来了。”

“真莫名其妙。不过现在不会有人上车了。”

汽车突然刹住，因为阿根廷中央火车站的自动栏杆放下来了。两位乘客由于吃惊和剧烈摇晃，身子一下子弹起来，向前蹿。汽车如同一个巨大的躯体颤动着。

“我去雷蒂罗。”克拉拉说。

“我也是。”



售票员却稳如泰山，他此时正愤愤地同司机说话。他们看到（尽管他们不肯承认自己关注着这一场面）司机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沿着过道，向他们走来，售票员也迈着同样的步子紧随其后。克拉拉发现那两个盯着小伙子，而小伙子则挺直了腰板，似乎要聚集起全身的力气，他的肩膀倚在克拉拉的肩膀上，和两腿一样瑟瑟发抖。恰在此时，一列火车呼啸而过，车头冒出的浓烟遮天蔽日。直快列车震耳欲聋的轰响淹没了司机的话语。司机在距他们两个座位之外的地方站定，弓身曲背，好似要起跳一般。售票员一只手紧紧抓住他的肩膀，一面急切地指给他看那随着最后一节车厢轰隆隆开过正在升起的自动栏杆。司机紧咬嘴唇，跑回自己的座位，168路车愤怒地向前一蹿，朝着铁道和对面的斜坡驶去。

小伙子大大松了一口气，软绵绵地瘫倒在座位上。

“我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克拉拉直想哭，喉头发紧，随时都会失声哭泣，但是那显然于事无补。她甚至无须思考便清醒地知道眼下一切平安无事，她所乘坐的 168 路车除另一名乘客之外空空如也，只要她摁一摁铃，在下一个街角下车，她的所有那些不满便可一了百了。然而，目前这样一切平平安安，惟一不合时宜的倒是她心里总想下车，总想拿开重新压在她手上的这只手。

“我害怕，”她诚恳地说。“当初哪怕在我衬衫上别几朵紫罗兰也好哇。”

他看看她，又看看她无一饰物的衬衫。

“我有时喜欢在翻领上插一朵本地的茉莉花，”他说。“今天因为走得急，没顾上这事儿。”

“真遗憾。不过，实际上我们是去雷蒂罗的。”

“的确，我们是去雷蒂罗的。”

这番对话平平淡淡，为的是关照他，增强他的勇气。

“能不能稍微开一点车窗？我这里憋得透不过气来。”



他惊愕地看了她一眼，因为事实相反，他感到有点冷。售票员一面同司机说话，一面斜着眼睛瞟他们。168路车过了铁路栏杆之后便没有再停站，当汽车行至坎宁与圣菲大街交叉处时，调了个头。

“这个座位上面的窗户是固定的，”他说。“您看到这是车上惟一一个特殊座位，它设在安全门跟前。”

“啊。”克拉拉惊叹一声。

“我们可以坐到另一个座位上去。”

“不，不。”她紧紧握住他的手指头，不让他站起来。“还是不动为好。”

“好吧，不过我们可以打开前面那个车窗。”

“不，请不要打开。”

他等待着，心想克拉拉还会补充点什么，但是，她在座位上把身子蜷缩得更小了。这时，她直盯盯望着他，借以摆脱来自前方的吸引，摆脱如同沉闷或燥热一般直逼过来的怒气。男乘客将另一只手放在克拉拉的膝盖上，克拉拉移近自己的手，两人通过手指头，通过手掌的轻轻抚



摩，暗暗交流。

“我有时候丢三落四，”克拉拉怯生生地说，“自以为样样都带齐了，却总要落一两件东西。”

“我们事先根本没想到。”

“就算是这样吧，不过，反正是一码事。他们都看我，尤其是那两个小丫头，真让我烦透了。”

“实在叫人难以忍受，”他也不满地说，“想必您看见了她们怎样串通一气盯着我们？”

“说破了天，那也只是一束菊花和变异大丽花嘛。”克拉拉说，“她们却自以为了不起。”

“因为其他人为她们撑腰，”他气愤地说，“跟我同座的那个老头儿拿着讨厌的麝香石竹花，贼眉鼠眼。我没有看清坐在后面的人。您认为所有的人都？……”

“所有的人，”克拉拉说，“我一上车就看出来了。我是从诺戈亚和圣马丁大街拐角处上车的，上车后一转过身便发现所有的人，所有的人……”

“好在他们全都下车了。”



168 路车行至普埃伦东,来了个急刹车。一个褐色皮肤的警察站在高高的岗楼里,伸展双臂呈十字形正在指责什么。司机身子一滑离开了他的座位,售票员揪住他的袖子,可是,司机猛地挣脱了他,沿车厢过道走到两位乘客跟前耸着肩膀,嘴唇湿润,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前面放行了!”售票员用奇特的声音叫道。公共汽车后面的十几辆汽车喇叭齐鸣,司机垂头丧气地跑回自己座位。售票员跟司机咬起耳朵,并不时地回过头来扫视乘客。

“要是没有您在这儿……”克拉拉嘟哝着说。“我相信要是没有您在这儿,我早就闹着下车了。”

“不过,您是去雷蒂罗。”他有些惊讶地说。

“是的,我去拜访一个朋友。没关系,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买了一角五分钱的票,”他说。“坐到雷蒂罗。”

“我也一样。糟糕的是如果中途下车,还得等另一辆……”



“是啊，再说，没准儿那辆车上坐满了人。”

“也许是。现在坐车真受罪。您看见地铁了吗？”

“有点不可思议。乘车比工作还累。”

一片清新的绿意飘进车厢，他们看见了博物馆那陈旧的粉红色墙，看见了法学院的新址。168路车驶入莱安德罗·N.阿莱姆大街之后，更加快了速度，好似狂怒地朝终点站驶去。公共汽车两次被交警截住，司机两次想朝乘客扑过来。第二次，售票员拦住了司机，气鼓鼓地摇着头，仿佛疼痛难忍。克拉拉觉得自己已缩成了一团，同伴的双手突然移开了，变得骨节突起、青筋暴露。克拉拉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男人的手雄赳赳地由掌变为拳，她望着这对死心眼的家伙尽管几乎吓得要死，但又卑微地感到有所依靠。他们一直在谈论乘车的辛劳，谈论在五月广场排长龙的情景，谈论人们的粗鲁无礼，谈论怎样忍气吞声。随后，他们不做声了，默默地望着铁路沿线的高墙。她的同伴掏出钱包来一本正经地翻查着，手指微微发抖。



“还差一点点，”克拉拉直起腰说，“我们就到站了。”

“是啊，您看，到雷蒂罗拐弯时，我们赶紧起身下车。”

“好吧，等车在广场旁边停住。”

“对了。车站在英吉利人塔的这一边。您先下车。”

“噢，谁先下车都一样。”

“不，我留在后面以防不测。等车一拐过弯，我就起身给您让个道儿。您要快点儿站起来，站到门口的下层踏板，我站到您的身后。”

“好吧，谢谢。”克拉拉感激地望着他说，两人专心致志地合计着，具体到腿如何放置，步子迈多大。他们看到168路车缓缓开进广场的拐角，车窗玻璃震得哗哗响，当车轮快要压着广场的道牙时，汽车急速地转了个弯。男乘客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他身后的克拉拉一个箭步蹿了出来，随即跳下车门踏板，他转过脸来用身体护住了她。克拉拉望着车门，望着门沿上那黑色橡胶条带和两块肮脏的长方形玻璃；她不想看



其他东西，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她的头发感到了同伴的喘息，一个急刹车将他们抛向一边，在车门打开的同时，司机平伸双手，顺着过道跑过来。克拉拉已经跳到广场上，当她转过身时，她的同伴也跳了下来，车门扑哧一声关闭了。门沿上的黑色橡胶条带夹住了司机的一只手，夹住了他那僵直而白皙的手指。克拉拉隔着车窗看见售票员扑向方向盘，伸手去扳开门操纵杆。

他挽住她的胳膊在满是孩子和卖冷饮小贩的广场上疾步走着。两人一句话也不说，似乎快乐得浑身发抖，彼此谁也不看对方一眼。克拉拉听任他引路，恍恍惚惚看见草坪、花坛，扑面而来的是越来越浓的河水气味。广场的一边有个卖花人，小伙子走到安放在支架上的大筐跟前停下，挑选了两束三色堇，把一束递给克拉拉，随后，把另一束也交给她，自己掏出钱包来付款。当他们继续前行时（他没再挽住她的胳膊），人手一束鲜花，高高兴兴地各奔东西了。

胡真才译

南方高速公路

妈妈的信





这完全可以说是有条件的自由。每逢女门房把一封信交给路易斯，只要他认出何塞·德圣马丁那熟悉的小面孔^①，心里就明白，他必须再一次跨过桥梁^②。圣马丁、里瓦达维亚，可是这些人名也是街道和事物的形象：那相距 6500 里之遥的里瓦达维亚，那弗洛雷斯的大房子，妈妈，那圣马丁与科连特斯的咖啡馆。朋友们有时候在那里等他，那里的冷咖啡茶有一丝蓖麻油味。说过“谢谢你，杜兰德太太”后，他便拿着信上街去了。这一次和前一天，和以前的每一天都不同。妈妈的每封信（即使在刚刚发生的这件事、这个荒唐可笑的错误以前），都会突然改变路易斯的生活，就像猛力把球击回一样把他带回到过去。即使在刚刚读过的这封信（现在他又在公共汽车上读它，心情气恼而慌乱，总是不信服）以前，妈妈的信在路易斯所喜欢、所

① 指以圣马丁的肖像为图案的阿根廷邮票。

② 意思是回忆他的故乡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过去的往事。故事背景是巴黎。



计划和所实现的事物秩序内总是一种时间上的变换,一个无害的小事件。他把那种秩序安置在他的生活中,就像把劳拉^①安置在他的生活中、把巴丝安置在他的生活中一样。每一封新来的信都暂时暗示着(因为事后,在亲切地回信的同时他就把那些信忘掉了)他的艰苦争得的自由,像那种在被别人称为他的生命的羊毛团上用剪刀凶猛裁剪过的新生命那样不再为自己辩护,不知所措,像抛在后面的街道一样随着公共汽车沿着里切列乌街的奔驰渐渐消失了。只剩下一一种微小的有条件的自由,像一个括号中的字那样,好似生活的笑柄,这个字脱离了主句,但几乎总是作为主句的支柱和解释存在的。还有懊恼,像一个人随手把门重新关上那样,随即回信是必要的。

那天早晨,就像往常那许多个早晨一样,妈妈来了信。路易斯跟劳拉谈论过去的事情不多,几乎从来不谈论弗洛雷斯大房子的情况。

① 路易斯的妻子。



并不是因为路易斯不愿意回忆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因为他试图回避人的名字（那些人，很久以来他就避开了，可是人名，人名才是真正的怪物，顽固存在下去的东西）。有一天，他鼓起勇气对劳拉说：“如果能够像一封信或一本书的草稿一样把过去撕毁和丢掉就好了。可是它总是存在着，玷污着干干净净的稿子。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未来。”其实，他们为什么不能谈一谈布宜诺斯艾利斯呢？那里住着他们的家庭，朋友们不时地寄张写着亲切话语的明信片来。还有《民族报》的刻印画，上面刊载着那许多热情的太太们的十四行诗，那类关于某种感情的卖弄学问的流露。有时候发生某种内阁危机，出现某个懊恼的上校，某个杰出的拳击手。为什么不要同劳拉谈一谈布宜诺斯艾利斯呢？然而劳拉同样是不回忆过去的时光的，只是凑巧在某次对话，特别是在妈妈的信到来的时候，才像几枚不流通的钱币、遥远的河岸上一个腐朽世界的东西那样露出一个人名或一个形象。

“噢，是的，天气实在闷热。”坐在他对面的



工人说。

“你要是知道热的滋味，”路易斯想道，“你要是能在2月的一个下午沿着五月大街、沿着利涅斯的一条小街走的话。”

他又一次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他没有抱幻想：那段话很清楚地在信上写着。这是非常荒唐的，但是在信上写着。吃了一惊，当头挨了一棒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跟往常一样是辩护。劳拉不应该读妈妈的信。无论这个错误多么可笑，混淆了名字（妈妈本来想写“维克多”，结果却写成了“尼科”），反正劳拉会感到痛苦的，这是很愚蠢的。信，有时会丢失；但愿这封信也沉到海底下去。现在他不得不把它丢进办公室的下水道里去。当然，几天以后，劳拉会感到惊奇：“多奇怪啊，你母亲的信没有收到。”她从来不说“你妈妈”，也许因为她从小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那时他可以这样回答：“是啊，的确很奇怪。我今天就给她写封短信去。”然后把信寄出去，对妈妈没有信来表示吃惊。这样，生活还是照常，白天上班，晚上看电影，劳拉总是很平



静，善良，关心他的需求。到伦内斯街下车的时候，他突然问自己（这不是一个问题，可是不然的话，如何表达呢？），为什么不愿意把妈妈的信拿给劳拉看。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她可能产生的感觉。（如果她隐而不说的话，她可能产生的感觉对他无关紧要吗？）是的，对他无关紧要。（对他不重要吗？）但是头一个事实，假定后面还有一个事实的话，就是说最迫近的事实是：劳拉的脸色，劳拉的态度，对他是最要紧的。之所以对他要紧，是因为他，是因为劳拉关心妈妈的信的方式对他产生的影响。有那么一会儿，他的眼睛落在了尼科的名字上。他知道，劳拉的下颚会开始微微颤抖，然后劳拉会说：“你瞧，多奇怪……你母亲可能出了什么事吗？”他或许已经知道，为了不叫嚷，为了不把一张由于哭泣、由于在她嘴边颤抖的尼科的名字的出现已经变了色的脸掩在双手里，劳拉会终日克制着自己。

在他当描画员的广告代办处里，他又读信，妈妈的许多信中的一封。除了写错名字的那段话外，没有任何异乎寻常的地方。他想，是不是



可以把字涂掉,用维克多代替尼科,简单地用对的代替错的,然后把信带回家,拿给劳拉看。劳拉对妈妈的信总是感兴趣的,尽管这些信很难确定是写给她的。妈妈给他写信,在信尾,有时在中间加几句问候劳拉的亲热的话。这不重要,她还是以同样的兴致读它们,碰到某个由于眼睛流泪和近视而写得歪扭的字才迟疑一下。“我爱吃沙里东^①,医生却给我一点柳树皮霜……”信件在绘画桌上放二三天;路易斯写完回信后本想把它们丢掉,但是劳拉却读了又读。女人们喜欢一遍一遍地读信,看信,左看右看,每次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看一遍,仿佛就要得出一层新意思。妈妈的信很短,写的是家庭的事情,间或涉及国家的秩序(但是这类事情人们早已从《世界报》的电讯里知道了,经过妈妈的手总是来得很晚)。甚至可以认为,妈妈的信总是千篇一律,简单平常,没有什么兴味。妈妈可贵的地方是她从来也不忘记表露由于儿子和儿

^① 沙里东:一种药物。



媳不在身边而产生的痛苦,更不忘倾吐由于尼科的死所带来的悲痛(最初不是叫喊就是哭泣)。在巴黎度过的两年间,妈妈从没有在信上提过尼科。她像劳拉一样,从来也不提他。她们俩,谁也不提他。尼科死了两年多了。在信中间偶尔提到他的名字简直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哪怕仅仅在一句话里出现用高高的、哆哆嗦嗦的 N 和带弯曲尾巴的 Q 写的尼科的名字;但是这更糟,因为名字写在一句费解的可笑的话里,所说的不过是告诉年迈衰老一类的事情。妈妈突然丧失了时间概念,她以为……这段话来自关于劳拉的一封信的简短收条之后。勉强用从居民区商店买来的淡淡的蓝黑墨水标了个句点后突然写道:“今天早晨尼科询问你们。”其余的话跟往常一样:健康情况,马蒂尔德表妹跌倒了,一根锁骨跌了出来,几只狗很好。但是尼科询问过他们。

其实,要把尼科改为维克多本来是很容易的。肯定是维克多询问过他们。维克多表兄总



是很有礼貌的，“维克多”比“尼科”多两个字母^①，但是可以用涂字胶巧妙地改换它们。今天早晨维克多询问你们。很自然是维克多去看妈妈，向她询问了不在家的人的情况。

路易斯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把信原封未动地装进衣兜带回了家。他仍然打算什么也不对劳拉讲。劳拉正带着亲密的笑脸等着他，面孔好像自迁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以来改变了模样，仿佛巴黎的灰色天空夺走了她的颜色和丰满的脸形。他们在巴黎居住了两年多了，尼科死后刚刚两个月他们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实际上，路易斯自他跟劳拉结婚的那天起就自认为是个不在家的人。一天下午，在同已经患病的尼科谈过话后，路易斯就发誓离开阿根廷，离开弗洛雷斯的大房子，离开妈妈、狗和他哥哥（他已经患病）。在那些月份里，一切都像舞蹈演员似的围着他转：尼科，劳拉，妈妈，狗，花园。他的誓言是在杂技场上把一只瓶子

① 维克多和尼科的原文为 Victor 和 Nico。



打碎的粗野举动，被碎玻璃打击中断了的舞蹈。在那些天里，一切都是愚蠢的：他的结婚，跟妈妈没有表示亲热和敬意的出走，忘记了一切社会义务，忘记了朋友们，使他们感到既意想不到又恍然大悟。他什么也不顾忌，哪怕是劳拉不满的表示。妈妈孤单地留在大房子里，只有狗，药瓶，仍然挂在衣间的尼科的衣服。让她留在那里，所有的人都见鬼去吧。妈妈似乎已经明白，不再为尼科哭，像以前那样在家里走动，在死亡面前以老年人的冷酷而坚决的精神恢复着元气。但是路易斯不愿意回想离别的那个下午的情形，箱子，停在门口的出租汽车，整个童年居住的房屋，他和尼科玩打仗游戏的花园，两只冷淡而愚蠢的狗。现在他几乎把这一切全忘记了。到代办处上班，画广告，回家吃饭，喝一杯劳拉微笑着捧给他的咖啡。他们经常去看电影，到森林去，对巴黎愈来愈熟悉。他们是幸运的，生活出乎意料地容易，工作过得去，房间漂亮，电影美妙。这时，妈妈的信来了。

他不讨厌妈妈的信，倘若没有这些信，他也



许会觉得自由会像一个不可承受的重量一样落在他身上的。妈妈的信为他带来一种不言而喻的宽恕(但是对于他没有什么可宽恕的),架设了能够通行前进的桥梁。每一封信或者使他对妈妈的健康感到放心,或者感到不安,使他回想起家庭的经济,一种秩序的永久性。同时他也憎恨这种秩序,为劳拉而憎恨它,因为劳拉在巴黎,但是妈妈的每一封信总像外人一样提到她,好像她是一天晚上在花园里再一次听到尼科那嘶哑的几乎是可怜的咳声后他所表示憎恶的那种秩序的帮凶。

不,不能把信给她看,用一个名字替换另一个名字是不体面的,让劳拉看妈妈的那句话是不能容许的。妈妈的可笑的错误,一时的糊涂愚蠢——他看见她在用一支旧笔,用向一边倾斜的纸,和不足的视力吃力地写信——会像一粒容易萌发的种子一样在劳拉脑海里长大起来。最好还是把信扔掉(就在那个下午把它扔掉了),晚上和劳拉去看电影,尽早地把维克多曾经询问过他们一事忘掉。虽然是维克多,受



过良好教育的表兄，也还是得忘掉维克多曾经询问过他们。

托姆像魔鬼似的躲避着。舔着唇，等待赫里落入圈套。赫里没有上当，无数的灾祸却落在了托姆身上。^① 后来，路易斯买了雪糕，两人一面心不在焉地望着彩色广告一面吃着。电影开始的时候，劳拉稍微向座位深处坐了坐，把手从路易斯的手臂里撤了回去。他又一次觉得她离开了他，谁知道他们一起看的东西对他们二人来说是不是一回事，尽管后来他们在街上或床上对电影作了评论。试问（这不是一个问题，可是用别的方式如何表达呢？），当尼科向她求爱、一块出去的时候，他和劳拉在电影院里也是这样远远地坐着吗？可能他们熟悉弗洛雷斯的所有电影院，拉瓦列街上的整个粗笨的林阴道，狮子，打锣的大力士，《卡门·德·皮尼略斯》的西班牙文副标题。这部电影中的人物是虚构的，而整个故事……当赫里从托姆手里逃走，

① 他们所看电影的故事情节。



巴巴拉·斯坦威克或蒂龙·鲍尔开始出现的时候,尼科的手慢慢地放在了劳拉的大腿上(可怜的尼科,这么胆怯,典型的新郎),两人觉得犯了不知什么罪过。路易斯很清楚,他们没有犯任何明确的罪过;虽然他没有掌握最美妙的证据,但根据尼科对劳拉的迅速疏远一事,足可以在这桩婚事上看出由居民区、邻居和作为弗洛雷斯的趣味的文化娱乐场所计划的真正的演习,一个晚上到尼科经常出入的同一家舞厅去的怪念头,一次偶然的亲热的介绍,也足够了。也许因为这一点,因为开始得容易,后来的一切才意想不到的无情和痛苦。但是现在他不愿意回想,喜剧已经以尼科的胆怯失败,因肺病而死的哀伤的逃避而告终。奇怪的是,劳拉从来也不提他,因此路易斯也不提他,尼科连死人也不是了,也不是死去的姻兄、妈妈的儿子了。在经过不安的彼此指责,妈妈的哭泣和叫嚷,埃米利奥叔叔和维克多表兄(今天早晨维克多询问过你们)的愚蠢干预之后,除了一辆用电话叫来的出租汽车和在一位衣服翻领上带着头皮屑的官员



面前站了三分钟之外没有其他仪式的匆忙结婚，最初为他带来一些安慰。他们躲避在阿德罗格旅馆里，远远地离开了妈妈和所有中断来往的亲戚。路易斯感谢劳拉，她从没有说起过那位如此含糊地从情人变成姻兄的可怜的傀儡。可是现在，中间隔着一片大海，他已经死去，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劳拉仍然避免提他，路易斯由于胆小也只好屈服于她的沉默。他知道，由于他受到责备、感到悔恨和某种开始像背信弃义的东西，这种沉默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痛苦。他不止一次明显地提到尼科，但是他明白，这没有用，劳拉的回答只是改变话题。一块死气沉沉的禁区渐渐在他们的语言中形成，把他们同尼科隔开来，把他的名字和记忆包裹在一团弄脏的有黏性的棉花里。另一边的妈妈也这样做，不约而同地保持着沉默。每一封信只讲狗，马蒂尔德，维克多，柳皮霜，交房费。路易斯曾经指望妈妈偶尔提到他的儿子，以便当着劳拉的面同她联系起来，婉转地使劳拉承认尼科的死后存在。并不是由于什么需要，尼

科死也好活也好，跟谁相干呢？但是容许在过去的圣殿里纪念他，这也许是个隐秘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劳拉已经真正、永远把他忘记了。大白天呼唤他的名字，梦魔或许就像踏在地上的时候一样软弱无力地消散了。但是劳拉仍然对尼科的名字保持沉默。每当她保持沉默、应该提到他而恰恰不肯提的时候，路易斯总是又一次觉得尼科在弗洛雷斯的花园里，发着谨慎的咳声，准备着最美好的可以想像的结婚礼物，正欢度蜜月：在路易斯的未婚妻和哥哥的蜜月时候，他死去了。

一个星期之后，劳拉感到吃惊：妈妈的信没有收到。他们作了通常的猜想。同一天下午路易斯写了信。回信没有使他感到多么不安，但是他希望（早晨下楼梯的时候他想到），女门房直接交给他，不要送到三楼去。半个月后，他认出了熟悉的信封：布朗海军上将的面孔和一幅伊瓜苏瀑布的画面。在出门和回答探到窗口的劳拉的问题之前，他把信装了起来。他觉得，必



须绕过街角再拆信是可笑的。博比^①已经跑到街上去,几天后开始搔起痒来,被一只患疥疮的狗传染了。妈妈要去请教埃米利奥叔叔的一位懂兽医的朋友,因为她害怕博比把该病传染给内格罗。埃米利奥叔叔认为,可以用阿卡罗伊纳^②给它们洗一洗,但是她已经不能够再去为那些事跑腿了,最好还是让兽医开点什么杀虫药或别的什么,拌在食里。旁边住的太太家有一只生疥疮的猫,去问问吧,是不是猫能够传染给狗,哪怕是通過铁丝围墙。可是,老太太的这些话,他们有什么兴趣呢?虽然路易斯一直就非常喜欢狗,小时候甚至跟一只狗在床下边睡觉,尼科却相反,他不很喜欢狗。旁边住的太太劝告说,倘若不是疥疮,可以给狗撒点滴滴涕药粉;狗在街上乱跑,是能够染上各种时疫的;在巴卡开街角上有一家稀有动物马戏场,空气中也许会有细菌之类的东西。与被滚热的牛奶烫

① 博比和下文的内格罗均为狗的名字。

② 一种疥疮药。



伤胳膊的女裁缝的小狗和患疥疮的博比相比，妈妈倒不怎么担心。

其后有一个蓝色的小星似的符号（小勺形的水笔挂在纸上，妈妈厌倦的叹号），接着写了一些对于她的孤独生活的忧伤考虑：尼科是不是看样子也到欧洲去，但这是老年人的命运，孩子们是燕子，有一天会飞走的，必须听天由命，身体又一天不如一天。旁边住的太太……

有人推了路易斯一把，用马赛人的口音急促地对他大谈了一通权利和义务。他模模糊糊地明白，他妨碍了从地铁的窄廊道进来的人的通行。这一天的其余时间，同样是糊涂的。他给劳拉打电话，告诉她，他不回去吃午饭；他坐在广场一条长凳上看妈妈的信，消磨了两个小时，他问自己：面对疯疾应该怎么办。在什么也没有做之前他跟劳拉谈过。为什么（这不是一个问题，可是用别的方式怎么表达呢）要继续对劳拉隐瞒来信的事情呢？他再不能编造说这封信跟别的信一样遗失了；再也不能半信半疑妈妈写错了，把维克多写成了尼科，年老昏聩是多



么痛苦。他断定，这些信是劳拉，是劳拉将要发生的事情。至少不是这个：自他结婚那天起就已发生的事情，在阿德罗格度的蜜月，在前往法国的船上他们疯狂相爱的夜晚。在妈妈的胡话里说现在尼科想到欧洲来，完全是劳拉，完全将是劳拉。他们是从来没有的帮凶，妈妈在跟劳拉谈论尼科，告诉她，尼科将要到欧洲来。她这样说，只提到欧洲，她知道得很清楚，劳拉会明白尼科将到法国，到巴黎下船，到一家公寓寄宿。他巧妙地装做把那个地方忘记了，可怜的孩子。

他做了两件事：给埃米利奥叔叔写信，告诉他使他感到不安的病状，请他立刻去看妈妈，以便了解病情，采取措施。他一杯又一杯地喝了白兰地，徒步向他家走去，为的是在路上考虑应该对劳拉说的话，因为无论如何他得跟劳拉谈，把事情告诉她。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他渐渐感到，处在目前的状态，处在半小时后必定要发生的事情之中，是多么痛苦。妈妈的信使他陷入并窒息于在巴黎生活的两年的现实中。这全



是骗局：通过交易换得的安宁，由娱乐和戏剧支撑的家门之外的幸福，无意默契的、像一切消极的协定一样使双方渐渐破裂的协定。是的，妈妈，是的，患疥疮的不幸的博比，妈妈。可怜的博比，可怜的路易斯，多少疥疮啊，妈妈。弗洛雷斯俱乐部的一次舞会，我去是因为他坚持要去，我想，他是想用他的胜利炫耀自己。可怜的尼科，妈妈，带着还没有人相信的干咳，穿着那件花格衣服，梳着油亮的头发，系着十分讲究的条花领带。一个人聊了一会儿天，表示同情，这个活宝怎么不跟哥哥的未婚妻跳舞呢，噢，未婚妻，都这样称呼，路易斯，我想，我可以叫他路易斯，对了。不过是的，我感到奇怪，尼科还没有把她带到家去，你会叫妈妈感到满意的。这个尼科太愚蠢，甚至没有跟她爸爸说话。他胆怯，是的，总是那副老样子。跟我一样，你笑什么，不相信我吗？不过，我，人不可貌相……天很热，是吗？真的，你应该到家里来，妈妈会非常高兴的。我们家只有三口人，和几只狗。这个尼科，可他是腼腆鬼，无赖，这一点你可不要对



人讲。我们之间就是这样，劳拉，我们什么事都说。请允许我跟小姐跳这个探戈舞^①。

这么微不足道，这么轻浮，这样一个地道的油头和花条的领带。由于错误，由于盲目，由于愚蠢的哥哥，她勃然发怒了，她背过脸去了，她和尼科破裂了。尼科不玩羽毛球，玩什么呢？你不能把他从象棋和集邮中解脱出来，帮我一下吧。尼科沉默着，多没用的可怜虫，慢慢落在后面，躲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拿滋润胸部的甜饮料和苦味马黛茶安慰自己。当他倒在床上、被吩咐休息的时候，凑巧是公园的体操舞剑馆举行舞会。一个人是不放弃这些事情的，特别是当埃德加多·多纳托演奏，情况许可的时候。尼科带着劳拉出去散步，妈妈觉得很好，劳拉一天下午刚被带到家里来，妈妈就觉得她像个女儿。你瞧，妈妈，尼科身体虚弱，如果有人告诉她，很容易使她动感情。像他这样的病人每件

① 流行于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一种二、四拍的舞蹈。



事都自忖，一定会相信我在向劳拉求爱。最好你不要知道我们去体育馆的事。不过我不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家里绝没有人知道我们一块活动。当然，直到病人病情好转为止。我们就这样度着时间，参加舞会，二三次舞会，为尼科透视，然后是矮人拉莫斯的汽车，贝巴家的欢闹之夜，饮酒，乘车游玩到溪水桥，一个月亮，像高处的饭店的一扇窗子。劳拉在汽车里克制着自己，微带醉意，灵巧的手，接吻，低哑的叫喊，骆马毛毯，默默地转动，抱歉的微笑。

劳拉替他开门的时候，脸上的微笑几乎没有变样。炉子上烤着肉，有凉菜，一块牛奶蛋糕。10点钟的时候，来了几位邻居，是她的纸牌伙伴。夜深的时候，在准备睡觉的同时，路易斯掏出信，放在了床头桌上。

“我一直没有对你讲，是怕你难过。我看是妈妈……”

他躺下去，把背对着她，等待着……劳拉把信装进信封，熄了灯。路易斯觉得她在挤他，不一定是挤他，但是听见她在他的耳边呼吸。



“你发觉了吗？”路易斯说，很注意他的声音。

“是的。你不相信妈妈写错了名字吗？”
准是这样。

“可能她想写维克多，”路易斯说，一面慢慢地把手指甲按在手掌上。

“噢，当然。可能的。”劳拉说。
他们开始装睡。

只有埃米利奥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劳拉觉得很好。几天过去了，他们没有再谈这件事。每次回家后，路易斯总希望听到劳拉一句不平常的话或一个不寻常的表情，希望在这种深沉的静寂中出现一个缺口。他们跟往常一样去看电影，跟往常一样谈情说爱。对路易斯来说，除了她顺从地依附于这样的生活之外，在劳拉身上没有别的秘密。在这种生活中，什么也没有能够成为他们两年来指望的东西。现在，路易斯很了解她，在决定性的对比时刻，他不能不承认劳拉跟尼科一样。在这些对比中，他们是落后的，他们仅仅按照惯性活动，尽管她有时运用



几乎是可怕的意志什么也不做，真正毫无目的地生活。劳拉也许对尼科的了解比路易斯更深些。这一点，从他们结婚的那天起，从温和顺从地度过蜜月、满足愿望后采取最初的态度起，他们一直是知道的。现在，劳拉又做噩梦了。她经常做梦，但是噩梦不同。路易斯从她身体的其他许多动作、糊涂不清的话语或像动物那样的困难的短促叫声中看得出来，在船上的时候她就开始做噩梦，那时他们还在谈论尼科，因为尼科刚刚死去，几个星期后他们上了船。一天晚上，在回想起尼科之后，当已经暗示着后来在他们中间保持的无言的沉默时，劳拉开始做噩梦。后来不时地重复，总是一个样，劳拉用一声嘶哑的呻吟，腿部的神经质的抖动，一声完全不自觉的突然叫喊，一种用双手、整个身体和整个声音对某种仿佛一块巨大的黏性物质在梦中落在她身上似的可怕的东西的反抗，把路易斯惊醒。他摇动她，安慰她，给她端水。她一面啜泣一面喝，一半仍然受着另一种生活的追逐。她说她没有回忆什么，是某种可怕的东西，但是没



法说清。最后又带着她的秘密睡着了，因为路易斯知道，她知道她刚刚碰见了那个梦里的人，天晓得他带着什么可怕的面具，劳拉由于恐惧或许由于徒然的爱情而慌乱地抱着那人的双膝。情况总是一个样，他给她一杯水，不声不响地等待她重新把头放到枕头上。也许有一天，恐惧会比骄傲更强烈，如果这是骄傲的话。也许到那时他可以从他这一方面进行斗争。也许不会丧失一切，也许新的生活会真的成为另一回事，而不是这样的微笑和法国电影的类似物。

在绘画桌前，在不相干的人们中间，路易斯回想着对称的意思和他喜欢运用于生活的方法。鉴于劳拉不接触话题，他便表面若无其事地等待埃米利奥叔叔的回信，应该由他跟妈妈打交道。他的信仅限于回答最近几个星期的无关紧要的消息，在信的附言里有一段话纠正说：“维克多谈到要到欧洲去。人们都想去旅行，这是由于旅游社的宣传。告诉她，让她写吧，我们可以把她需要的一切资料寄给她。也要告诉



她,从现在起她可以依靠我们家。”

埃米利奥大叔几乎是马上写信作答复的。信很简单,因为是写给一个如此亲近、(由于在尼科的守灵礼上受到不恭敬的冷遇)如此懊恼的亲戚。他没有当面对路易斯发泄不满,而以在类似情况下惯用的巧妙方式表露他的感情:不到码头上去为他送行,连续两年忘记了他的生日。现在则仅限于尽其作为妈妈的小叔的义务,简单地报告结果。妈妈身体很好,但是几乎不说话,联系到近期发生的许多烦恼,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然,妈妈在弗洛雷斯住宅的境遇很孤单,这是自然的,因为没有有一个一辈子和自己的两个儿子过活的母亲能够在一幢充满往事的大房子里感到乐趣。至于那些话本身,是埃米利奥大叔考虑到问题的微妙性而随机应变做出的。但是他不愿意告诉他们,他没有把问题了解得很清楚,因为妈妈没有兴致参加谈话,甚至坐在会客间里接待他,她从没有这样对待过她的小叔。关于治疗方面的情况,他回答说,除了风湿病以外,妈妈的感觉非常好,虽然那几天由



于必须熨许多件衬衣而感到劳累。埃米利奥大叔对妈妈说的衬衣很感兴趣，对他的询问妈妈只是点了点头，为他斟了一杯雪利酒和拿了几块巴格莱蛋糕。

妈妈没有让他们花很多时间讨论埃米利奥大叔的信和他的无用的表白。四天以后来了一封挂号信，尽管母亲完全清楚到巴黎的航空信没有必要挂号。劳拉给路易斯打电话，要求他尽可能早些回家。半个小时以后，路易斯看见她困难地喘着气，凝视着桌上的几枝黄花。信放在壁炉台上。路易斯看过以后又把它放在了那里。然后坐在劳拉旁边，等待着。劳拉耸了耸肩。

“你疯了。”他说。

路易斯点了一支烟。烟雾熏得他直流眼泪。他明白，这盘棋得继续下去，这次该他走了。但是走棋的人是三个人，也许是四个。现在他确信，妈妈也坐在棋盘旁边。他慢慢在椅子上滑下去，让他的脸戴上了双手并成的无用的面具。他听见劳拉在哭，女门房的孩子们在



楼下叫喊着跑来跑去。

夜晚带来了忠告，等等。夜晚为他们带来了沉重的睡意，然后他们的躯体便陷入了他们实际上并不渴望的斗争。默契的协定又一次中断了：早晨他们将谈论天气，谈论圣-克劳德、詹姆斯·迪安凶杀案。信仍然放在炉台上，他们一面喝茶一面禁不住老瞧它，但是路易斯知道，下班回来后，他再也碰不到它了。劳拉以她冷漠、有效的心机涂去了痕迹。一天，两天，三天。一天晚上，他们拿街坊们的故事、费南德尔的音乐会开了半天心，谈到要去看一出戏，到枫丹白露去过一个周末。

绘画桌上堆着不需要的资料，一切都跟妈妈的信一起发生。客船果然于星期五 17 点到达哈佛，专车于 11 点 45 进圣-拉萨尔。星期四他们看了戏，玩得很痛快。两夜之前，劳拉又做了一次噩梦，但是路易斯不愿费心给她水喝，让她自个儿安静下来，只把背对着她，然后劳拉便平静地睡了。白天，劳拉忙于裁缝一件夏衣。他们掐断电冰箱的电源时，谈到要买一架电动



缝纫机。路易斯在床头桌的抽屉里找到了信，把它带到了办公处。他向航空公司打了电话，尽管他相信妈妈写的日期是准确的。这是他惟一的信念，因为其余的连想也不能想了。埃米利奥大叔那个白痴最好是给马蒂尔德写信，尽管他们相距遥远。马蒂尔德一定理解帮这个忙、保护妈妈的急迫性。可是当真（这不是一个问题，可是用别的方式怎么表达呢）得要保护母亲、必定是母亲吗？他一时想要长途电话，跟劳拉通话。他想起了雪利酒和几块巴格莱蛋糕，耸了耸肩。他同样没有时间给马蒂尔德写信，尽管事实上是有时间的，但是也许他情愿等到17日星期五或在……之前。白兰地甚至已经不能帮他思考，至少是不害怕地思考。在埋葬过尼科之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近几个星期里，他愈来愈清楚地记起了妈妈的面孔。他曾经作为理解悲痛的东西，现在显示给他的是另一种东西，其中包含着愤怒的怀疑和预感到将被抛弃的动物的表情。为了毁掉它，人们将把它抛到远离住宅的低湿地带去。现在他真正开始看



见了妈妈的脸，刚才真的看见了她：在那些日子里，全家轮流来看她，为尼科向她志哀，下午来陪她，他和劳拉也从阿德罗格赶来陪她，和妈妈在一起。他们只停留了一会儿，因为后来埃米利奥大叔，或是维克多，或是马蒂尔德来了。大家带着一样的冷淡反感的表情，全家为发生的事情、为阿德罗格感到恼火，因为都很幸运，而尼科，苦命的人。他们从没有怀疑，为了让他们乘上第一艘方便的客轮，家人尽最大可能地合作；为了替他们付行李费、热情地把行李连同礼物和手帕送到船上，家人似乎事先合计好了。

当然，他作为儿子的责任使他不能不立刻写信给马蒂尔德。在喝第四杯白兰地之前，他还能够这样考虑问题。喝第五杯的时候，他又重新进行考虑，他嘲笑（为了独自散心和清醒头脑，他徒步穿过巴黎），嘲笑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好像儿子们有责任，好像责任是四年级的责任，神圣的职责是为了肮脏的四年级的小姐的。因为他作为儿子的责任不是给马蒂尔德写信。干吗要编造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可是用别的方



式如何表达呢)妈妈疯了呢?能够做的惟一的事情是什么也不做,任凭时光一天天过去,除了星期五。当他跟往常一样向劳拉告别、对她说他必须设计几张紧急的广告不能回家吃午饭的时候,他对能够补充的其余的话是胸有成竹的:“你要是愿意,我们一块去。”他躲进车站的咖啡店,与其说是假装喝咖啡,不如说是为了找个可怜的有利地点进行观望而不被发觉。11点35分,他从她的蓝裙子发现了劳拉,远远地跟踪着她,看见她在看黑板,询问一位职员,买了一张月台票,进了站台,那里已经聚集着一些人,脸上带着等待的表情。他躲在一辆运水果箱的四轮货车上望着劳拉,她是留在站台出口处旁边还是到站台里头去,似乎拿不定主意。他像观看一只活动起来可能挺有趣的虫子似的毫不惊奇地望着她。火车几乎转眼之间就到了。劳拉混在人群中。人们走到车窗前,寻找自己的东西,一面叫嚷一面举着手,好像在火车里闷得喘不过气来似的。路易斯走到运货车旁,从更多的油迹斑斑的水果箱中间进了站台。他从他



站的地方看见旅客们走过,看见劳拉又一次过去,脸上充满轻松的表情,劳拉的脸上没有充满轻松的表情吗?(这不是一个问题,可是用别的方式如何表达呢?)然后,为了故意当最后一个,等最后一批旅客和最后一批搬运夫过去后,他才出站,走到充满阳光的广场,到街角的咖啡店去喝白兰地。就在这天下午,他将给妈妈写信,一点也不提及那桩可笑的故事(不过并不可笑),然后鼓起勇气跟劳拉谈话(不过他没有勇气,也不会跟劳拉谈话)。不管怎样,白兰地是少不得的,这个没有丝毫疑问,其他一切都见鬼去吧。这样看到他们,被分离的亲人们一群群地走过,同时伴随着叫喊和泪水拥抱着,一种廉价的性爱像庙会上的骑马操练一般在箱子和行李之间席卷站台。终于,终于,我们多久没见了啊,你晒得多黑呀,艾弗特,可也是,太阳太少见了,女儿。

真是无巧不成书,愚蠢的事情专门爱跟我搭伴儿,从近旁走过的人里头有两个人,从他们的短发,短外套,掩饰进巴黎的十足的不安神情



看，准是阿根廷人。特别是有一个很像尼科，真是巧极啦，另一个不像。其实，一看见他那粗得多的脖子和粗些的腰部，那个人也不像。但是捕风捉影寻觅巧事纯属一种癖好。那另一个人已经走过去，左手提一只箱子，向出口处的小门走去，尼科跟这个人一样，也是个左撇子，背部也有点驼，也有瘦削的双肩。劳拉大概也在这样想，因为她从后面赶上来看他。当她在噩梦中醒来，坐在床上出神地望着空中，望着（现在他知道）那个结束了使她在梦中叫喊、挣扎的无名的报复行为，把背转向她走开的人时，脸上带着一种他很熟悉的表情。

他醉心于寻找相似的人，当然，那是一个陌生人，当他把箱子放在地上，找车票，把票交给收票员的时候，他从正面看见了他。劳拉第一个出了站，他让她走到前头去，消失在汽车站台上。他走进街角的咖啡店，躺在一条长凳上。后来他不记得是不是要过什么饮料，使他口里发烧的东西是不是低价的白兰地的余味。整个下午他都在设计广告，没有休息。有时他想到



应该给妈妈写信,但是他让这个想法慢慢滑过了,直到下班的时刻。他徒步穿过巴黎,到家的时候,在门房里碰见了看门人,跟她聊了一会儿。他本想留在那里跟门房或邻居们闲谈,但是人们都陆续回了房间,吃晚饭的时间也快到了。他慢腾腾地爬着楼(实际上,他上楼总是慢腾腾的,免得肺部疲劳和咳嗽),爬到三层楼后,按门铃前他靠在了门上,为的是休息一会儿,那副姿势好像在倾听房里的动静似的。然后,跟平常一样叩了两下门。

“噢,你回来了。”劳拉说,同时把冰凉的面颊伸给他。“我心里已经开始想,你是不是更晚些才能回家,肉准煮过火了。”

肉没有煮过火,不过他什么也不想吃。要是这时候能够问劳拉为什么去车站的话,也许咖啡已经恢复了香味,或者是纸烟。但是劳拉一整天都没有离家,她这样说好像是需要说谎,或者希望他对日期,对妈妈的可悲的怪脾气作一番可笑的评论。他把臂肘支在桌布上搅着咖啡,再一次让机会错过了。劳拉的说谎已经无



关紧要，在那么多次冷淡的接吻、那么多次的沉默中，这是又一次说谎。这样的接吻和沉默，全是因为尼科，在她和他之间，没有任何事情不是因为尼科。为什么（这不是一个问题，可是用别的方式如何表达呢）不在桌上摆上第三套餐具？为什么他不走开，为什么不握起拳头朝他那痛苦的、难过的、被纸烟的烟雾改变了形状的脸上砸去，而使它像在两滴水之间似的来来去去，好像渐渐充满仇恨，仿佛就是妈妈那张脸？也许他在另一个房间里，或者也许像他那样等待似的正靠在门上等待着，或者他已经安顿在他始终是主人的地方，安顿在铺着床单的白色温暖的地方，在劳拉的梦中，他多次地去过那里。他也许正等在那里，背朝下躺着，同样也吸着他的烟，稍微有些咳嗽，带着一张小丑的脸笑着，那脸就像死前最后几天那样，那几天，他的血管里一滴健康血液也没有了。

他走进另一个房间，到办公桌前扭着灯。应该怎样回答妈妈，不需要再看妈妈的信。他开始写，亲爱的妈妈。他写道：亲爱的妈妈。他



扔掉信纸，又写：妈妈。他觉得房子像一个慢慢握紧的拳头，一切都愈来愈狭窄，愈来愈窒闷。对两个人来说，房间是足够的，正好是为两个人考虑的。他抬起眼睛的时候（他刚写完：妈妈），劳拉正站在门口望着他。路易斯放下了笔。

“你不认为他比以前瘦多了吗？”他说。

劳拉做了个苦脸。两滴晶莹的泪珠从面颊上滚下来。

“些微的。”他说。“一个人总在变的……”

朱景冬译

南方高速公路

秘密武器





真新鲜，人们竟会相信铺床完全就是铺床，握手始终就是握手，开沙丁鱼罐头永远就是开沙丁鱼罐头。“可是，要知道，什么事情都会有例外的。”皮埃雷一面笨手笨脚地铺着蓝色的旧被单，一面自忖着。“昨天下雨，今日天晴；米切莱昨天满脸愁云，今天却又要来。惟一不变的是，我老是不能够把这张床收拾得像样一点。”算了，反正女人们就喜欢单身汉的房间乱糟糟的。她们看了会微微一笑。母亲就总是呲着一口牙齿走进来，拉拉窗帘呀，挪一挪花瓶或椅子呀。只是对你说：“你是应该想到把那张桌子放在没有光线的地方的……”米切莱大概也会说这样的话，可能摸摸、动动书和灯。皮埃雷将歪在床上或仰在旧沙发上任凭她做什么，同时目不旁视地瞅着她，透过一支高卢香烟^①的烟雾瞅着她，渴望着她。

“6点钟是重要时刻。”皮埃雷想。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整个圣苏尔皮塞区都要开始变化，开

^① 法国的一种香烟。



始准备过夜。学习当公证律师的女学生很快就会回来，莱诺特雷太太的丈夫将拖着他的腿爬楼梯，六层楼的那些在买面包和报纸的时刻蜂拥而至的姊妹们的叫喊声也将传来。米切莱不会耽搁的，除非她迷了路或者老在街上停留：她特别喜欢在什么地方驻足，喜欢浏览橱窗那特有的小世界。然后会对他讲述上弦的熊，库伯兰^①的唱片，带蓝宝石的铜项链儿，司汤达的作品全集和夏季流行的时装。这些使她稍稍来迟的理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时，他又燃上了一支高卢香烟，呷了一口白兰地酒。他很想听听麦克奥伦的歌曲，便在纸头和笔记本堆里马马虎虎地翻了翻。准是罗兰或巴维特把唱片带走了；他们把他的东西拿走的时候是完全能够通知他的。米切莱怎么还不来？他坐在床沿上，把床单弄皱了。真糟糕，现在他又得撑撑这边，拉拉那边。见鬼，枕头边儿又露出来了。房

^① 库伯兰(1668-1733)，法国作曲家、法国古钢琴派的中心人物。



间里有一股强烈的烟味儿，米切莱会翕动鼻子对他说，烟味儿呛死人了。长久以来天天抽这种法国高卢牌香烟，一个话题，一些女朋友，两次肝病危险期，看小说，厌倦乏味。天天抽这种法国烟吗？发现人们关心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且着重细节，他总是感到吃惊。他想起10年前他丢在垃圾堆上的那些旧领带。领带的颜色跟集邮的少年们引为骄傲的一种比属刚果邮票的颜色一样。他好像在脑海深处准确地知道他一生吸了多少支烟，每个人有什么嗜好，什么时候点烟，把烟蒂丢在哪里。也许那些有时在他的梦中出现的荒唐数字是那种无情的计算方法的符号。“但是上帝是存在的。”皮埃雷想。衣柜的镜子上映出了他的笑脸，他不得不像往常那样收起笑容，把额前的一绺黑发撩到头上；米切莱曾经威吓他，要把那绺头发给他剪掉。米切莱怎么还不来？“因为她不愿意进我的房间。”皮埃雷想。可是，为了有一天把他额前的那绺头发剪掉，她就必须进他的房间，在他的床上休息。达利拉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却连一个



男人的头发也未能接近。皮埃雷心想：认为米切莱不愿意进他的房间的想法是愚蠢的。他是悄悄地想的，就如在远处说话，别人听不见。有时一个人的想法好像能够穿过无数个障碍，变成声音让人听。认为米切莱不愿意进他的房间，是愚蠢的。她不来是因为她被一家五金店或商店的橱窗吸引住了，对一只小瓷豹或一幅赵无极^①的石版画着了迷。他仿佛看见了她，同时意识到，恰恰在他吸一大口烟、觉得他的愚蠢想法可以原谅的时候，他正在设想一种双管猎枪。那种双管猎枪没有什么稀奇处。然而在这种时候，在他的房间里，仅仅想到那种双管猎枪，还有那种奇怪的感觉，有什么用呢？这个时刻一切都变成了淡紫色和灰色，他是不喜欢的。他懒洋洋地伸手去开桌上的灯。米切莱怎么还不来？她可能不来了，再等下去也没有用。应该想到，实际上她是不愿意到他房里来的。不管怎样，这也不算什么悲剧；再喝一杯白兰地，

① 当代法国华裔著名画家。



看我的小说，下楼到莱昂酒吧间吃点东西。在昂基安或巴黎，女人还是那些女人，无论是成年的还是未成年的。她们的特殊论已开始破产，老鼠还没有进笼子就退缩了^①。可那是什么鼠笼呢？一天还是两天，以前还是以后……自打5点起他就等她，虽然她应该6点来；他专门为她铺上了蓝床单，像个白痴似的爬上椅子，手拿鸡毛掸，把一个谁也不妨碍的小蜘蛛网掸掉。要是这个时刻她在圣苏尔皮塞街下汽车，向他家走来，路上停在橱窗前或观看广场上的鸽子，那也是很自然的事。她没有任何理由不愿意上楼进他的房间。当然，他也没有任何理由考虑那种双管猎枪或认为此刻读米肖^②的作品比读格雷厄姆·格林^③的好。临时的选择总是使皮

① 意思是说女人都是胆小如鼠的。

② 亨利·米肖，法国诗人，生于1899年，其作品深奥难懂。

③ 格雷厄姆·格林(1904—)，当代英国著名作家。



埃雷感到不安。不可能什么都是无代价的。不可能一种单纯的偶然性就能决定要格林不要米肖,或者要米肖不要昂基安,就是说不要格林,甚至把昂基安这样的城市同格林这样的一位作家混同起来……“不可能一切都会那么荒唐,”皮埃雷想,扔掉了烟蒂。她要是不来,是因为她碰到了什么事;那同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关系。

他下楼走到门口,在那儿等了一会儿。他看到广场上的灯亮了。当他坐在街旁一张桌上要一杯啤酒时,莱昂酒吧里几乎没有人了。他坐在那儿可以看见他家的门口,她要是还……莱昂在谈论法国之行;尼科莱和他的女朋友、哑嗓子的卖花姑娘来了。啤酒是冰镇的,应该要几块香肠。在他家的门口,看门妇的男孩在玩单腿跳的游戏,一条腿跳累了再换一条腿,总是不离门口。

“你真傻,”米切莱说。“我们已经说好了,我怎么会不愿意到你家来呢?”

埃德蒙德送来了早晨 11 点的咖啡。这时几乎还没有顾客。埃德蒙德停留在桌边评论



“法国之行”。然后米切莱解释了可以料想的事情，皮埃雷应该想到的事情。她母亲经常发生昏迷：她父亲吓坏了，赶紧给办事处打电话，跳上一辆出租汽车，结果没什么要紧的，只不过有点头晕。这一切不是第一次发生，但是需要皮埃雷……

“她没出什么事，我很高兴。”皮埃雷傻乎乎地说。

他把一只手搭在米切莱的手上，米切莱把另一只手搭在皮埃雷的手上，皮埃雷把他的另一只手搭在米切莱的手上。米切莱把下面的手抽出来放在上面，皮埃雷把手从下面抽出来放在上面。米切莱把下面的手抽出来，一下子按在皮埃雷的鼻子上。

“你的鼻子跟小狗的鼻子一样凉。”

皮埃雷承认，他的鼻子的温度是个深不可测的谜。

“傻瓜。”米切莱概括她的看法说。

皮埃雷隔着头发吻她的额头。由于她低着头，他托起她的下巴，要她望着他，然后吻她的



嘴。他吻了她一次，两次。他闻到一股清新的气息，一股树底下的阴凉味儿。“在令人陶醉的5月”，他清楚地听见了歌儿的旋律。如此清楚地记得这句翻译过来对他才有完整意义的歌词，他感到几分惊讶。但是他喜欢这支歌曲的旋律，他吻着米切莱的头发，吻着她的嘴，歌词听起来特别悦耳。“在令人陶醉的5月……”

米切莱的手使劲儿抓着他的肩头，手指甲像钉子似的掐着他。

“你真坏。”米切莱推着他说，同时用手指摸了摸嘴唇。

皮埃雷看到了他的牙齿在她唇上留下的牙印。他抚摸着她的面颊，又尽情地吻了她一次。米切莱生气了吗？不，没有生气。二人何时，何时，何时能够单独在一起呢？他不明白，米切莱的解释好像是关于别的事。他固执地渴望见到她，盼着有一天她到他家来：爬完五层楼，走进他的房间，却想不到事情会来得这么痛快，米切莱的父母要到农场去呆半月。那就让他们去吧，这样更好，因为那时米切莱……他突然回到



现实中来，凝视着她；米切莱笑起来。

“这半个月你自个儿在家吗？”

“你真傻。”米切莱说。她伸出一个手指划着看不见的星形、菱形和不十分弯曲的螺旋形。当然她母亲可以指望忠实的巴维特^①陪着她度过两个星期，城郊发生过那么多偷窃和抢劫事件。巴维特将留在巴黎，这是他们所希望的。

皮埃雷不认识她家的楼房，虽然他三番五次地想像过它的样子，甚至觉得他已经置身楼中了：他和米切莱走进一间摆满旧式家具的小客厅，用手指摸摸楼梯口扶手上的玻璃球后爬上一道楼梯。他不知为什么不喜欢这所房子，他想到花园里去，尽管他很难相信一幢这么小的楼房还会有一座花园。他努力打消了这些想像，发现他是幸福的，他和米切莱坐在咖啡馆里。楼房肯定跟他想像的不同，色调暗淡的家具和地毯会叫他有点透不过气。“我得向哈维尔借辆摩托车。”皮埃雷想。他将等着米切莱，

① 米切莱的女友。



半个小时他们就能到克拉马特街，他们将有两个周末去野游，必须买个热水瓶，买袋速溶咖啡。

“你家的楼梯上有玻璃球吗？”

“没有，”米切莱说，“你弄错了……”

她打住了，仿佛喉咙里塞住了什么。皮埃雷坐在小板凳上，把头靠在埃德蒙德好像为了增加咖啡馆的餐桌而装的大镜子上。他模模糊糊地觉得米切莱好像是一只猫或一张无名的照片。他不久前才认识她，也许她也会觉得不可理解。这件事绝不能用一见钟情来解释，也不能用有共同的朋友或一致的政治见解来解释。一般总是从相信谁也没有秘密开始，了解情况是轻而易举的：米切莱·杜维诺斯，24岁，栗色的头发，灰色的眼睛，办公室的职员。她也知道，皮埃雷·豪利维特，23岁，黄色的头发……但是明天他要和她一块到她家去，半个小时就能到昂基安。“就要去昂基安，”皮埃雷想，他避免提她的名字，仿佛那是只苍蝇。他们将有15天的时间在一起，她家有一座花园，花园可能跟



他想像的大不相同。他得问问米切莱，花园是什么样的，但是米切莱在呼唤埃德蒙德了。已经 11 点半多，看见她回来晚了，经理会对她发火的。

“再坐一会儿吧，”皮埃雷说。“你瞧，罗朗和巴维特来了。真不可理解，我们总不能单独呆在这个咖啡馆里。”

“单独？”米切莱说。“我们不是跟他们聚会的么。”

“我知道，不过，反正一样。”

米切莱耸了耸肩。皮埃雷知道自己明白，但是心里还是抱怨：朋友们会来得这么准时。巴维特和罗朗像往常那样面带平静的幸福表情，可这一次使他感到十分恼火，很不是味儿。他们站在另一边，被时代的防波堤保护着；他的怒火和不满应该冲着世界，冲着政治和艺术，从来也不应该冲着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深厚友情。亏了习惯和机械的表情，彼此才避免了不快。



一切都理平了,熨好了,妥帖了,清点了^①。满意的孩子们,可怜的小伙子们,多么要好的朋友啊!他差一点没有握罗朗伸给他的手:他咽了一口唾沫,望了望他的眼睛,然后用力攥着他的手指,仿佛要把它们攥断似的。罗朗笑了,坐在他们对面;他带来了一家电影俱乐部放电影的消息,星期一一定得去。“得意的崽子们,”皮埃雷自言自语地说。他是白痴,他是不公正的。可是,那是一部帕多夫金导演的影片。算了吧,还是找一部新片子看吧。

“新的?”巴维特嘲笑说,“新的,瞧你多老啊,皮埃雷。”

他没有任何理由不愿意跟罗朗握手。

“他穿了一件很合身的橘黄色的罩衫。”米切莱说。

罗朗请大家吸高卢香烟,并叫了咖啡。他没有任何理由不愿意跟罗朗握手。

“是的,她是一位很聪明的姑娘。”巴维特

^① 意思是说他们之间的一切不快完全消除了。



说。

罗朗望着皮埃雷，对他挤了挤眼。他很坦然，没有疑问；绝没有疑问，坦然的崽子。皮埃雷很讨厌那种坦然，米切莱竟会谈起他的橘黄色罩衫，跟往常一样，这是跟他不相干的。他们毫无关系，他是最后一个来到他们中间的，他们勉强容下了他。

米切莱在讲话的时候（现在讲的是鞋子的事情），用一个手指摸了摸嘴唇。他连好好地吻她都不能够，他伤害了她，米切莱是记得的。可人们在伤害他，对他挤一只眼，冲他微笑，很喜欢他。他的胸中仿佛压着一块石头，他需要离开他们，独自呆在他的房间里自问：为什么米切莱不来，为什么巴维特和罗朗拿走一张唱片不告诉他。

米切莱看了看表，吓了一跳。他们商定将去电影俱乐部看电影，皮埃雷付了咖啡钱。他心里觉得舒畅了，真想再跟罗朗和巴维特聊一会儿。他心情激动地跟他们告别。好孩子们，跟米切莱这么要好。



罗朗望着他们离开，走向阳光下的大街。然后，他慢慢地喝着咖啡。

“我在寻思。”罗朗说。

“我也在寻思。”巴维特说。

“他俩为什么不能呢？”

“当然，为什么不能。不过，从那以后，这是第一次见面。”

“是米切莱对她的生活作出某种安排的时候了。”罗朗说。“你要是要我发表意见，我认为她很钟情。”

“他们两个十分相爱。”

罗朗陷入了沉思。

皮埃雷同哈维尔约定在圣米切尔广场一家咖啡馆里会面，但是他来得太早了。他要了啤酒，浏览着报纸；那些在办事处门口同米切莱分手后所做的事情，他已经淡忘。近几个月来，就像这个还没有过去的早晨一样，他觉得心里乱糟糟的，他的头脑简直变成了一个虚假的记忆和错觉的混合物。在他经历的那段遥远的生活



中,惟一确实的事情是他同米切莱的关系空前密切了,他希望并且意识到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事情总是有点突然,他还一点儿也不了解米切莱,事实上他根本就不了解她(只知道她有一双灰色的眼睛,每只手有五个手指,没有结婚,头发梳得像个小姑娘),实际上他根本就不了解她。所以,既然你一点儿不了解米切莱,就应该暂时不要见她,让这个空白变成一大团痛苦的乱麻吧;她害怕你,讨厌你,有时还固执地拒绝你吻她,她不愿意跟你同床,她对某种事情怀有恐惧,今天早晨她还坚决地拒绝你(可她是那么高兴,分手时那么恋恋不舍,那么认真地准备着一切,好等明天跟你见面并一块到昂基安的她家去)。你把牙齿的痕迹留在了她的嘴上,你吻她,咬她,她叫起来,用手指摸了摸嘴,但是没有生气,只是有点惊奇,“当所有的花苞开放的时候,”你心里唱着舒曼^①,傻瓜,你一边咬着她的

① 罗伯特·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文中指唱他写的歌曲。



嘴一边唱。现在你想起来了,另外你还爬了楼梯,是的,你爬了楼梯,用手摸过扶手头儿上的玻璃球,可是后来米切莱说她家根本没有什么玻璃球。

皮埃雷在小板凳上滑动着,找他的香烟。总之,米切莱也不十分了解他,一点也不奇怪,尽管她用那种聚精会神、严肃认真地倾听你披露衷肠的方式,有那种欣赏一会儿生活、任何一种东西、一只从车库门下钻出来的猫、西岱岛^①上的一阵暴风雨、一片三叶草叶和格里·马利根的一张唱片的能力。她和蔼、热情而又严肃,听别人讲话或让别人听她讲话时都是如此。就是这样,经过一次次会面,一次次交谈,他们就从人群中分离出来成了单独的一对儿。他们一起谈一点政治,看小说,看电影,愈来愈热切地接吻,她让他的手从脖颈上滑下来,抚爱她,而且还让他重复他那没完没了的问话,却不作回答。“下雨了,得到门廊里躲一躲;太阳太毒了,

① 巴黎塞纳河中的小岛之一。



到那个书店里去吧，明天我把巴维特介绍给你认识认识，她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你会喜欢她的。”后来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巴维特的男朋友是哈维尔的一位老同学，哈维尔是皮埃雷的最好的朋友。这群朋友有时在巴维特和罗朗家里聚会，有时在哈维尔的诊疗所里或夜晚在拉丁区的咖啡馆里聚会。皮埃雷将感谢——不知他的谢意出自何因——巴维特和罗朗做米切莱的亲密朋友，给了他谨慎保护她的印象，虽然米切莱并不需要别人保护。在这群朋友中间，谁也不喜欢议论别人；而更乐于涉及重要话题，例如政治或案件；他们尤其喜欢高兴地对望，彼此敬烟，坐在咖啡馆里交谈，感到生活在伙伴们中间。他很幸运受到他们欢迎并让他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的头脑不简单，他们懂得使外地人抬不起头来的最可靠的方法。“我喜欢他们。”皮埃雷对自己说，接着将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也许他们相信他已经是米切莱的男朋友了，至少哈维尔会相信这一点；可是他怎么也不明白，在整个这段时间里，米切莱会对他那么冷淡，并



无明确的理由，只是那么冷淡，却又继续跟他见面，一起外出，听他说话或自己说话。他甚至对觉得奇怪的事情也习惯了，相信秘密自己会披露，一个人最后还是得自己忍受，容忍不能容忍的事情。当一切都变得那么无味后，就只能在街角上或咖啡馆里分手了。当他爬楼梯去见她、真正去见她时，他看见扶手头儿上有一个玻璃球。可是米切莱说她家里没有什么玻璃球。

身材又瘦又长的哈维尔脸上带着工作日子的所有的表情。他提到几次试验，作为对怀疑主义的一种刺激谈到了生物学。他一面讲话一面望着一个被染黄了的手指。皮埃雷问他：

“你是突然想到那些完全与你所思考的问题无关的事情的吗？”

“完全无关的只是对工作的某种假设。”哈维尔回答。

“这些日子我感到自己很怪。你应该给我某种东西，一种客观化的东西。”

“客观化的东西？”哈维尔说。“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老兄。”



“我考虑自己的时候太多了。”皮埃雷说，“这是愚蠢的。”

“米切莱呢，她对你不是客观的吗？”

“就在昨天，我还想起……”

他听见自己在讲话，看见哈维尔在望着他，发现了映在一面镜子中的哈维尔的形象、哈维尔的后颈，看见自己在跟哈维尔讲话（可是我干吗要想到扶手的头儿上有一个玻璃球呢？），不时地看到哈维尔的头部的活动，即他不在诊所里，没有穿那使他置身别的岗位并赋予他别的权力的白大褂时显得那么可笑的、职业性的动作。

“想起昂基安吧，”哈维尔说。“不必为此担心，我就常常把 mans 同 mentón 弄混了。这要归罪于遥远的童年时代的女教师。”

“在那令人陶醉的 5 月……”皮埃雷在心里哼着。

“你要是睡不着就告诉我，我要对你讲一件事情。”哈维尔说。“不管怎样，我敢说，这 15 天你在天堂里会满足的。没有比同床共枕更美的



了,这会冲淡你的思绪,也许会使它们烟消云散,那将是一种安宁。”

也许他必须更多地工作,更少地休息,美化一下他的房间,步行而不是坐公共汽车到学院去。他必须挣到父母寄给他的7万法郎。他伏在“新桥”^①的栏杆上,望着一条条驳船驶过,感觉到夏日的阳光晒着他的脖颈和双肩。一群姑娘在笑着游玩,传来一匹马的奔驰声;一位红头发的骑车人从姑娘们身边经过时吹了长长的一声口哨,姑娘们笑得更厉害了,仿佛干枯的树叶都飞起来狠狠地一下把他的脸刮掉似的。

皮埃雷揉了揉眼睛,慢慢地直起了腰。不是言语,也不是幻觉,而是两者之间的东西,是一种像地上的干树叶(飞起来打在他的脸上)那样分解成许多言语的形象。他看到他的右手哆哆嗦嗦地使劲抓着栏杆。他握起拳,竭力克制住手的哆嗦。哈维尔已经走远,想追上他再对他讲一件趣闻,是徒劳的。“干树叶,”也许哈维

① 巴黎市内的一条大河上的桥。



尔会说。“可是，新桥上并没有干树叶。”好像他不知道“新桥”上没有干树叶，昂基安才有干树叶似的。

现在我又想念你了，亲爱的，整夜只是想念你。我只是想念你，这是我感觉到自己存在，感觉到你像一棵树一样在我的怀抱里的惟一方式：我慢慢地离开了支撑我、指引我的树干，谨慎地在你周围浮动，同时用每个树叶探察着空气（绿色的，绿色的，我自己和你自己，强有力的树干和绿色的叶子：全是绿色的，绿色的）。但始终不离开你，不许别的东西插到你我中间来，我不离开你，每时每刻我都知道夜晚在渐渐转向天亮。而在你生活和睡觉的那个地方，当我们一起到达时，将又是夜晚，我们走进你的家门，登上门廊前的台阶，打开电灯，抚摸你的狗，喝咖啡，久久地对望，然后我拥抱你（你像一棵树一样站在我的怀里），把你拉到楼梯前（但是没有什么玻璃球），开始往上爬，往上爬，房门关着，不过，我的口袋儿里有钥匙……



皮埃雷从床上跳起来，把头伸到洗脸池的龙头下。我仅仅想念你，不过，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想的事情竟变成了一种无声无息的愿望，米切莱不再是米切莱（你像一棵树一样在我的怀抱里），他爬楼梯时感觉不到她在他的手里，因为他刚刚登上一层台阶就看见了玻璃球，而且是他一人，独自一人爬楼梯，米切莱却在楼上，关着房门，躲在门里，并不知道他口袋里还有一把钥匙，他正在上楼梯。

他擦干了脸，向着凉爽的黎明敞开窗子。街上有一个醉汉，一面像浮在黏糊糊的水里似的摇摇晃晃走路，一面友好地自言自语。他在慢慢侵入石铺路面和关闭的门廊的淡薄阴影里低声唱着，来回跳着一种缓慢的礼仪舞蹈。“当所有的花苞开放的时候”，歌词在皮埃雷的干瘪的嘴唇上跳动，附和着楼下那与旋律毫不相干的低唱声，不过歌词同样与什么也不相干，跟其他歌词一样，偶尔有一点生气，但随后仿佛受到某种怒火的支配似的戛然而止。敞着破衣褴衫躬着腰、含糊地哼着歌儿、踉踉跄跄有节奏地跳



着帕瓦纳舞^①的醉汉忽然激动起来，把挂着的某种东西：一杆双管猎枪或者一块填着干树叶的垫子上的破布条举起来。

摩托车在阿莱西亚街上疾驰，隆隆作响。皮埃雷感觉到每当他们贴着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或绕过一个街角时，米切莱的手指总是更用力的抓着他的腰部。碰到红灯停车时，他就把头往后一仰，让米切莱摸摸或亲亲他的头发。

“我不害怕了。”米切莱说，“你驾驶得很好，现在应该向右拐了。”

米切莱的楼房坐落在克拉马特街那边的一座小山上，淹没在几十栋相似的房屋中间。对皮埃雷来说，楼房这个字眼儿听起来就像一个庇护所，里头的一切准是安静的、孤寂的，里面准有一座摆着柳条椅的花园，晚上也许还会有一只萤火虫。

“你家花园里有萤火虫吗？”

① 西班牙一种古典舞蹈，步调缓慢而庄重。



“我想不会的。”米切莱说。“你的想法多可笑呀！”

在摩托车上交谈很困难。行车必须思想集中。皮埃雷早晨只睡了几个钟头，这会儿也累了。他应该记得吃哈维尔给他的药片的，但是显然，他肯定忘记了，再说，他也不需要了。他把头往后一仰，咕哝了一声，因为米切莱迟迟不吻他。米切莱微微一笑，用一只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发。绿灯亮了。“别犯傻了，”哈维尔曾这样对他说。心情显然不安。当然，睡前他会拿两片药，喝口水送下去的。米切莱睡得怎样呢？

“米切莱，你睡得好吗？”

“很好。”米切莱说。“有时做噩梦，跟所有的人一样。”

当然跟所有的人一样，只是醒来的时候才明白梦幻被抛在了脑后，梦境并没有同街上的喧闹声和朋友们的面孔混杂在一起，尽管其中交织着最正直的工作。（但是哈维尔说过，只要吃两片药，他就会好的。）她准是把脸埋在枕头里、稍微蜷着腿、轻轻地呼吸着睡的。现在他将



看到她这样睡觉，听见她这样睡觉时的呼吸声了……

黄灯，红灯，停车。

他猛地刹住了车。米切莱惊叫了一声，随即默默地呆着不动了，似乎为自己的叫声感到羞惭了。皮埃雷一只脚着地，扭着头，面对着某种东西微笑，总是微笑着。那东西不是米切莱，好像在空中消失了。他知道，红灯将变成绿灯。他的摩托后面有一辆卡车和一辆汽车。绿灯亮了，摩托车后面的卡车或汽车司机在按喇叭，一次，二次，三次。

“你怎么啦？”米切莱问他。

汽车从他旁边驶过时，司机骂了他一句。皮埃雷慢慢启动了。

上面已经讲到，他将像他想像的那样看到她那样睡觉，听见她那样睡觉时的呼吸声，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哪怕是一分钟，认为他们必须……“是的，我已经听见了，先是向左，然后还是向左。就是那幢石板屋顶的吗？有松树，真美！有一座花园，真美！你父母去农场了，几乎



难以相信，米切莱，这事几乎难以相信。”

博比虚张声势地汪汪叫着迎接了他们，装模作样地仔细嗅着皮埃雷的裤子。他正在把摩托车推到檐下。米切莱已经走进楼去，打开了百叶窗，又回转来迎接皮埃雷。皮埃雷瞧着墙壁，发现它一点儿也不像他想像的那样。

“这儿本该有三层台阶的。”皮埃雷说。“这间客厅，倒是亮堂……你别介意，我常常把事情想像成另一个样的。甚至家具，每个细节。你也有过这种情况吗？”

“有时候。”米切莱回答。“皮埃雷，我饿了。不，皮埃雷，你听我说，你做个好人，帮我一下；我得炒点东西。”

“亲爱的，干什么？”皮埃雷说。

“打开那扇窗子，让阳光进来。你安静地呆着吧，不然的话，博比会认为……”

“米切莱。”皮埃雷说。

“不，请让我上楼去换一下衣服。你要是愿意就把外套脱掉，那个柜子里有饮料，你去拿吧，我对饮料是外行。”



他看见她跑去，爬上楼梯，消失在楼梯平台上。柜子里有饮料，她不懂这个。客厅又深又暗，皮埃雷用手抚摸着楼梯扶手的下端。米切莱已经对他讲过了，可是他像个感到扫兴的聋子，实际上并没有玻璃球。

米切莱穿着一条旧裤子和一件不可想像的女衫回来了。

“你像个蘑菇。”皮埃雷用男人们对一个穿着过分肥大的衣服的女人的亲热口吻说。“不让我看看你的房间吗？”

“你要愿意的话。”米切莱说。“没有找到饮料吗？等一下，你真没用。”

二人把杯子拿到客厅，面对半开半掩的窗子坐在沙发上。博比跟他们亲热了一番，然后卧在地毯上瞅着他们。

“它马上就跟你熟了。”米切莱说，一面舔着杯子口。“你喜欢我的家吗？”

“不，”皮埃雷说。“房子黑乎乎的，虽说讲究，但很俗气，摆满了令人厌恶的家具。可是你，怎么穿一条这么难看的裤子。”



他亲热地摸了摸她的脖子，把她拉过来，吻了她。他们彼此吻着，皮埃雷感觉到了米切莱的热乎乎的手，二人彼此吻着，一齐往下滑了一下，但是米切莱叫了一声，想推开他，嘟哝了一句什么，他不明白。他慌乱地想，最难办的是堵住她的嘴，他不愿她晕倒。他猛地把她松开，然后瞅着自己的双手，好像那手不是他自己的，他听见了米切莱的急促的喘息声和卧在地毯上的博比的哼叫声。

“你会使我发疯的。”皮埃雷说，话虽然可笑，但不像刚刚发生的事情那么难堪。仿佛一道命令，一种不可克制的愿望，把她的嘴堵住而又不叫她晕倒。他伸出手，远远地抚摸着米切莱的面颊。他什么都同意了，同意吃点现做的东西，他得选择白兰地，窗前多热也没关系。

米切莱有自己的吃法：把干酪同油脂鳗罐头、凉拌菜的螃蟹块搅在一起。皮埃雷喝白兰地酒，望着她，对她微笑。要是跟她结婚，他每天都能在那张桌子上喝他的白兰地酒，望着她，对她微笑。



“真怪，”皮埃雷说。“我们从没有谈论过战争的岁月。”

“更没有谈过……”米切莱说，一面收拾着盘子。

“我知道，不过往事有时会浮上脑海。对我来说，并非那么不幸，因为不管怎样，那时我们是孩子。那些岁月就像一次过不完的假期，一件地道的、几乎是很有趣的荒唐事。”

“我可没有什么假期，”米切莱说。“一天到晚下雨。”

“下雨？”

“这儿，”她用手碰了碰额头说。“我的眼前，我的眼后，全都是潮湿的，就好像出汗似的，湿乎乎的。”

“那时你住在这里吗？”

“最初住在这儿。后来，因为工作，我被送到昂基安几位叔叔家。”

皮埃雷没有注意火柴还在他手里燃烧，他张开嘴，甩了甩手，骂了一声。米切莱微微一笑，能够谈论别的事，她很满意。当她站起来拿

水果的时候，皮埃雷点上了烟，仿佛噎着似的吸着烟。“不过，已经过去了，只要动脑筋，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在喝咖啡交谈的时候米切莱有多少次提到昂基安了啊，那些话似乎毫无意义，被忘记了，最后变成了梦幻或想像的主旋律。不错，是一只桃子，不过是剥了皮的。唉，她觉得太可惜了，可是女人们总是把桃子给她剥皮，米切莱没有理由特殊。

“女人们呀，要是把桃子给剥了皮，她们便是一些跟我一样的蠢人。最好你还是研咖啡。”

“那时你住在昂基安，”皮埃雷说，他望着米切莱的双手，目光里流露着一丝看到一只水果被剥皮时产生的那种厌恶表情。“战争期间你父亲做什么？”

“噢，他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生活着，等待一切彻底结束。”

“德国人从来不找你们的麻烦吗？”

“不，”米切莱说，把桃子在潮湿的手里转动着。

“这里是第一次对我说你们住在昂基



安。”

“我不愿意谈论那些岁月。”米切莱说。

“可是，你过去谈过。”皮埃雷反驳说。“我不知你怎么谈的，但是我知道你住在昂基安。”

桃子被丢在盘子里，削下的果皮又沾在果肉上。米切莱用刀子刮了刮桃子，皮埃雷又一次感到厌恶，使劲地搅着咖啡。她什么也不对他说，为什么？她专心致志地洗着水淋淋的桃子，大概心里不快吧。她为什么不开口？她的话是很多的，现在却只是望着他的手，神经质地眨着眼睛，有时眨着眨着就颤动起来，半个脸耸起来又放回去。在卢森堡花园的长椅上他就看到过这种总是伴随着身体不适或沉默的颤动。

米切莱在背对着皮埃雷配制咖啡，皮埃雷用一支烟燃着另一支烟。然后他们拿着带蓝斑点的瓷杯子回到客厅。咖啡的色调看起来很舒服，他们对望着，好像对那种间歇和在她之前发生的一切感到惊奇；彼此一言半语地交谈着，对望着，微笑着，漫不经心地喝着咖啡，仿佛是喝着巫医配制的将他们终身牢牢结合在一起的药



汁。米切莱把百叶窗打开一条缝，一束绿色的暖和的光线从花园里透进来，像烟雾和皮埃雷喝得浑身软绵绵的白兰地酒味一样包围着他们。博比在地毯上睡了，不时地战栗和叹气。

“它老是做梦。”米切莱说。“有时候哭，突然醒来，望着我们大家，仿佛刚刚经受过什么巨大痛苦。它几乎还是个小狗……”

皮埃雷愉快地这样坐着，此刻心情很满意，合着眼睛，像博比那样叹息，用手一次又一次地摸着头发，觉得在头发上滑动的手好像不是他自己的，手滑到后颈时感到微微发痒，心里感到平静。当他睁开眼时，看到了米切莱的脸、她的似张非张的嘴和她那好像突然一滴血也没有了的表情。他莫名其妙地望着她，一只酒杯在地毯上滚动。米切莱站在镜子前；看到她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像无声电影上爱向女人献殷勤的人那样，他几乎觉得可笑。米切莱为什么一定得哭呢？她没有哭，不过她用双手掩着脸，看去就像是哭。他把她的手猛地从脸上拿下来，吻她的脖子，还想吻她的嘴。他听见了说话声，是她



的声音，是她在说话，他们像两头小野兽在打架，冲突渐渐变成了亲狎，房间里散发着午休的气息，空房子的气息，希望楼梯扶手头上有玻璃球的楼梯的气息。皮埃雷真想把米切莱举起来，跑上楼去。他兜里有钥匙，他要走进她的卧室，把她搂在怀里，感觉到她的颤抖，笨拙地动手摸她的腰带，纽扣，但是楼梯扶手的头上没有玻璃球，一切都是遥远的，可怕的，他身边的米切莱是那么遥远，她在哭泣，她的脸在她的被浸湿的手里哭泣，她的身体在喘息，她害怕，拒绝着他。

皮埃雷跪下来，把头伏在米切莱的怀里。几个小时过去了，一、二分钟过去了，时间仿佛是一种充满鞭子和口水的东西。米切莱的手指抚弄着皮埃雷的头发，他又一次看到她的脸，她脸上的一丝笑容，米切莱用手指理着他的头发，她用力将他的头发往后推，几乎把他弄疼了，于是她低下头去，吻他，对他微笑。

“你叫我害怕，有一会儿我觉得……我多傻啊，可是你是那么不同。”



“你看到谁了？”

“没看到谁。”米切莱回答。

皮埃雷伏在那儿等着，现在有什么东西，好像是门在摆动，要敞开似的。米切莱沉重地喘着气，好似游泳运动员在等待信号枪响。

“我害怕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使我想起了……”

门在转动，在转动，女游泳运动员在等待枪声，好跳入水中。时间像一块胶皮在伸长，皮埃雷于是把双手伸过去，抓住了米切莱，顺势站起来，深深地吻她，寻找女衫的纽扣，他听见她在哼哼，他自己也边吻边哼哼，来，现在来吧，他想把她抱起来（右边有十二层台阶和一道门），他听见米切莱在呻吟，在拼命地反抗，他抱着她站直身子，现在，就在此刻，他不能再等待了，再固执地想那个玻璃球，想楼梯的扶手，是没有用的（再说，扶手上也并没有什么玻璃球），但也休想把她抱到楼上去。于是，她就像一条母狗，他也成了一个肉疙瘩。她就像一条真正的母狗，他要叫她懂得。噢，米切莱，噢，我的宝贝，别这么



哭，不要难过，亲爱的人儿，不要再让我掉在那座黑井里，我怎么能回想那件事呢，你别哭，米切莱。

“放开我。”米切莱低声说，拼命挣脱着。她终于推开了他，不认识似的看了他一会儿，跑出了客厅，关上了厨房门，传来一阵转动钥匙的声音，博比在花园里汪汪叫着。

镜子里出现了皮埃雷的一张平滑的、没有表情的脸，一双像破布一样垂着的手，一角露在裤腰外的衬衣下摆。他机械地整理着衣服，不时地望望镜子里的映像。他觉得喉咙堵得慌，白兰地咽不下，直烧嘴，只得硬往下咽，然后再接着对着瓶子喝，没完没了地喝。博比不再叫了，气氛像午休一样静，楼里的光线愈来愈绿。他用干燥的嘴唇叼着一支烟，走到廊下，走向花园，经过摩托车，向深处走去。他闻到了蜜蜂的嗡嗡声和松针叶的垫子味儿。现在博比又在树林里叫起来，冲着他叫，突然哼哼起来，它在远处叫着，但愈来愈近，冲着他叫。

皮埃雷扔出一块石头，打在了狗背上；博比



哀叫着逃开了，又在远处叫起来。皮埃雷慢慢地瞄着，击中了一条后腿。博比躲进灌木丛中去了。“我得找个地方想一想，”皮埃雷思忖着，“我必须马上找个地方，躲起来想一想。”他把背部贴着一棵松树往下滑，慢慢地蹲在了树下。米切莱从厨房的窗口望着他。我打狗的时候她可能看到了，她望着我，好像没有看见我似的；她望着我，没有哭，没有说什么，她在窗口那么孤单，我得走过去，和气地对待她，我愿意做个和善的人，我愿意拉她的手，吻她的手指，吻每一个手指，吻她的软滑的皮肤。

“我们在玩什么游戏呀，米切莱？”

“希望你不要把它打伤。”

“我对它扔石头是想吓唬它。它好像跟你一样不认识我。”

“别胡说八道了。”

“你别把门锁上。”

米切莱放他进去了，老实地让他搂住了腰。客厅的光线更暗了，几乎看不见楼梯口。

“原谅我吧，”皮埃雷说。“我无法对你解



释，它太不理智了。”

米切莱把倒下的杯子放好，把酒瓶盖上。房内愈来愈热了，仿佛房子在通过他的嘴吃力地呼吸。一块散发着青苔味儿的手帕擦着皮埃雷额头上的汗。“呵，米切莱，怎么能这样下去呢，不谈，也不想了解此刻正把我们撕碎的事情……是的，亲爱的，我要坐在你身边，我不会犯傻，我要吻你，陶醉地吻你的头发，你的脖子，你该明白，没有理由……是的，你该明白，当我想要把你抱起来，不损害你，让你的头倚着我的肩头，把你抱到楼上你的房间去的时候……”

“不，皮埃雷，不。不要说了，亲爱的，请原谅。”

“米切莱，米切莱……”

“请别这样。”

“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

“不知道，请原谅……一点儿也不怪你，全是我的过失。不过，我们有时间，时间长着呢……”

“不能再等待了，米切莱，就现在。”



“不，皮埃雷，今天不行。”

“可是，你答应我了。”皮埃雷笨拙地说。
“我们一直……过了这么久，我一直期待着你爱我……我不知我说的是些什么，我说这些话是不体面的。”

“你要是能原谅我，我要是……”

“你不开口，我又刚认识你，干吗说原谅你？让我原谅你什么？”

博比在廊下哼叫。热得他们衣服都贴在了身上，黏住了他们的手表的滴答声，把米切莱的头发黏在了额上，她坐在沙发上望着皮埃雷。

“我认识你也不久，不过不是因为这个……你一定认为我是发疯。”

博比又哼哼起来。

“几年前……”米切莱说，合上了眼睛。“我们住在昂基安，我已经对你讲过了。我想我对你讲过，那时我们住在昂基安。你别这样看我。”

“我不看你。”皮埃雷说。

“是的，你会伤害我的。”



可是这话不对。为了等待她说话，一动不动地等待她说下去，望着她的嘴微微动弹，不可能伤害她。现在事情就要发生了，她要双手合十祈求。她祈求时，一朵可爱的花在开放。她在他的手里挣扎着，哭泣着，一朵湿润的花儿在开放，他感觉到她拼命挣扎的愉快……博比爬进来，要躺到一个角落去。“你别这样看着我，”米切莱说。皮埃雷回答：“我不看你。”于是她又说：是的，她觉得有人这样看她会伤害她。但是她不能继续讲了，因为现在皮埃雷站起来看狗了，又去照镜子，用一只手摸了一下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像无休止的口哨声。突然他跪在了沙发上，用手掩着脸，浑身颤抖，喘着粗气，像抹掉挂在脸上的蜘蛛网，也像拿掉贴在浸湿的脸上的干树叶似的竭力摆脱着头脑中的形象。

“噢，皮埃雷。”米切莱细声细气地说。

哭声从手指间传出来（手指是阻挡不住的），使空气中充满了一种古怪的回声。泪水固执地流着，不住地流着。

“皮埃雷，皮埃雷。”米切莱叫着，“你这是为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

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把散发着青苔味儿的手帕递给他。

“我是个可怜的白痴，原谅我吧。你在……你在对我说……”

他站起来，倒在了沙发的另一端。他没有注意，米切莱突然往后退去，仿佛要逃走似的再次望了望他。皮埃雷重复说：“你在……你在对我说话，”他喉咙里梗塞，说话吃力。这是为什么呀！博比又哼哼了。米切莱站着，不转身地往后退着，盯着他往后退。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这样做，为什么她要走，为什么呢？关门声他没有在乎。他微微一笑，看到映在镜中的自己的笑容，又微笑了一下，“当花苞全部盛开的时候，”他闭着嘴哼着。一阵寂静。传来某人拿话筒的声音，拨号盘的哧哧声，一个字母，另一个字母，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皮埃雷摇摇晃晃地走着，含糊不清地对自己说，应该去跟米切莱谈一谈，但是他已经走出楼门，来到摩托车旁。博比在廊下哼哼，楼房强烈地反射着发



动机的隆隆声，发动机一声怒吼，摩托车即飞驰而去，沿街而上，再一声怒吼，便消失在远方的阳光下了。

“是我呀，巴维特。当时我就意识到……”

“真蠢！”巴维特说。“我要是在那儿，我想我会教训你一顿的。”

“皮埃雷已经走了。”米切莱说。

“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做法。”

“巴维特，你要是能来的话。”

“干什么？当然我会去的。不过，他是个白痴。”

“他说话支吾，巴维特，我对你起誓……不是一种错觉，我对你说过，以前……好像是第二次了……你快来吧，用电话讲不清楚……现在我刚刚听见摩托车声，他已经走了，他叫我感到难过极了，他怎么能理解我的痛苦呢，那个小可怜儿，可是他也像发疯了似的，巴维特，他是那么古怪。”

“他大概以为你那些创伤都复原了。”巴维



特用相当冷漠的口吻说。“总之一句话，皮埃雷不是傻瓜，他会理解的。我相信他早就知道了。”

“他会讲出去的。他想讲出去。那样的话……巴维特，我对你起誓，他对我讲话是支吾的，以前，以前……”

“你对我讲过了，不过你太夸大了。罗朗有时也按照自己的爱好打扮自己，你不能因此而难为他，真是活见鬼！”

“现在他已经走了。”米切莱单调地重复着。

“他会回来的。”巴维特说。“好了，请给罗朗准备点好吃的吧，他的嘴一天比一天馋了。”

“你在说我的坏话，”罗朗站在门口说。“米切莱出了啥事呀？”

“走，”巴维特说，“我们马上走。”

世界仿佛被手中的吃墨胶辊操纵着，微微向右旋转时，所有的树木就变成了躺在路边的一棵树。于是，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向左转，庞大的绿林化为千百棵杨柳向后跑去，高压电塔一



个接一个缓缓向前移动,向前进是一种可以进行交谈的欢快旋律,路两旁的房舍和其他景物飞快地、不完整地从他眼前闪过。吃墨胶辊向右旋转时,声调便升高,愈来愈高,一根弦绷得几乎要断了,不过,不必再思考了,一切都是机器、贴着机器的身躯和像负情似的打在脸上的风,科维尔,阿尔帕洪,利纳斯—蒙特莱里,又是杨柳,交通警察的岗亭,愈来愈紫的光线,灌满似张非张的嘴的凉爽空气,速度减慢了,愈来愈慢了,在这个交叉路口转向右边,距离巴黎 18 公里,辛萨诺,距离巴黎 18 公里。“我没有自杀,”慢慢进入左边的公路时,皮埃雷想。“我没有自杀,真叫人不能相信。”他疲劳得仿佛背着一个行人,仿佛一种愈来愈甜蜜、愈来愈不可缺少的东西。“我相信,她会原谅我的,”皮埃雷想。“我们两个是那么荒唐,必须让她理解,让她理解,让她理解,人们不相爱是什么真情也不会知道的,我喜欢抚弄她的头发,喜欢她的身体,我爱她,爱她……”路旁出现了树林,枯叶被风卷到公路上,皮埃雷望了望被摩托车轧过和



扬起的树叶；吃墨胶辊再一次向右转，狠狠向右转。突然，玻璃球在楼梯口的扶手微微闪光。没有任何必要把摩托车停在楼房的远处，但是博比叫起来，所以你必须把摩托车藏在树林里，借着最后的光亮徒步向前，进客厅去寻找米切莱，她准在那里，但是米切莱没有坐在沙发上，那里只有白兰地酒瓶和用过的杯子，通往厨房的门敞着，一道发红的光线从那里透进来，夕阳挂在花园的深处，四处一片寂静，最好还是到楼梯那儿去，找找那个闪光的玻璃球，也许那是卧在头一层台阶上几乎从来不哼哼的卷毛狗博比的眼睛。从博比身上迈过去，慢慢地爬台阶，不让台阶咯吱响，不使米切莱害怕，是不困难的；虚掩着的门，门不可能虚掩着，他衣袋里没有钥匙，不过，门要是虚掩着，就不需要钥匙了；一面向门口走一面用手抚弄头发，是愉快的。他轻轻地用右脚抵着门板，一使劲门就开了。他走进房间。米切莱坐在床边上，抬起头来望了望他，把双手抬到嘴上，好像要叫喊。（可是，她怎么没有披头散发，没有穿天蓝色女长衫，现在却



穿一条长裤，好像大了点。)米切莱微微一笑，叹了口气，站起来把双手伸给他，说：“皮埃雷，皮埃雷！”她没有合起双手祈求、反抗，而是叫着他的名字，像一条警犬似的等着他，瞅着他，好像由于幸福或羞愧而颤抖着。当米切莱向后退时，皮埃雷伸出双手去抓她。她碰着了床沿，绝望地向后望着。“叫吧，你叫吧。”全部快乐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抓住了她的头发，“你老实点，”尽管她央求。“老实点，母狗，老实点！”

“老天爷，那真是一件难忘的事情。”罗朗说，使汽车转了个弯。

“我也这么想，几乎七年了。那件事会突然让人想起来，就是现在……”

“你错了。”罗朗说。“现在只是偶尔才想起来。在荒唐的现象中，这是相当合乎逻辑的。我自己……你知道吗，有时我会梦见那一切。我们杀死那个家伙的方式是人们不容易忘记的。总之，在那个时代，我们没有更妥当的办法。”罗朗说，把油门加到了最大。



“她什么也不知道，”巴维特说。“她只知道不久他就被人杀死了。至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她。”

“当然喽。可是，他觉得一点也不应该。我还记得我们在树林里把他从汽车里拉出来时的面孔。他立刻意识到他要被杀死。不错，他是勇敢的。”

“当个勇士总比当个男子汉容易。”巴维特说。“他强奸一个姑娘……当我想到我必须斗争以免米切莱自杀时……那头几个夜晚……我不奇怪，现在人们会重新想起从前的她。可以说这是自然的事情。”

汽车以全速驶进了通向楼房的街道。

“是的，他是一头蠢猪。”罗朗说。“就像他们当年理解的那样，他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①人。他要了一支烟，很自然，这是合理的要求。他还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杀他。我们作了解释。天晓得我们为什么对他作解释。我梦见的

① 有时泛指白人，特别是北欧人的祖先。



他，大多是那个时刻他的那副轻蔑的惊讶表情，他那种几乎是高雅的口吃方式。我记得他是怎样倒下的，被打烂的面孔埋在枯叶中。”

“请不要讲了。”巴维特说。

“在我们没有别的武器的情况下，他那样死值得。一粒惯常使用的猎枪子弹……是击中了左边的内脏吗？”

“不错，是左边的。”

“但愿楼里有白兰地。”罗朗说，随即刹了车。

朱景冬译

南方高速公路

满意的服务





好些日子以来，总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把火生着。火柴跟先前的不一样，现在划着火柴后必须让它头倒下，等火焰慢慢地燃旺起来。木柴呢，又那么湿。尽管我让弗里德里克给我送干木头来，可木柴还是冒潮气，不好烧。自从我的手犯了哆嗦的毛病以来，干什么活儿都越发不方便了。往日我铺床只需一小会儿，床单就像烫过一样平正。现在呢，我得围着床转过来转过去。所以比切姆夫人生气地说，她之所以按小时付我工钱，是为了不叫我铺床时扯扯这儿、拉拉那儿磨洋工。唉！全怪我的手有毛病。当然也怪现在的床单不像从前那么结实、那么厚。莱布朗大夫说我没有什病，只是要加倍小心，不要着凉，晚上早一点休息。“那，这杯酒，弗朗西尼太太，你老喝酒吗？最好戒了它。还有中午的绿茴香酒。”莱布朗是一位年轻医生，他的思想对年轻人很是有益。我年轻的时候谁也不认为酒是有害的东西。后来我从没有喝过称为饮料的东西，不像杰曼太太，就是住在三楼的那一位；或者费利克斯那个畜生，就是



当木匠的那个人。不知为什么现在我想起了可怜的贝贝先生，那天晚上他让我喝了一杯威士忌。贝贝先生啊，贝贝先生！那是节日之夜在罗赛夫人家的厨房里。那时我经常出去，挨门挨户地找事做，按小时挣工钱。我在伦费尔德先生家、在教钢琴和小提琴的姐妹家等等许多人家里干过活儿，一直很顺利。而现在，每星期我只能去比切姆夫人家三次。我觉得在她家不会干很久的。我的手哆嗦得这么厉害，比切姆夫人已经对我不满意了。可是现在我不想再去罗赛夫人家里干活，她也不会来找我。如今贝贝先生，特别是贝贝先生，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呆在厨房里。不，不能了。

当罗赛夫人来我家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她仅仅停留了一分钟。实际上，我的家只是一间房。但是屋子里有厨房。乔治死的时候不得不卖掉一切，不过还剩下一些家具。所以我觉得我有权称为我的家。不管怎样吧，反正有三把椅子。罗赛夫人脱下手套，坐下来：“房间不大，但是可爱。”我并没有被罗赛夫人的话所



打动,虽然我很愿意穿得好一点。她感到惊讶。我穿着教钢琴和小提琴的姐妹送给我的绿裙子。罗赛夫人却不屑一看,就是说,她看倒是看,但是马上又把视线转到别处去了,好像为了蔑视看到的東西。她的鼻子微微蹙起,大概她觉得葱味难闻(我很喜欢吃大葱),要不就是因为她不愿意闻可怜的米诺切的尿味。不过,我很欢迎罗赛夫人来访,并且把这话告诉了她。

“啊,是的,弗朗西尼太太。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因为我很忙……”她蹙起了鼻子,好像她忙的那些活儿发散着臭味似的。“我想请你……就是说,比切姆夫人想,也许星期日晚上你可以自己支配。”

“当然啰,”我说,“星期天望完弥撒后我还能做什么呢?只到古斯塔夫家里呆一会儿……”

“是啊,当然。”罗赛夫人说。“如果星期天你没有事,我愿意你到我家帮我一下。我们要举办一次家庆。”

“家庆?祝贺你,罗赛夫人。”



但是罗赛夫人似乎不愿意听这句话，她突然站起来。

“将安排你在厨房里干活，要干的活儿太多了。如果 7 点能来，我的管家会具体给你介绍。”

“好的，罗赛夫人。”

“这是我的地址。”罗赛夫人说，同时给我一张奶油色的名片。“工钱按 500 法郎算怎样？”

“500 法郎？”

“600 也行。半夜就没事了，能赶上末班地铁。比切姆夫人说你是信得过的。”

“喔，罗赛夫人！”

她走后，我真想笑起来，因为我差一点给她一杯茶（要给她一杯茶，我得找一只杯口没打掉碴儿的杯子）。有时我不注意自己在跟什么人谈话。只是在去某一位夫人家里时我才沉默不语，像女仆那样说话。这大概是因为在自己家里我不是任何人的女仆，或者因为我觉得自己仍然住在我们那幢三间的小楼里。那时我和乔治在工厂里做工，过日子没有难处。也许是由



于过分地责备在灶下撒尿的倒霉鬼米诺切，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位像罗赛夫人那样的夫人。

当我即将走进罗赛夫人家门的时候，一只鞋的高跟儿差一点掉下来。我随即说：“魔鬼，我祝你走运，我爱你，你走吧。”我按了门铃。

一位像唱戏那样留灰白络腮胡子的先生走出来对我说：“请进。”那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套间，里头有一股地板蜡味。留络腮胡子的先生是管家，他身上散发着安息香味。

“总之，”他说，急忙让我跟着他，顺着一条通向仆人房间的走廊走去。“再来请你敲左边的门。”

“罗赛夫人没有对我说这个。”

“夫人没有工夫管这些事。阿丽赛，这是弗朗西尼太太。把你的围裙给她一件。”

阿丽赛把我带到她的房间，她的房间在厨房后边。（多么讲究的厨房！）她给我一条围裙，围裙太大了。看来罗赛夫人是吩咐她给我介绍情况的。可是她开头讲的关于看狗的事可能是



弄错了，所以我不解地望着阿丽赛，望着她的鼻子底下那个小肉瘤。经过厨房时我能够看到的一切是那么富丽堂皇，单单想到那天晚上在那里擦洗玻璃器皿、准备端那家的人吃的美味可口的菜肴用的托盘，我就觉得比去某一个剧院或郊游还美。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理解看狗的事，才困惑地望着阿丽赛。

“啊，不错。”阿丽赛说，她是布列塔尼^①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夫人讲的。”

“什么？那个长络腮胡子的先生不能看狗吗？”

“罗多洛斯先生是管家。”阿丽赛说，带着肃然起敬的神情。

“哼，他不看，让别的什么人看好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单要我看。”

阿丽赛突然板起了面孔。

“为什么不能让你看，太太……”

“我叫弗朗西尼，为你效劳。”

① 法国的旧省份。



“……弗朗西尼太太？这不是一项难干的活儿。就是菲多最淘气，卢西恩小姐把它惯坏了……”

她对我介绍着，态度又像粘粘胶一样亲热了。

“要随时喂它糖，把它抱在怀里。贝贝先生来的时候也惯着它，那么溺爱它，你知道……但是梅多很听话，菲菲也很老实，老呆在一个角落里。”

“这么说，”我说，还没有从惶惑中醒过来。“有许多只狗了。”

“啊，对，有许多只。”

“在一套房子里！”我说，心里感到气愤，并且掩饰不住。“不知你怎么想的，夫人……”

“我是小姐。”

“对不起，小姐。在我年轻的时候，狗都是住在狗窝里的。我完全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和我死去的丈夫曾住在一位先生的别墅旁边一所房子里，那位先生……”阿丽赛不让我讲下去，不是我说的不重要，但是，看来，她很不耐烦。



这一点我马上从她脸上看出来。我只好住口，听她讲话。她说罗赛夫人很爱那些狗，她男人尊重她的一切癖好。她女儿也是这样，从母亲那里染上了同样的癖好。

“小姐对菲多爱得发疯，她很可能买一只同种的母狗让它们生小狗。家里共有六只狗：梅多、菲菲、佩蒂特、肖夫、哈尼瓦尔和菲多。最淘气的是菲多，卢西恩小姐把它惯得坏极了。你听见没有？它准是在门厅里叫呢。”

“那么我在哪里看管它们呢？”我问，带着无所谓的表情，免得使阿丽赛觉得我心里不满。

“罗多洛斯会把你带到狗的房间去的。”

“狗也有房间？”我问，神情总是很坦然。归根到底，阿丽赛没有过错，但是我应该说心里话，不然的话，我会当场对她不客气的。

“当然它们有房间。”阿丽赛说。“夫人希望每只狗都睡在自己的垫子上，所以她让人单为狗收拾了一个房间。我们可以搬过去一把椅子，让你坐在那里守着它们。”

我把围裙系得牢牢的。然后我们一块回到



厨房。恰在这时，另一扇门开了，罗赛夫人走进来。她穿着蓝睡衣，肤色洁白，脸上抹满了润肤油，活像一张大馅饼，原谅我这样比喻。不过，她待人挺和气。看得出，我的到来显然替她放下了一副重担。

“啊，弗朗西尼太太。让你做什么，阿丽赛大概告诉你了。过些日子也许让你干别的轻活儿，擦杯子什么的。不过，最要紧的是让我那些小宝贝安静下来。它们挺讨人喜欢，可是它们不乐意在一块，很不合群。把它们放在一起，转眼就咬起架来。一想到菲多会咬伤肖夫，我就受不了，那个小可怜儿。还有梅多……”她放低了声音，走近了些。“还有，你要特别关心佩蒂特，它是一只长着美丽眼睛的波梅拉尼亚^①母狗。我觉得……时候临近了……我不愿意梅多或菲多……你明白吗？明天我要设法把它送到我们的农场去。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有人看着它。如果不让它和其他狗呆在它们的房间

① 波兰北部一个地区。



里,我不知该把它放在哪里。可怜的小宝贝,它是那么招人爱!整夜我都不能把它从身边赶走。你会看到,它们不会让你受累的。相反的,看到它们那个活泼劲儿,你一定很快活。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会不断去看看的。”

我觉得这句话不那么客气,实际上是对我的警告。不过罗赛夫人那张涂着鲜花香味润肤油的脸依然带着笑容。

“我的女儿卢西恩当然也要去农场。她的身边不能没有菲多。她甚至跟它一起睡,你可以想像……”不过,这最后一句是对她头脑里的某个人讲的,因为她一边说一边就转过身去走了,我再没看见她。阿丽赛倚着桌子,像傻子似的瞅着我。不是因为我瞧不起她,她瞅我的那副样子真像个傻子。

“家庆几点举行?”我问,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地用罗赛夫人的口吻讲起话来。这种差不多在别人的旁边提问题的方式就像问一个衣架或一扇门。

“就要开始了。”阿丽赛说。这时罗多洛斯



走进来，从他的黑衣服上弹掉一粒灰尘，郑重其事地附和着她。

“不错，很快就开始。”他说，向阿丽赛使了个眼色，让她赶快准备几个漂亮的银托盘。“弗雷胡斯先生和贝贝先生已经来了，他们想喝鸡尾酒。”

“他们总来得这么早，”阿丽赛说。“喝酒也是这么早……我把情况都告诉弗朗西尼了。她该做什么罗赛夫人也对她讲了。”

“啊，好极了。这样的话，就把她带到她应该呆的地方去吧。回头我把那些狗送去；老爷和贝贝先生正在客厅里逗它们玩。”

“卢西恩小姐把菲多带到她的卧室去了。”阿丽赛说。

“不错，让她自己把它送到弗朗西尼太太那儿去。现在，你要是愿意跟我去……”

这样，我就来到一个非常宽敞的大房间，坐在一把老式的维也纳椅子上。椅子恰好放在房间中央。房间的地板上摆满了垫子，另外还有一座用草搭的小屋，跟黑人住的那种茅屋一样。



罗多洛斯先生告诉我，这是卢西恩小姐给她的菲多盖的。六个垫子被拖得到处都是。地上摆着几个装着水和食物的碗。房间只有一盏电灯，正好吊在我的头顶上，光线很暗。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罗多洛斯先生，还对他说，要是房间里只有狗，我怕在那里睡着了。

“啊，不会睡着的，弗朗西尼太太。”他回答我说。“狗都很可爱，只是给惯坏了，必须有人时时刻刻看着它们。请在这儿等一会儿。”

当他关上门、丢下我自己坐在那个散发着狗味（不错，那是一种纯净的气味）、地上摆满了垫子的古怪房间中央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了些许古怪的感觉，因为我几乎感到像在梦里，尤其是看到屋顶上那盏黄色的灯和静悄悄的气氛。当然，时间会很快过去，不会那么令人不快。但是我老是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合适。肯定不是因为预先不说明就让我干这种活儿，但又很可能是因为觉得硬要我干这种活儿是一件怪事。或许我真的认为让我干这种活儿很不合适。地板打得亮闪闪的。看来那些狗是在别处拉屎撒



尿,因为房间里没有什么特殊味道,只有它们本身的气味。如果在那里呆一会儿,那种气味并不难闻。然而,令人恼火的是只有我一个人等在那里。当看到卢西恩小姐抱着菲多走进来的时候,我几乎高兴得叫起来。可是那是一只北京狗,样子挺可怕(我不能容忍北京狗)。罗多洛斯先生叫着、唤着另外五只狗走来,直到所有的狗都进了房间。卢西恩小姐很漂亮,穿一身白衣服,头发像镀了一层白金,披在背上。她久久地吻着、抚爱着菲多,对喝水和嬉戏的其他狗却视而不见。然后把菲多交给我,第一次看了看我。

“你就是来照看狗的吗?”她问,声调有点尖,不过,不可否认,听起来很优美。

“我叫弗朗西尼,愿为你效劳。”我说,同时点头致意。

“菲多很娇。给你,对,要抱着它。不要让它身上脏了。每天早晨我都亲自给它洗澡。我说了,它很娇,不要让它跟它们混在一起。要随时喂它点水。”

菲多在我的怀里很安静，不过我还是觉得它有点讨厌。一只浑身是黑花的高大的丹麦狗凑过来嗅它。卢西恩小姐尖叫一声，踢了它一脚。罗多洛斯先生站在门口没动，看来他已经习惯了。

“你瞧，你瞧，”卢西恩小姐叫道，“我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你不应该让它闻。妈妈不是告诉你了吗？在家庆结束以前你不要离开这儿。如果菲多觉得不舒服、眼里流泪的话，就敲敲门，让他去叫我。”

说完，她又把北京狗抱过去亲了一番，亲得它直淌泪。然后看也不看我一眼便扬长而去。罗多洛斯先生又呆了一会儿。

“这些狗不坏，弗朗西尼太太。”他对我说。“不管怎样，如果有什么事，只管敲门，我马上来。要耐心点。”他又说，好像末了才想起来。然后轻轻地关上门走了。我心想，他可能把门锁上了。不过我克服了去察看的愿望，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很不好。

的确，照看狗并不困难。它们不咬架，罗赛



夫人讲的关于佩蒂特的情况并不确实，至少它还没有出现那种事。当然，门一关上，我就把讨厌的北京狗扔在了地上，让它去跟其他狗放心地折腾去。它最坏，老是找碴儿跟别的狗咬架，不过它们并不在乎，最后还邀它一块戏耍。它们时而喝水，时而吃碗里的大肉。请原谅我这么说：看见碗里那些好吃的大肉，我简直要流口水了。

有时从远处传来什么人的笑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要放音乐了（阿丽赛在厨房里说过），不过我好像听见了钢琴声，尽管可能在另一个套间。时间过得真慢啊！尤其因为我头顶上那惟一的黄色的灯。有四只狗很快就睡着了，菲多和菲菲（不知是不是菲菲，反正我觉得可能是它）彼此咬耳朵玩了一会儿，最后喝了不少水，在一块垫子上紧紧地挤着躺下了。有时我听见外头有脚步声，便马上把菲多抱起来，好防备卢西恩小姐闯进来。不过，没有人来。这样过了好半天，我开始坐在椅子上打盹儿，真想把灯关掉，躺在一个空垫子上好好睡一觉。



当阿丽赛来找我的时候，我不能说我不愉快。阿丽赛的面孔红红的，显然家庆的兴致和她在厨房里同其他女佣人和罗多洛斯先生议论的一切还没有结束。

“弗朗西尼太太，你真了不起！”她说。“夫人肯定感到满意，每逢家庆都会叫你来的。上次来的那个女的没能把它们看好，卢西恩小姐不得不放弃跳舞来管它们。你瞧，现在它们睡得多好啊！”

“客人走了吗？”我问，对她的称赞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客人倒是走了，可是还有一些人没走，他们就像这个家的人似的，总要留下来多呆一会儿。他们喝了不少酒，我敢这么说。连平日在家不喝酒的老爷也兴奋地来到厨房跟吉尼特和我开玩笑，说我们晚餐侍候得多么好。他还送我们每人 100 法郎。我想他们也会给你一些小费的。卢西恩小姐和她的未婚夫还在跳舞，贝贝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化妆取乐。”

“这么说我还得留在这儿了？”



“不，夫人说议员和其他人走后就吧狗放出来，他们很高兴在客厅里逗狗玩。我把菲多送回去。你跟我到厨房里就完事了。”

我跟着她走去。我疲惫不堪，困得要命，但是心里充满好奇心，想看看家庆是怎么回事，哪怕只看看放在厨房里的酒杯和盘子。我终于看到了，因为盘子一擦擦的到处都是，还有香槟酒瓶和威士忌酒瓶，有的瓶里还剩了一些酒。厨房用的是冒蓝火的煤气灶。看到那么多白橱柜和那么多放着闪光的餐具和带把线口锅的橱柜架，我都眼花缭乱了。吉尼特是个矮小的红发姑娘，也显得很兴奋，见到阿丽赛时脸上现出不自然的笑容和表情；跟当时的许多姑娘一样，她好像挺害羞。

“还那么热闹吗？”阿丽赛问，眼睛望着门口。

“是的。”吉尼特回答，一面扭动着身子。“这位太太就是照看狗的吧？”

我又渴又困，可是她们什么也不给我吃，连坐的地方也没有。由于家庆，由于上菜或在大



门口接大衣时看到的一切，她们显得非常兴奋。门铃响起来，仍然抱着北京狗的阿丽赛跑了出去。是罗多洛斯先生来了，他走进来，没注意我，随即带着五只狗回去了，它们蹦蹦跳跳地闲不住，对他很亲热。我看见他手里抓着一大把糖块。一边走一边扔给它们吃，好把它们引到客厅去。我靠着厨房中央的大桌子，尽量少看吉尼特。阿丽赛一回来，她就接着谈论贝贝先生和化装游戏，谈论弗雷胡斯先生和那位好像患肺病的女钢琴手，以及卢西恩小姐怎样跟她父亲吵架。阿丽赛拿起半瓶子酒就往嘴里灌，那副俗气样子使人觉得哭笑不得，看不下去。更可怕的是，她又把瓶子递给了红发姑娘，红发姑娘把瓶里的酒一饮而尽。她们两个大笑起来，好像家庆过程中她们也喝了许多似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她们才忘记我在饿着肚子，特别是口渴得难忍。我敢说，她们要是头脑清醒，一定会想到这一点的。人倒是都不坏，但是常常不顾礼节，因为她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公共汽车上、商店里和机关里也是如此。



门铃又响起来。两个姑娘跑了出去。传来哈哈大笑的声音，不时响起一阵钢琴声。我不明白为什么老让我等着，只要付给我工钱，让我走就得了。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把双臂撑在桌上。我困得合上了眼睛，所以没注意有人刚刚走进厨房。我先听见一阵杯子相撞的声音，然后又听见一阵很轻的口哨声。我以为是吉尼特，便回头问她，他们为什么不管我。

“啊，对不起，先生。”我说，同时站起身。“我不知道您在这儿。”

“没关系，没关系。”那位先生说，他很年轻。“娄娄，你来看呀！”

他有点摇晃，顺势倚在一个碗架上。他已经倒满了一杯白色的酒，对着光瞅着它，好像不相信。那个叫娄娄的没有来，年轻的先生便向我走来，让我坐下。他的头发金黄，面色苍白，穿着一身白衣服。当我发现他在大冷的冬天穿一身白衣服时，我就想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这不是一种描写方式，每逢见到某种古怪的东西，我总是严肃地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很可能是



做梦，因为我有时会梦见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那位先生就在我面前，脸上带着疲惫的、几乎是厌烦的神情微笑着。看到他那苍白的面孔，我感到难过。

“你大概是照看狗的那位吧？”他问，随即端起酒杯来喝。

“我叫弗朗西尼，为你效劳。”我说。他是那么和气，一点儿也不叫我害怕。相反的，倒是使我产生一种愿望：我该对他有所帮助，有所关心。现在他又一次望着那虚掩的门。

“娄娄！你不来吗？这儿有伏特加。你怎么哭了，弗朗西尼太太？”

“啊，不，先生。我是打呵欠打的，就在我进来之前。我有点疲倦，那个房间……那个房间的灯光不很亮。一打呵欠……”

“……眼睛就流泪。”他说。他的牙齿特别整齐，他的手比我看到的任何一个男人的手都白。他突然站起来，迎着一个摇摇晃晃走进来的青年走去。

“就是这位太太，”他对他说。“她使我们摆



脱了那些脏畜生。娄娄，问她晚安。”

我再次站起来，向他致意。但是名叫娄娄的先生根本不看我。他在冰箱里找到一瓶香槟酒，想把瓶塞起下来。穿白衣服的青年上去帮他。两个人笑起来，开始使劲儿起瓶塞。但是一笑就没劲儿了，谁也没能把瓶塞起下来。于是两个人一起用力，各人向各人方面使劲儿。结果一个人倒在另一个人身上。两个人越发笑得厉害，可是瓶子还是没办法打开。娄娄先生说：“贝贝，贝贝，劳驾，现在我们走吧……”贝贝先生笑得越发开心，开玩笑地拒绝了他。最后终于把瓶子打开了，汹涌的泡沫溅了娄娄先生一脸。他骂了一句，擦了擦眼睛，踱起步来。

“可怜的朋友，你喝得太多了。”贝贝先生说，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把他往门外推去。“去陪着可怜的尼娜去吧，她太忧伤了……”说着笑起来，不过他已经不愿意笑了。

然后他走回来，我觉得他更加和气了。他哆嗦了一下，有一边眉毛跳了跳。这种动作他重复了两三次，但一直望着我。



“可怜的弗朗西尼太太，”他说，轻轻地摸着我的头。“你被抛在这儿，肯定什么也没有给你喝。”

“有人会来告诉我可以回家的，先生。”我回答。他这么冒失地摸我的头，我不感到讨厌。

“你可以再来，可以再来……要做什么，有什么必要让别人同意呢？”贝贝先生说，坐在我对面。他又端起杯子，但是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找一只干净杯子来，倒满了茶色饮料。

“弗朗西尼太太，来，我们一块喝。”他说，同时把杯子递给我。“你喜欢喝威士忌，没错。”

“哎呀，先生。”我胆怯地说。“除了葡萄酒，星期六在古斯塔夫家里还喝点绿茴香酒。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喝酒。”

“你从来没喝过威士忌，对吗？”贝贝先生说，他真好。“就喝一口，不多喝。尝尝吧，这酒美极了。来，弗朗西尼太太，勇敢点。头一口难往下咽……”他朗诵了一首诗，我记不得了。诗里写的是某个罕见的地方的几名航行者。我喝了一口威士忌，味道香极了，我又喝了一口，后



来又喝了第三口。贝贝先生品味着他的伏特加，快活地望着我。

“弗朗西尼太太，跟你在一起真愉快。”他说。“碰巧你不是年轻人，可以跟你交朋友……只要看看你，就知道你是个好人的，就像外省的一位姑妈，既让人喜欢又喜欢别人，但是，不会有危险，不会有危险……比如尼纳，在波伊图就有一位姑妈，给他送小鸡，一篮一篮的豆荚，还有蜂蜜……不是很好吗？”

“当然好，先生。”我说，又允许他给我倒了一点酒，既然这使他那么愉快。“得到一个人的关心，总是令人高兴的，特别在年轻的时候。年纪一老，就只能想到自个儿，因为别人……我就是这样。我的乔治去世后……”

“再喝点吧，弗朗西尼太太。尼纳的姑妈住得很远，只给他送小鸡什么的，不会发生家庭历史方面的危险……”

我是那么陶醉，即使罗多洛斯进来看见我坐在厨房里和一位客人交谈会发生什么事我甚至都不在乎了。我快活地望着贝贝先生，听着



他那可能由于喝酒而变得那么刺耳的笑声。他很喜欢我看他。虽然开始我觉得他不怀好意，但是后来他只是微笑、喝酒，同时不住地瞧我。我知道他已经酩酊大醉了，因为阿丽赛已经告诉我他们喝了多少酒。此外，从贝贝先生眼睛闪动的样子也能看得出来。如果他没有喝醉，他干吗要和一个像我这么老的女人坐在厨房里呢？不过，其他人也喝醉了。但是只有贝贝先生来这儿陪我，只有他给我倒酒喝，抚摸我的头，虽说这样做不合适。所以我才觉得跟贝贝先生在一起很高兴，才不住地瞅他。他很愿意我这么瞅他，因为有一两次他微微侧身而坐，鼻子非常美丽，仿佛一座雕像。他的整个形象就仿佛一座雕像，尤其穿着白衣服的时候。连他喝的酒也是白的。他的面色那么苍白，我都为他担心了。看来他跟现在许多青年一样不爱外出。我很愿意把这一点告诉他，可是我没有资格劝说像他这样的先生。再说我也没时间了，因为我听见了撞门声，娄娄先生拖着那只丹麦狗进来了。狗被捆着，绳子是用一块窗帘搓成



的。他比贝贝先生喝得还多。当丹麦狗转了一圈用绳子缠住他的腿时，他差一点摔倒。走廊里传来说话声，来了一位灰头发的先生，他准是罗赛先生。紧接着来的是面红耳赤、兴致勃勃的罗赛夫人和一个身材消瘦、头发黑得少见的青年。大家竭力要把同丹麦狗和窗帘绳愈来愈紧地纠缠在一起的娄娄解脱出来，同时笑着，大声地开着玩笑。谁也不注意我，后来罗赛夫人看见了我，顿时板起了面孔。我没听见她对灰白头发的先生说的话。那位先生看了看我的杯子（杯子是空的，但是瓶子放在旁边），罗赛先生看了看贝贝先生，对他做了个气愤的表情，贝贝先生却对他挤了挤眼，往椅子上一躺，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很尴尬，所以觉得最好是站起来对他们点头致意，然后站到一边去等着。罗赛夫人已经离开厨房，不一会儿阿丽赛和罗多洛斯先生走进来，走到我面前对我说要我跟他们去。我对所有在场的人点了点头，但是我相信不会有人看我，因为都在忙着安慰娄娄。娄娄刚才突然哭起来，并且指着贝贝先生讲着叫人



听不懂的话。我记得，最后贝贝躺在椅子上笑了一阵。

阿丽赛等着我脱围裙，罗多洛斯先生交给我 600 法郎。街上在下雪，末班地铁早就过去了。我只好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不过，威士忌的热力保护了我，还有对那么多事情的回忆和家庆后在厨房里的娱乐。

正如古斯塔夫说的，光阴如飞似箭。刚到星期一，转眼就是星期四。秋天刚结束，炎夏便突然到来了。每逢罗伯特来问我是不是需要打扫壁炉（罗伯特很宽厚，比起其他房客来，他只收我一半房费），我觉得就像某人讲的，冬天已经来到家门口了。所以我记不大清楚我再一次见到罗赛先生时已经过了多久。他来我家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几乎和罗赛夫人第一次来的时刻相同。他一开口也说是比切姆夫人介绍他来的。他不知所措地坐在椅子上。谁也不觉得在我家里快活，当陌生的客人来访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不快。我搓着双手，好像手脏似的。随后我想，别人可能认为我的手确实很脏，所以



我不知道该躲到哪里去。幸好罗赛先生也跟我一样慌乱不安，他只是掩饰得好些。他用手杖慢慢地敲着地，把米诺切吓坏了。他还东张西望，竭力避免和我的目光相遇。我不知道该求什么神保佑，因为我是第一次面对一位心情慌乱的先生。我不知道怎样对付这种局面，只好请他喝一杯茶。

“不，不，谢谢。”他说，样子很不安。“是我妻子要我来的……你还记得我，肯定。”

“当然，罗赛先生。那次你家举行宴会，那么热闹……”

“是的，那次家庆。恰恰……我是说，这件事跟家庆毫无关系。不过，那一次你帮了我们的忙，太太……”

“我叫弗朗西尼，愿为你效劳。”

“弗朗西尼太太，不错。我妻子想……你知道，这是一件难办的事。但是首先我想请你放心。我想求你做的事不是……怎么说呢？……不合法的。”

“不合法，罗赛先生？”



“啊，你知道，在这年月……不过，我说过：是关于一件难办的事，但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我妻子全知道，她已经表示同意。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放心。”

“既然罗赛夫人同意，对我来说也一定是好事。”我说，为的是让他宽心。其实我一点也不了解罗赛夫人，更确切地说，我觉得她讨厌。

“总之，情况是这样的，太太……弗朗西尼，对，弗朗西尼太太。我们的一位朋友……也许说我们的一位熟人更确切，刚刚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故去。”

“唉，罗赛先生！向你表示深切哀悼。”

“谢谢。”罗赛先生说，做了个特别怪的怪相，几乎像是要怒吼或大哭。那是真正的疯子才做得出的怪相，看了叫人害怕。幸好房门虚掩着，旁边又有弗雪斯奈的作坊。

“这位先生……是个很有名的女服裁缝……是个单身，就是说离家庭很远，你明白吗？除了朋友，他什么人也没有，因为顾客，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指望的。但是，鉴于一



系列一时难以说清楚的理由，我们这些做朋友的认为，为了替他安葬……”

讲得多好啊！他不望着我，只是用手杖慢慢地敲地，讲出的每句话都是一首挽歌，就仿佛在听无线电里的评论，只不过罗赛先生讲得更慢些，而且显而易见，他不是在读。所以字字句句就更加入耳。我深深地被感动了，不再有所怀疑。我把椅子挪得离他更近一些。觉得肚子里仿佛有一团火，暗自想道，一位这么高贵的先生竟来求我帮忙，虽然不知是什么事。我慌得要命，搓着双手，不知该怎么办。

“我们觉得，”罗赛先生说。“一种仪式，如果只有他的朋友，不多的几个朋友参加……总之，对这位先生来说是不够隆重的……也表现不出失去他而引起的悲痛（他是这么说的）……你明白吗？我们觉得，倘若你能够出席守灵礼，当然也参加送葬……我们想请你权当死者的亲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非常近的亲戚……比如一位姑妈……我甚至想冒昧地提出……”



“是吗，罗赛先生？”我说，感到非常惊讶。

“喔，当然，一切都取决于你……不过，如果你接受一笔合适的报酬……自然，不是什么使你为难的事情……这样的话，不是吗，弗朗西尼太太？……如果你觉得报酬合适，我们现在就可以商谈……我们相信，你会同意权当……你明白我的话……比如权当死者的母亲……请让我讲得更清楚点……他的‘母亲’刚从诺曼底^①来，她获悉儿子去世，来为儿子送葬……不，不，你先听我讲……我妻子觉得，为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你一定会答应帮助我们……从我这方面讲，我和我的朋友们愿意给你 1 万法郎……这样合适吗，弗朗西尼太太？给你 1 万作为对你给的帮助的报酬……现在就给你 3000，其余的等离开墓地，一旦……”

我张开了嘴，因为我再也克制不住了。但是罗赛先生一句话也不让我说。他面红耳赤，急言促语，似乎想一下子把话全说完。

① 法国北部的旧省份。



“你要是答应，弗朗西尼太太……因为一切都在等着我们去办，既然我们相信你的帮助，我们就不必对你提什么特殊的……要求了，如此说来……这样的话，半小时后我妻子和她的使女就可以把合适的衣服送来……当然，会开车子来接你……当然，你必须……怎么说呢？你必须做好扮演死者的母亲的思想准备……我妻子将给你介绍必要的情况。你呢，当然，一到他家，就应该假装难过……这你明白……悲痛，绝望……特别是在客人们面前。”他强调说。“在我们面前你只要保持沉默就够了。”

我不知道那一沓子崭新的钞票怎么出现在他手里的。而倘若知道怎样突然感到那些钞票拿在我的手里，我会立刻昏倒在地的。罗赛先生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走了，像所有离开我家的人一样忘了替我关门。

我知道，上帝会宽恕我这件事和许多别的事情的。这种事不合适，但是罗赛先生说并非不合法，而且这样可以给别人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帮助（我相信这是他的原话）。我不应该冒充

那位死去的女服裁缝先生的母亲,因为这种事是不应该干的,也不应该欺骗任何人。但是应该想到顾客们。如果举行葬礼时没有母亲,甚至连一位姑妈或姐妹也没有,葬礼将显得不隆重,也不能引起人们对死者的悲伤感。刚才罗赛先生就是用这样的话讲这件事的。我本来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上帝知道,我在比切姆家和其他地方干活累得腰酸背疼,每月才挣 3000 法郎。而现在,仅仅哭一会儿,为那个被埋葬前将是我儿子的先生的死表示悲痛,就可以拿到 1 万法郎。

那位先生的家在圣克劳德公园附近。我被一辆汽车接去,那种汽车我从没有坐过,只见过它的样子。罗赛夫人和使女给我换衣服。我知道那个死者是利纳德先生,名字叫奥克塔夫,是他的老母亲的独生子。他母亲住在诺曼底,刚刚坐 5 点的火车赶到。老母亲就是我,但是我的心情是那么紧张和不安,关于罗赛夫人对我讲的和介绍的一切,我只听到一点。我记得她在汽车里不止一次地恳求我(我不瞎说,她是恳

求我，自举行家庆的夜晚后，她的变化非常大），不要过分悲伤，只要让人看到你累得要命，几乎昏倒就行了。

“遗憾的是我不能和你在一起。”汽车快开到的时候她说。“不过，你一定要照我说的做。此外，我丈夫将负责安排一切。弗朗西尼太太，要知道说‘请’，特别是看见记者，夫人……尤其是记者的时候……”

“你不在那里吗，罗赛夫人？”我非常吃惊地问。

“不。这你不懂，一时也说不清。我丈夫会去的，他跟利纳德先生的生意有关系……当然，他去那里是为了情面……是个交往和人道问题……但是我不能在那里，不适合我……你只管放心好了。”

在门口我看见了罗赛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他们走过来；罗赛夫人最后叮嘱了我一句，就躺在车座上，免得被人看见。我让罗赛先生拉开车门，我如丧考妣地哭着下了车，罗赛先生拥抱了我，把我领进屋里，其他几位先生也跟着



进来。我不能仔细察看屋内的情景，因为一块三角头巾几乎盖住了我的眼睛，再说我又哭得那么邪乎，什么也看不清了。不过，从房间里的气息，以及松软的地毯，可以感觉到房间的豪华。罗赛先生喃喃地劝慰着我，他的声调听起来好像也在哭泣。在一间装有带穗子的枝形吊灯的特大客厅里，有几位先生怀着深切的同情望着我。我相信，倘若罗赛先生不抱着我的双肩推着我往前走的话，他们肯定会走过来安慰我。我看见一位很年轻的先生坐在一把沙发上，合着双眼，手里拿着一只杯子。听见我走进来，而且我那会儿哭得那么伤心，他却一动不动。一扇门开了，两位先生拿着手帕从里头走出来。罗赛先生轻轻推了我一下，我走进一个房间，踉踉跄跄地被带到死者旁边。我看见了死者，他是我的儿子。我看到了贝贝先生的轮廓。现在他死了，他的头发比任何时候都黄，面色也比任何时候都苍白。

我觉得我抓住了床缘，因为罗赛先生吓了一跳，其他先生围上来扶住了我。我望着死去



的贝贝先生那么美丽的面孔、长长的黑睫毛和蜡一般的鼻子，不能相信刚刚死去的女服裁缝是利纳德先生，也不能相信面前的死者是贝贝先生。我可以起誓，当时我竟不由自主真的哭起来。我抓着非常豪华的、用坚实的橡木做的床的床缘，回想起举行家宴的那个夜晚他怎样抚摸我的头，怎样倒酒给我喝，别人在快活地取乐，他却陪着我、跟我交谈。这时罗赛先生悄悄地对我说：“冲他叫儿子，叫儿子……”我毫不勉强地叫起来。我觉得为他哭一场，心里感到非常痛快，好像是对我一直怀有的全部恐惧心情的一种报答。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当抬起头来看见床那边的娄娄先生两眼发红、口唇颤抖时，我不禁望着他的脸大哭起来。他虽然感到意外，但还是同样哭起来。他哭，是因为我在哭。看到我跟他一样真哭，他简直怔住了。我和他都喜欢贝贝先生，我们俩几乎在床两边赛起哭来了。生前贝贝先生曾在厨房的桌边嘲笑我们大家，如今再也不能那样笑和嘲弄人了。

后来我被带到装着枝形吊灯的大客厅的一



处沙发上。那里的一位夫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小瓶盐。一个男仆把一张小轮桌放在我旁边，桌上的托盘里有咖啡和一杯水。现在罗赛先生看到我能够按照他们的要求做，比开始时放心多了。我见他走开和其他先生谈话去了。过了好久没有人再进来或离开客厅。我进来时看到的那个青年仍然坐在对面沙发上，现在他正双手掩面恸哭，不时掏出手帕擤鼻涕。娄娄先生出现在门口，看了他片刻才走到他旁边坐下。我非常同情他们，看来他们是贝贝先生的好朋友，都那么年轻，那么难过。刚才在一个角落里和两位夫人低声谈话的罗赛先生也望着他们。那两位夫人正想离开客厅。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娄娄突然尖叫了一声，躲开了另一个气愤地望着他的青年。我听见娄娄说：“事情从来跟你毫不相干，尼纳。”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叫尼纳的人，他在波伊图有一位给他送小鸡和豆荚的姑妈。娄娄先生耸了耸肩，又说尼纳是个爱说谎的人。最后他站了起来，脸上现出生气的表情。尼纳也站起来，几乎一起跑进贝贝先生所在的



房间。我听见他们在争论，但是罗赛先生随即走进去阻止他们，让他们住口。再也听不见什么了。后来娄娄先生走出来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湿手帕。在他背后恰好有一扇窗子对着后院。我觉得，对客厅里的一切，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窗子（还有华丽的枝形吊灯），因为黑夜结束的时候我看见它慢慢改变着颜色，由黑变灰，日出前终于变成玫瑰色。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思念贝贝先生，突然克制不住地哭起来，虽然只有罗赛先生和娄娄先生在客厅里，因为尼纳先生已经走了，或者到住宅的别处去了。一夜就这样过去了：有时一想起那么年轻的贝贝先生就克制不住哭起来，尽管也是因为有点累了。于是罗赛先生走来坐在我旁边，带着古怪的表情对我说，不必继续假装了，要我做好准备，等待送葬的时刻，迎接致丧的人们和记者。但是有时很难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哭，或假哭。我请求罗赛先生把我留下来守着贝贝先生。他要我去睡一会儿，我不愿意去，他似乎很奇怪，再三要把我带到一间卧室去。他终于被我说



服,答应我的请求。我趁着他可能是上厕所的工夫,再一次走进贝贝先生所在的房间。

我本以为那里没有人,尼纳先生却在那里,站在床尾望着他。我们不认识(就是说,他知道我是假装贝贝先生的母亲的太太,但是我们没有见过面),所以我们只是不信任地对望,尽管我走过去坐在贝贝先生旁边时他没说什么。我们这样子呆了一会儿,我看到泪水从他的面颊上流下来,在鼻子旁边形成一道泪痕。

“那天晚上举行家庆,你也去了。”我说,想使他高兴点。“贝贝先生……利纳德先生说你很悲伤,他要娄娄先生去陪你。”

尼纳先生莫名其妙地望着我,摇着头。我对他微笑,让他高兴。

“罗赛先生家里举行家庆的那天晚上,”我说,“利纳德先生来到厨房,请我喝了威士忌。”

“威士忌?”

“是的,那天晚上只有他请我喝酒……娄娄先生打开一瓶香槟酒,利纳德先生溅了他一脸沫……”



“喂，别说了，别说了。”尼纳低声说。“不要再提他……贝贝疯了，真疯了……”

“为了这个你才悲伤吗？”我问他，还想跟他说话。但是他不愿意听，两眼望着贝贝先生，好像问他什么事。他念念有词地重复着什么，直到我不能够再看他。尼纳不像贝贝先生或娄娄先生那么英俊，我觉得他很矮，就像古斯塔夫说的那样，穿黑衣服的人总显得较矮，我本想安慰安慰尼纳先生，他太痛苦了。但是这时罗赛先生走进来，使了个眼色让我回客厅。

“天快亮了，弗朗西尼太太。”他说。他的脸色发青，可怜的人。“你应该休息一会儿。你累得不能再支持了。出殡的人快来了，9点半举行葬礼。”

我确实累得很，最好睡一小时，睡一小时能够解除劳累，真是不可思议。但是我还是让罗赛先生搀着去休息。穿过装有枝形吊灯的客厅时，窗户已呈现鲜艳的玫瑰色。虽然壁炉里生着火，我仍然觉得冷。就在这时，罗赛先生突然不搀我了，呆呆地望着面对街门的房门口。原



来走进来一个脖子上系着围巾的男人。我给吓坏了,以为我们的事情被识破了(尽管没有什么不合法),系围巾的男人可能是贝贝先生的兄弟。但是这不可能,因为他的样子太土气了,好像只有皮埃尔或古斯塔夫才能够成为贝贝先生这样高雅的人的兄弟。在系围巾的男人身后,我突然看见了娄娄先生。他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害怕。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幸灾乐祸。这时罗赛先生暗示我留在原地别动,他朝那个系围巾的人走了两三步,看样子很不情愿。

“你来了?……”他说,使用的口吻跟和我讲话一样,实际上一点也不客气。

“贝贝在哪儿?”来人问,那声调好像刚喝过酒或者刚刚叫喊过。罗赛先生打了个含糊的手势,想拒绝他进来。但是那个男人走过来,只用严厉的目光就使他躲到一旁。在如此悲痛的时刻他的态度竟然这么粗暴,我感到惊讶。但是娄娄先生站在门口(我相信准是他让那个男人进来的)大笑起来。罗赛先生走过去,给了他两个耳光,就像对一个孩子,的确像对一个孩子那



样。我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不过娄娄先生好像挺满意，虽然挨了两耳光。他好像这样说：“马上叫她明白……马上叫那个婊子明白……”只是他老重复他的话，很不好。他说了一遍又一遍，突然哭起来，用双手掩着脸，被罗赛先生推着拉着，走到一条沙发近旁，在那里大叫大哭。我站在那里，好像永远被人们忘记了。

罗赛先生似乎很紧张，不敢进死者的房间。但是过了片刻，那个房间传来尼纳先生为了什么事情提出抗议的声音。罗赛先生不再犹豫，迅速向房门口跑去。这时尼纳恰好叫喊着走出来。我敢起誓，为了把他赶出房间，系围巾的人肯定推了他几下。罗赛先生望着尼纳先生，后退了几步。两人低声地交谈起来，但是后来的声音变得很尖。尼纳竟恼怒地哭起来，还做着怪相，这使我感到难过。最后他平静了点，罗赛先生把他拉到坐在沙发上的娄娄面前。娄娄又笑起来（他就是如此，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但是尼纳先生对他做了个蔑视的表情，走去坐在壁炉旁另一个沙发上。我呆在客厅的角落里，



等待夫人们和记者到来,就像罗赛夫人吩咐过的那样。阳光终于照在窗玻璃上。一个穿制服的男仆领进两位仪表不凡的先生和一位夫人。夫人先看了看尼纳先生,可能认为他是死者的亲人,然后又看了看我。我用双手掩着脸,但是从手指缝里很清楚地看见了她。他们和后来进来的先生们去看了贝贝先生,然后聚集在客厅里。有几位先生由罗赛先生陪着走到我面前,向我表示哀悼,并且十分亲切地握了我的手。夫人们也很热情,特别是其中那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夫人,她在我旁边坐了一会儿,说利纳德先生是个大艺术家,他的去世是无法挽回的不幸。我说她的话极是,真的哭起来。虽然我一直在假装,但是一想到躺在屋里的贝贝先生是那么英俊、那么善良,而且是大艺术家,我就很激动。年轻夫人抚摸着我的手说,大家永远不会忘记利纳德先生,她相信罗赛先生一定会像利纳德先生一向希望的那样把时装店继续办下去,不能让他的手艺失传。她还讲了许多别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不过句句都充满了对贝贝先生的



赞扬。这时，罗赛先生来找我。他看了看围着我的先生们，让他们明白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低声对我说，是和我儿子告别的时候了，因为马上就要入殓盖棺了。我心里害怕极了，我心想，此刻我得演出我最为困难的一场戏了。但是他扶着我，把我搀起来，一起走进那个房间。房间里只有系围巾的那个男人站在床尾，望着贝贝先生。罗赛先生对他使了个请求的眼色，好像告诉他，应该让我和我儿子单独在一起。但是那个人只做了鬼脸，耸了耸肩，一动不动。罗赛先生没有办法。他又看了看那个人，好像恳求他出去，因为另一些可能是记者的先生刚刚随后走进门来。他系着那种围巾，用那种方式望着罗赛先生，仿佛准备辱骂他，确实不合时宜。我不能再等待，我害怕所有的人，我相信可能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尽管罗赛先生不管我，继续使着眼色说服那个人出去，我还是走到贝贝先生旁边，嚎哭起来。但是罗赛先生拉住了我，因为我想去亲贝贝先生的额头。他仍然是所有的人中对我最好的人，但是罗赛先生阻



止了我，要求我冷静。最后强迫我回到客厅。他劝我时用力抓着我的胳膊，都把我抓疼了。这一点只有我自己感受到，不过我不在乎。当我坐到沙发上，两位夫人用手帕为我扇着风，一个仆人送来水时，另一个房间发生了一场骚动，一些陌生人走进客厅，向我走来，使得我没法看清发生的事情。在新来的人中间有一位神父。他来陪伴贝贝先生，我高兴极了。出殡的时刻马上就到，神父跟我们，即贝贝先生的母亲和朋友们在一起很好。他们，尤其是罗赛先生，也肯定为神父的到来感到高兴。由于那个系围巾的人的捣乱，罗赛先生是那么难过。他一直在为丧事操心，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地进行，让人们看到葬礼举行得多么好，大家是多么爱贝贝先生。

朱景冬译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南方高速公路

作者= (阿根廷) 胡利奥·科塔萨尔著 林之木等译

页数= 2 7 2

S S 号= 1 1 3 1 3 7 8 4

出版日期= 2 0 0 4 年 0 1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南方高速公路&林之木译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胡真才译	
中午的海岛&尹承东译	
一朵黄花&朱景冬译	
被侵占的住宅&炜华译	
粗线画&张琼译	
公共汽车&胡真才译	
妈妈的信&朱景冬译	
秘密武器&朱景冬译	
满意的服务&朱景冬译	